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



说明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诞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总政治部于 1993 年 12 月 26 日至 30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全部 113 篇论文，编成本论文集。

这 113 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经过广泛征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国家教委高校系统，军队系统和中央有关研究部门初评、推荐的基础上，又经过由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选组复评产生的；少数是研讨会组委会的约稿。

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王玉璞、刘敏承担。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
1994 年 4 月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

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

薄一波

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由中央宣传部等五个单位联合召开“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性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老党员和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严谨求实，开出高水平，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以便把对毛泽东思想和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推进一步。

主持研讨会的同志希望我结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写作，讲讲怎样纪念毛主席的问题。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从而全面推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是作者 1993 年 12 月 26 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曲折的环境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党就是用这套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自己，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后，在恢复国民经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也由于苏联经验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更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大力帮助下展开的，因此，我们的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在许多方面照抄苏联。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党也有自己的独创。关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方面的独创，我想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些：

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同苏联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不同的。

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全盘集体化部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家本人，不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把他们看成财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跟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在处理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价值规律

的基础之上的，这同苏联长期采用“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向农民索取高额积累的办法是迥然不同的。

五、建国初期，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那时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重重轻轻，因此，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同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长期“一条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跟苏联实行的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体制是不同的。

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同这个制度很有关系。

八、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

以上几条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些独创虽作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原则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同样适用。

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后来我们党还明确向苏共领导人说明：“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这鲜明地显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独创精神。如果从建国开始，就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这里，我还想讲讲毛主席对工作着重点问题的思考。早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6月1日，他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1954年9月，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和现代化国防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说明：即使毛主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抓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是为着能早日转向这个中心。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察觉得最早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使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这段时间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我是亲眼所见，受益匪浅，感慨良深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已有专篇叙述，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想把从这次听取汇报开始，到1957年夏季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或同意的一些重要观点，简要地归纳一下，并简要地说说这些观点的意义。

这个期间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我所知，可归纳为十四条：

一、两类矛盾学说。提出这个学说，对于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由于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顺理成章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两组矛盾不具有在旧社会那样的对抗性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求得解决，两组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小平同志指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这个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然起着指导作用。

以上三条，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系列。这是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道义上的一致而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四、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意味着中央管理国家事务的权限，有一部分要下放给地方管理。这是毛主席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来的。

五、在肯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经营的条件下，承认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肯定国家市场是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六、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这对把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所有制的传统观念是一个突破。

七、在分配方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这是鉴于苏联的教训而提出的。

八、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方针的提出，对苏联长期实行的只扶持一家之言、一种流派的

艺术，别的都看成异端的禁锢政策，是一个突破。

十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我国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历史所形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由于这个方针的提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十二、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也较能经受风险。

十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这是周总理在 1956 年 6 月首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的。

十四、“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的策略思想。

上述观点虽然大部分没有照做，有的还只是在酝酿中的思想观点，但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在当时毛主席的思想里，确实想摆脱苏联僵化模式和斯大林“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寻找一条在体制方面比较灵活、指导思想方面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可惜，1957 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对国际、国内阶段斗争的形势和影响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加以在一系列的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毛主席在经济社会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左”的转向，以致发生了将近 20 年“左”的失误。小平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里所指的“正确的东西”，我理解，既包括毛主席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包括他在探索中提出的正确观点。

但是，毛主席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就在 1957 年以后，特别是 60 年代前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期间，他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仍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或者闪烁出探索前进的思想火花。这些意见，我记得的，有这么六条：

一、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经过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吃饭不要钱”和刮“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等严重挫折之后，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剥夺农民。

二、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没有 100 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推断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更长。

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意见。早在 1956 年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他就说过：你们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后，他又多次提及。后来在提法上果然倒过来了。

四、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 1964 年底 1965 年初通过同周总理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现在使用的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提法，就源出于此。

五、支持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倡议。这说明毛主席在 60 年代前期已察觉到单纯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

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

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制度中所没有的。

在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虽然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科学论断，但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他还是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摆到中心位置上来的。1958 年 1 月，他提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 年底，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1959 年国庆期间会见外宾时又说：今后 10 到 20 年内，主要精力将放在建设上面。只是后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就是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运动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这早已有历史结论。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而且还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记得，70 年代初，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大事之一，是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一鼓作气，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由美国带头对我国实行了 20 多年的封锁，就被大面积地打破了。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那时候，“四人帮”阻挠我国同西方接触，吵得很凶，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所谓“蜗牛事件”，是许多同志记忆犹新的。但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总理力排阻力，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设备的大门。70 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 10 多个国家引进 22 套大型设备。那批引进项目现在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吗？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两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途上，为开拓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就是不知疲倦地探索着。对于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建国初期就有所思考。集中的探索则在 1956 年全年和 1957 年上半年。以后，他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仍没有放弃这一探索工作，直到临终。可不可以这样说，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后来，探索向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因而，应该承认这次探索没有取得成功。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我们党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四大确认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引的道路。这是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之路，也是保障中国

社会主义事业较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之路，同志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不走这条道路，而是沿着“两个凡是”的道路一直走下来，最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历史性飞跃能够出现吗？前几年的政治风波“关”、苏联东欧剧变“关”，我们能够闯得过来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小平同志对此做出了人人看得见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实际上早在 1975 年就开始了拨乱反正。那时候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所以为毛主席所不容而再次被打倒。1977 年以后，他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先导，承担了指导全党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所收入的文献有力说明：他重新工作后，事实上是拨乱反正的主要决策者。党的十二大后，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大多是根据他的建议做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集的文献，如实地记载了他在近十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和远见卓识。同志们在读这两卷书时，不难发现：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九个方面的内容，绝大部分在这两卷书里，可以找到它的出处或精辟的阐发。因此，我这样想，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冠以毛泽东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

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从毛主席的失误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小平同志说：“那件事（指‘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怎样促进新思想、新理论的形成？小平同志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这段回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全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主要表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等观点，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来的，后来实际上都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从反面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经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遭遇到严重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反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不是简单地恢复正确的观点，改正错误的观点，而是大大地发展了正确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等，从而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学习和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长期的重要任务。弄清这个理论同毛主席当年探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取得这个认识成果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从而理解探索之艰辛，加深对这个理论的理解。这对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时机。根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适时地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这是我们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任重而道远。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就是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和问题都会是很多的，有些解决起来还可能是很困难的。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正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的吗？我希望同志们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扎扎实实地干，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研究新问题，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并在探索 and 解决新问题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我讲了这许多，除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和怀念之情外，就是向同志们提这么一点希望。

我的话讲完了。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第172、223页，第223—224页，第379—380页。

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262页。

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

钱其琛

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对国际战略的运筹帷幄，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谨就这方面谈些个人的感受和认识。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从那时起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 100 多年期间，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侵犯和任意宰割。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设置租界，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驻军权以及种种经济、文化特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这是作者 1993 年 12 月 26 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考虑新中国的外交绝对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他高瞻远瞩，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毅然决定破旧立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还确定了我国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按照上述原则，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 110 个。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他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打扫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世界各国如何相处，毛泽东和周恩来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在对外交往中，他既反对傲慢自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要求不骄不躁，不亢不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是，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应当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务，都由各国自己作主，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各国之间相互学习。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当然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些主张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而一经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并在战后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外交，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远大理想。正如他在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当时国际形势相当紧张。人们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谈论刚刚出现的原子弹。1946年8月，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时也提出了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论点。后来他在阐述这个思想的时候，着重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我国东北边境进行空袭轰炸，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气势汹汹的美国面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顶天立地，不畏强暴，同时采取“后发制人”策略，在美国拒绝新中国一再警告的情况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下来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决策。1954年，新中国首次实际上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同其他与会国一起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控制台湾，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沿海受到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毛泽东坚定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1955年4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讲话，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经过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打谈较量，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国军威国威，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维护和平、说话算数的鲜明的独特风格。

调动外交全局的雄才大略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推行霸权主义，并威胁我国的稳定与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当时的形势相当险恶。毛泽东在提出反对美苏两霸的同时，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等待时机，准备调整战略。

对当时的苏联，毛泽东先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同苏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期望维护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周恩来访苏，为争取改善关系再次作出努力。但是苏方不仅拒绝中方的良好愿望，反而加强对我国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挑起边境冲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

在同苏联霸权进行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力不从心，正谋求从越南脱身。为了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毛泽东决定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并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同时旗帜鲜明地全力地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洲十三国的时候，提出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这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争取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改变对华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加快了同我国和解的步伐。毛泽东抓住时机,从乒乓外交开始,到1972年2月实现了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同他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确定了建立中美新型关系的原则。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终于结束了中美长达二十二年严重对峙的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实现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

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着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我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我国的朋友遍及五大洲,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毛泽东以他调动全局的雄才大略,为捍卫我国的独立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宝库中吸取营养,结合实践,常学常新。我们要学习他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学习他不怕压、不信邪、不畏强暴、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英雄气概;学习他满腔热情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

在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外交上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结合新的外交实践,使它更加丰富、完善和具有生命力,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了三十多篇主要谈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文章。这些著作中谈到的重大事件和反映出的光辉思想,都是我们十多年来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倍感亲切,体会更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外交思想同当前我国具体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方针政策。他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新成就。

首先,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科学判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论断,他明确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保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作出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

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并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第三、小平同志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他一再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小平同志还第一个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第四、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号召中国人民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第五、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一洗旧中国的耻辱。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要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通过接触和谈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可以实现统一大业的。

第六、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战略方针，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拓了崭新的外交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中国人民更加扬眉吐气了！

当前，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努力学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奋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使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以实际行动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最后，祝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胡绳

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在 1949 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 1943 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 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 30 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 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 1938 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

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 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 30 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 1927 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肉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

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 40 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 1941 年 5 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 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 年 6 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为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 1949 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 1949 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 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 1953 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目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

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例如陈云在 1956 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¹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1980 年邓小平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 1976 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 20 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 1957 年开始的 20 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 1956 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 20 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一笔抹杀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 50 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 60 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姿态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

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 1989 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 1989 年到 1991 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 30 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 30 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 30 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 1957 年直接走上 1978 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 and 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 1979 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80 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接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 6 月 13 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

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了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第80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8页，第304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2页，第30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11)《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页。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

邢贲思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伟大业绩，缅怀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建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哲人其萎，后世继之。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于毛泽东的是：您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您的离去而停滞，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您创建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也得到了新的重大发展。

—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达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称之为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国受屈辱的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成为独立的、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出一系列关于民主革命的新结论，从而冲破本本主义和外国经验的重重束缚，起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旧中国是多重矛盾的集结点，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容易使人们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对社会性质能否正确认识，是影响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如果社会的性质都不清楚，那么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等等也都不可能清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旧中国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它既非封建主义的，又非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重大发展，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赖以确立的出发点。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由于还保留着中国政府的统治，还具有某种半独立性，因此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从那时以后，在中国，封建主义已不再独占统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共同统治的局面。在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这三座大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力量薄弱并受三座大山压制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样的革命按其性质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同历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不同，它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因而是新型民主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两点：第一，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混淆，那种认为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革命胜利后，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再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所谓“两次革命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并以中国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革命的对象和性质明确以后，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组织革命队伍，依靠哪些阶级、社会力量来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可见，正确解决革命动力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又一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例如西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了三个关键：第一，必须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第二，必须明确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第三，必须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比起农民数量要小得多，但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是一个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是一个自己的劳动必须同他人的劳动相结合才能推动生产进行的阶级。这个阶级比起同样是劳动者的小生产阶级有明显的优越性：它的一无所有和饱受剥削、压迫决定了它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它同大生产的联系，使它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同其他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密切联系，决定了它具有集体主义和高度的纪律性。因此，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当然盟主，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所武装，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又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会使革命遭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几乎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农民同样受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思议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了占人口80%的农民，就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主体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根据农民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可分为自耕农（相当于中农、上中农）以及半自耕农（相当于下中农）和贫农。毛泽东指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是农村人口中受剥削、压迫最深的阶级。毛

泽东说“所谓中国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自耕农根据情况不同虽可划分不同的部分，但是自耕农作为小资产阶级，其整体都是中国革命的盟友。毛泽东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民主革命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敌我混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中农的侵犯。中农的向背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把中农排挤出革命的行列，把它推向敌人一边，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一。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最为复杂、最容易发生混淆的莫过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显示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卓越才能。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它是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如果是革命的动力，那么它同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往往发生在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这本身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不推翻三座大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可以参加革命，又缺乏革命的坚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而不应当把它拒之于革命的门外，更不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阵脚，特别要防止它篡夺革命的领导权。这就是毛泽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出发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

从革命动力的学说出发，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其要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党甚至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结成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等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发出，从别国的经验出发，中国的民主革命很可能走上歧途。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在旧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欧洲革命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左”倾盲动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破产。中国革命只得另辟蹊径。中国的大城市没有革命力量容身的余地，但是广大的农村却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的存在，造成了白色政权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样的现象，仅

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这种情形就为红色政权能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可以在这里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割据同反革命的武装割据相对抗。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作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尽管这条道路曾被“左”倾机会主义者嘲笑为“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但实践证明，这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富有独创性的革命道路，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打破了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几经曲折后，迎来了革命的转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我们党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另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筹划经济建设。由于从革命到建设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苏联的经验虽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又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比之民主革命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的探索阶段，一个新的长征——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征。在这个新长征中，我们既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也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当毛泽东和我们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而什么时候毛泽东和我们党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从主观的意志出发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时，我们的事业就遭受严重挫折。

民主革命胜利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都有人表示过怀疑。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俄国虽也是在落后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它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早已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从社会形态说不属于前资本主义。中国要跨越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回答。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组成部分和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在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一道鸿沟；又由于中国原来的经济落后，基础薄弱，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又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曾以萌芽的形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出现过。在该书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既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它所采取的国家形式，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第三种形式，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

说：“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泽东还论及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同样指出它们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带有过渡性质。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同于列宁的理论，因为列宁说的过渡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反映了中国和俄国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列宁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毛泽东既排除了否认过渡时期必要性的“左”的观点，又排除了主张长期延长过渡时期的右的观点，使我国得以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步使我国从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论断，并以自己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这是毛泽东在新时期最重要的贡献。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时期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虽部分地可作参考，但并不完全适用。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而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第二，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思路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他领导下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写下了新的光辉一页。关于对资本家赎买的问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曾经提出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构想并未付之实现。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它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创造性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构想，确立了定息这种特殊的赎买形式。定息不是一次性对资本家的赎买，而是通过资本家每年从企业分得一定红利和股息的形式，逐步实现对资本家的赎买。正是由于毛泽东创造了对资产阶级改造的这种形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最复杂的任务得以平稳地、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建设初期，由于我们自己经验不足，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很强调学习苏联。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经验可资借鉴。苏联的经验对我国的建设既产生过正面作用，也产生过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已暴露得很明显时，毛泽东毅然提出要摆脱苏联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已开始进行某些改革性尝试。这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的改革性尝试，突出地体现在他写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里明确地提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在苏联经验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当时，敢于对它提出怀疑，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这说明苏联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论十大关系》主要

是讲经济问题，强调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其中既涉及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又涉及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同苏联经验有所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新思路。尽管在当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但是这种探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思路的萌芽。

提出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泽东新时期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他纠正了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还以他的独创精神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后，大量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断直到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常常牵涉到人的精神世界，又鉴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常常同意识形态相联系，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容易发生混淆，因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特别讲到：“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这一学说能在实践中贯彻始终，就可以避免苏联 30 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混淆甚至颠倒敌我的悲剧重演，就可以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可惜，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理论，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反差，以致我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苏联的覆辙。尽管这一学说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但其理论价值不容抹煞，它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顶住苏联的压力，突破外国经验的束缚，率领全党勇敢地进行探索，并继续取得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认识不足，由于在理论上过份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作出了不恰当的反应，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我们党又不止一次地犯过违反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错误。

1956 年我国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的起点很低，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的幼年时期。在这种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决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在 50 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的情况下，毛泽东滋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以为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的力量，

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超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谋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建立一种近乎空想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都有一定的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什么是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反复。本来，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八大”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从原来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成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就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八大”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八大”的方针还未全面实施，1956年下半年起形势骤变，毛泽东没有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冷静的分析，而是夸大了阶级斗争因素，从而使他对“八大”的正确方针产生了某种动摇。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弱化、经济建设需要强化的情况下，反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从而使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发生了偏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受到了扭曲。这种认识上的偏执终于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形成，在这条路线影响下，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动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世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中国特色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天才。如同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其璀璨辉煌的一生中难免留下某种遗憾一样，毛泽东在其晚年也留下了这样的遗憾。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悲剧。这种悲剧的形成有其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不能过份苛责于毛泽东个人。同时，正如薄一波说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这段历史。综观毛泽东一生，他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76年，中国20世纪的革命伟人毛泽东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仍在进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毛泽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3—684页，第67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20—721 页。

转引自《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442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874 页。

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陆剑杰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胜利地领导了一场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剥削制度而开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久远未来的革命。研究毛泽东，就是研究这一伟大转折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在这一实践中所表现的卓越智慧和不朽精神。毛泽东被时势推上了崇高的地位，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机敏的政治战略家、旷古未有的大诗人，决不是偶然的。

全面地评价广博而深邃的毛泽东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本文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研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地位。

一、中国思想史的两次转折和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

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它同实践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既然实践决定观念、决定思想，那末，实践史也就决定了思想史。虽然由于思想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于一个实践时代来说，滞后的思想、现实的思想、超前的思想并存，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图景，然而，就思想史的主轴而言，它必定是同实践史并行的。

全部中国实践史，是由生产实践史、科学技术史、社会关系变动史三者构成的统一进程。这部历史经历了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公元前 2000 年之后。这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转变，由此引致漫长的奴隶社会和更加漫长的封建社会。第二个转折发生在近代以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败绩、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自为阶级的新条件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完成这个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中国剥削阶级尚存的最后篇章，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结束剥削制度，向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时代推进的辉煌序曲。过了没有几年，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有一些性急，有一些粗放，但从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全程看，它毕竟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同这样的实践史相应，中国的思想史也发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同原始公有制社会形态向私有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相适应，发生了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从而在完整意义上掀开了思想史的第一页。毛泽东在谈到哲学的产生时说：有了私有制和剥削，一些人才“能够解除劳动，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绝大的跃进。”思想体系产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跃进本身有一个过程。就中国而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才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形态，而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则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孔学之所以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是它为封建统治如何巩固、封建秩序如何维护，制订了一套理论观念和伦理准则，任何一代封建统治者都急切地需要它；另一方面它在伦理学、教育学、知识论、实践论等领域有着不具阶级特质的中性内

容。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转折是由孔子为代表的学者群实现的。这样，孔子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转折是，同私有制社会形态向公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相适应，产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亦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它的出现是一次更加伟大的跃进。在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钊、鲁迅、李达，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构造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的，是毛泽东。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最重大的转折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学者群开辟的。毛泽东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未来的路还长。我们的思想还将有伟大的发展，我们还会有更新的、站在时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现，但是为新时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泽东。

二、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的特殊品格

称得上“思想家”的，必有其一般品格。每一思想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各异，阅历和教养相殊，文化背景有别，又具有各自的个性。黑格尔不同于康德，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老子不同于孔子，鲁迅不同于李大钊。特别是划时代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个性魅力融合为一体。从这样的观点看来，毛泽东具有独特的思想家品格。

（一）站在民族历史的转折点上，高瞻远瞩，面向未来。

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现实的思想家。毛泽东面对极其严酷的现实：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国家体面日损一日，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革命和革命战争屡战屡挫。他不能不专注于现实的把握，于是有“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的谦敬心态和“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的强烈呼喊。

但在另一方面，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观察中国的未来，不能不考察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现实的革命是作为迈向未来的决定性步骤而展开的，这使毛泽东既具有现实理性又富于历史的激情。谈阶级斗争联系着世界大同，谈革命战争联系着永久和平，谈发展资本主义联系着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并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的性格特质。

（二）立于世界纵横的座标系内，学贯中西，重在创造。

毛泽东的立足点，就历史的纵座标说，处在过去和未来的界面，就世界的横座标说，则位于当代世界矛盾的一个焦点。毛泽东的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现实立足点上站起来的思想家，不能不是饱学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家。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深湛修养是人所共知的。他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钻研用了从少到老的长久的功夫。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书橱”，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由此，中国文化的因素就融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系，整合为这一体系的有机部分。毛泽东强调地提出了“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观念，前者见于1964年9月25日的一次批示，后者写在1939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用“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概念，

评价过去的哲学，并通过使它们转化为客观真理和全面真理的方法，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归并。典范的例证之一是：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批评说：孔子之言，“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按：即唯心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如果孔子的‘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这里，展现了从“片面真理”向“全面真理”转换的过程和机制。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全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曾苦心研究西学，这史实也属众所周知。而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心研究和诚挚接纳，更使他在思想上成熟起来，为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显然，学习古今中西，为的是创造新的思想。毛泽东终其一生是创造性思想家。1918年、1919年间，他就注目于思想的独创，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最确的真理，伟大的事业，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最重视的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强调思想的创造。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一以贯之的创造精神，使他能够满足一个创造性时代对思想家的要求，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创造要求探索，不免付出代价。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不能掩盖他的创造性思想家的光辉。

（三）基于具体实践的深厚渊源，取自群众，归于群众。

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其资料取于“古今中外”，那末，他的直接基础，仍是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具体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深刻性决定其思想家的广博、辩证和深邃。如果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不是那么艰难，思想家们就不会强调“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¹¹⁾；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曲折，思想家们就不会批判“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¹²⁾的错误观念，要求自觉地走曲折的路；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复杂，不断面临歧路的选择，思想家们也不会提出“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要求“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¹³⁾。

一切思想家的思想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毛泽东与中国过去的思想家的大不同之点，在于他自觉地把思想创建工作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根植于群众之中。他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的认识路线的新公式。他对英雄豪杰在这条认识路线中的作用给了一个定位性判断，他们不过是群众认识和群众实践的中介，起到一个“加工厂”的作用。⁽¹⁴⁾这就同康德的先验认知结构理论发生了批判继承的关系。

（四）长于思想材料的加工制作，注重实证，要在“大本”。

毛泽东兼具实践家与思想家的双重品格。他既极其重视实证材料的把握和积累，又具有超常的思维能力。从毛泽东的先进的“加工厂”中不断生产出思想的精品。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亲自做调查工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有“调查的技术”一节，表明他是极其重视并带头做实证研究的思想家。这一点，他不同于黑格尔一类的思辩的哲学家和逻辑演绎的著作家。

但是，毛泽东又同时重视察知事物的底里，把握事物的根本。朱熹有言：“大本不立，小规不正。”⁽¹⁵⁾杨昌济扬弃朱熹称为“太极”的“大本”，要求把握宇宙的“大原则”⁽¹⁶⁾。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极为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真正把“大本”控握于手掌之中，这就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毛泽东又不同于未知“大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更不同于那些实务主义者。

毛泽东游历于实证知识和哲学大本之间，不断地融合二者，产生出丰硕的思想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对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组织原则等问题有过反复的争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总结这几次争论。毛泽东高于他人之处在于，他把这些争论深化到哲学世界观层次来穷根究底，论明所有历史争论的哲学实质，并从而提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党探寻着建设之路。这时，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为人们所信服的原则和方针。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对“大本”的深厚素养。

（五）吸纳时代精神于一己之中，博大如天，精深似海。

作为领导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的一代伟人，作为吸纳古今中外之精华、中国人民之智慧于一己的划时代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位具有多方面秉赋和才能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要解决列宁所说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把一般共产主义理论“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革命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¹⁷⁾，这样，毛泽东就不能不是辩证法家；这个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此，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和无可争辩的统帅；这个革命的诸方面政治关系极为复杂，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¹⁸⁾，因而，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机变的策略家；革命中存在着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这两条战线，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领袖。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斗争的壮阔，客观上要求它的领袖的博大。有此博大，领袖之职胜任愉快，无此博大，虽可一时居顶，然难以真正坚持不渝。

在博大的基础上毛泽东可能成为涵养精深的人物，他在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人物。由博大而精深，其精深必在贯穿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毛泽东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巨大财富

17年前，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遗留下许多的东西，有不朽功绩，也有令人遗憾的失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就毛泽东本人看，以下诸点似更有久远的价值。

（一）他留下了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

毛泽东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对事物、现实、感性，既要从客体方面

去考察，尊重它对于实践者的客观既成性和实在性；又要从主体方面去考察，把它看作主体实践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从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后者，因而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了解前者，因而成为精神决定论；二者殊途同归，都“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9）}毛泽东则紧紧地把握住“实践的唯物主义”^{（20）}精神，这是真正科学的哲学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不是把能动性只当作意识的功能，而是当作人的功能，人的本质。他不是离开客观的实践条件去规定能动性，而是把掌握和切合客观的实践条件当作自觉能动性的固有规定。不是非实践地谈论抽象可能性和同样抽象的现实性，而是把二者统摄在实践的结构之中，并确切地指出，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是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性条件。由此，他提出：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辩证法在中国的任务是“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2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落伍的民族，这种自信、自力、自强的能动精神是最可宝贵的。

正如“自觉能动性”内渗着客观现实性一样，毛泽东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地内渗着自觉能动性。许多人把这些原则当作是无主语即无主体的，当作是直观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单纯客观性。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有主语即有主体的，这就是从事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是在表述上省略而已。我们是为了正确发挥主体创造性才去讨论求实问题的；如果不为实践，不为改造，不为创造，不为开拓，要实事求是干什么呢？

把既高扬主体能动性又客观考察实践条件二者结合起来，从而自觉地创造中国的历史，这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宣传并付诸实践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对立和共有弱点的克服及由此作出的最基本总结。

（二）他留下了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

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是“三大规律”的并列套用，也不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分法所能容纳的，它的精髓在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个性是具体实践性，共性是普遍理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就是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统一和结合。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的理论辩证法用之于决策，外化为实践，展开为自觉实践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从实践所展现的辩证过程中概括出理论辩证法的新原理和新结论。这里，理论形态的辩证法和实践形态的辩证法不但是相互转化的，首先是相互渗透的，其基础和总体则是实践辩证法。

毛泽东辩证法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展现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他的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以拉对拉、以打对打”的两手和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及它们在实践中展开，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辩证法。不但如此，毛泽东又从实践辩证法中发现新的辩证法要素，概括出新的辩证法原理。既然在全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必须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前提，既然向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必须适可而止，实行休战，那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就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就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相对性。于是

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法新结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22)

毛泽东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又有其生动的展开。他的从战争“盖然性”中把握战争趋势的认识论；他的“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能动决策；他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发展选择；他的把歼灭战和击溃战结合起来的中介战法，都是最生动的实践辩证法。在较早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强调“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实际的情形常常超出在“歼灭战”、“击溃战”中的“非此即彼”的极性选择；显示出“歼灭战”、“击溃战”中“亦此亦彼”的选择的必要性。毛泽东由是作出结论：可以而且应当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半歼灭半击溃”⁽²³⁾的作战方针，这无疑给辩证法的“中介”范畴一个确证，同时提供了一个实践辩证法决定理论辩证法的证明范例。

对毛泽东的辩证理性，我另有专文⁽²⁴⁾详加论列，在这里，我只是指出：毛泽东把前人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竭尽其运用之妙；毛泽东又从新的实践中“生产”出新的辩证思想，展示其创作之才。

（三）他留下了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严密逻辑。

正如马克思“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²⁵⁾一样，毛泽东也留下了《论持久战》的逻辑，《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逻辑。凡是读过钻研过毛泽东的这些著作的人，无不感受到它们的“钳子”般的掌握读者的强大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描述和规范的密切结合。他在自己的规律论中，区分了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²⁶⁾。前者是客观地存在的，主体的任务是加以描述；后者是实践的规律，虽然也有客观必然性，但其功能是直接规范主体的活动。他的大多数著作是解决战略和策略的规范性问题的，但是，他对于规范的论证总是以正确地描述实践的客观条件并揭示其客观规律为前提，因而，他的文章就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所提出的战略和策略也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归纳和演绎的密切结合。他经常说，他的方法是从大量的为人们所感知的现象出发，从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展示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现实，并透视现实的变化而预见未来的发展。读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尤为信然。但是，毛泽东的逻辑力量不仅在于归纳，而且在于演绎，在于二者的结合。这里，最可贵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彻底性或坚持性。对于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适性原理，毛泽东竭诚坚持，认为在其所适范围之内决无例外的可能。毛泽东把这些真理看作“普照的光”，用以推论特殊事物的本质，同时研究现象，加以验证，从而形成不同凡响的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分析和综合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是矛盾方法论的大师，而所谓矛盾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于单一矛盾而言，分析是研究矛盾各方，综合是把握矛盾总体；对于矛盾群体而言，分析是研究各个矛盾，综合是把握矛盾现实。矛盾方法是描述的——再现既成的

矛盾结构；矛盾方法又是规范的——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变革的目的。矛盾方法是演绎的——从矛盾共性推知矛盾个性；矛盾方法又是归纳的——从矛盾个性找出矛盾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逻辑就是辩证矛盾的逻辑。

（四）他留下了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

伦理问题一贯是中国思想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儒家尤为如此。孔子提出“仁”的学说。郭沫若曾经认为：仁“是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27）}。但孔子自己说：“克己复礼为仁”^{（28）}，约束自己，纳入当时的典章制度规范才是“仁”。可见“仁”的真实含义仍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伦理思想是中国历史转变到私有制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作为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转折时代并面向已见曙光了的久远未来的思想家，才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之上，才提得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口号。

但毛泽东并不否认个性，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并不否认当前的直接利益。相反，他主张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统一起来。他在一方面，主张这些矛盾方面相互间的统一性。他在党的工作上无数次地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29）}，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30）}。只有革命成功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满足。他在另一方面也承认上述矛盾方面相互间的排斥性。对于克服这种排斥性，他提出了道德层次性要求。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决定他们应当遵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原则。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则只能推广“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31）}。

（五）他留下了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对于文学创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实，这不但是他所主张的创作原则，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特具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蕴含。其一，是黑格尔式的“巨大的历史感”^{（32）}。他站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整个时代的山巅之上。回首以往，通观着人类自生成到实现资本主义的数百万年；前瞻未来，共产主义已不是幻觉，不是空想，而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所包藏并作为一种运动正在展开的前景。他又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上。民族痛苦呻吟的时代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结，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已经成为直接的奋斗目标。这就使毛泽东在理性上充满着雄浑的历史精神而在感性上洋溢着气吞山河的豪迈诗情。其二，是宏伟的宇宙观。他立于现代科学的基地。现代科学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或者说是对于世界属性的确证。人的视界和实践领域已超越地球，达于太空。环宇尽收眼底，不能不使人产生豁达的气概。于是，有了毛泽东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诗句，产生了他的藐视困难的伟大进取精神。其三，是巨时空的战略视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同他的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联系在一起。在战略家视野里，历史是暂短的，全局是微缩的，他小视诸多细节，渺看各样困扰。这种整体感诗化之后就衍生为浪漫主义。

但在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气质

在他身上有一个相当好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内涵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但他在某些历史关节上，也发生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发生向全面性的一面的偏斜。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有时似乎浪漫主义更浓重一此。这使他在晚年产生过于理想化的社会设计，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使他在60年代中期不惜战术代价而谋求战略利益，弄了一次大险，结果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战略失误。

毛泽东不是完人，但仍是一位伟人。毕竟是胜利地领导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³³⁾”；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实践经验、人民智慧、时代精神的集中者，他成为一位卓绝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是永垂青史的。

四、毛泽东思想家地位的现实确证和历史影响

毛泽东逝去了，但他又活着。毛泽东的伟大业绩的不同方面，将随时代的发展而取得不同的位置和发生不同的影响力。我以为：他最具久远影响的是在思想方向、精神气质方面。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将随岁月的迁移而日见其重要性。

思想家毛泽东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他的非凡的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上。这个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对此有过反复的说明。邓小平在1992年巡视南方的时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³⁴⁾。这是真诚的话，也是关键的话，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表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基本的继承关系。

思想家毛泽东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实践紧迫地需要他，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³⁵⁾一样。

——中国正在发展，尚未摆脱贫困。中国人现在未到享乐的时候，诸如“大款”、“大腕”宣传所造成的“富贵气”，毕竟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民需要毛泽东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和奋斗精神。全民奋起，自力自强，只有形成这种民族气概，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正在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破题。一切以为我们已经什么都懂得了的自满，同样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最需要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好路”、“新路”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³⁶⁾。这也正是思想家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

——中国正在探索，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比别的国家要复杂得多，简单的、片面的论断只能使我们屡兴屡挫。中国迫切需要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理性。非辩证、非理性的东西使我们不断吃亏。中国的事情只有用全面性的坚定和中介性的灵活才能办好，才能较为顺利地向民族振兴的目标推进。

——中国正在建设，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有人希望维护自己所理解的道德纯洁而束缚改革的手脚以至废弃改革；也有人鼓吹牺牲道德进步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这两种主张都是非辩证思维的主张。中国

仍然需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双层次、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结合的道德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每一市场主体都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下，市场主体所追求的利益，特别是公有制市场主体的利益，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就会存在，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利益无私奋斗的思想也就存在。这就是说，毛泽东的伦理方针仍然有其客观基础，它是不可磨灭的。中国还穷，在国际关系中并未摆脱被动性，在国内生活中也有加快振兴的紧迫性。中国需要一批无私无畏的人作民族脊梁，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大业，中国共产党人正应都是这样的人。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需要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向个人本位突进的舆论导向不合中国的国情；宣传“大款”、“大腕”们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是国运的不祥之兆。断不可再继续下去。

——中国正在振兴，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的前进道路多有困难和险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需要毛泽东那样的乐观态度和坚韧精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化气质。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不能是只图眼前小利的委琐的一代，而应当是深明民族大义、具有广阔胸襟、把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的豪放而求实的一代。

毛泽东在当前的思想影响其实已经证明，这种思想影响将是十分久远的。因为当前现实的需要本身就具有久远的意义。试问：难道会出现一种不需要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不需要把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不需要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逻辑力量，不需要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不需要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的社会条件吗？这是不会出现的。既然如此，人们就将永远记得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活动的、开创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毛泽东。

孔夫子和毛泽东很可能是中华民族史册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顽强，其后学接力式绵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个的旧时代，而毛泽东则开辟了结束中国剥削制度、奔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新时代。孔学支撑着旧时代的民族魂，而“毛学”将对中华民族新魂的最终形成发生最为深刻的影响。让历史来检验和证明这个判断吧！

（作者单位：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注释

(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3 页，第 16 页，第 48 页。

(13)(21)(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16 页，第 262—263 页，第 311 页，第 374 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41 页，第 144 页，第 144 页。

(12)(30)《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09 页，第 154 页，第 130 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4 页，第 563 页。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 年 2 月 21 日《湘江评论》增刊第 1 号。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20 页。

参看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35—36 页。

(11)《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74 页。

(14)《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1—92 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9 页。

- (15) 《朱子语类》。
- (16) 杨昌济：《论语论钞》。
- (1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1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
- (23)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 (24) 见拙作《论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践性》，提交1993年10月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论文。
- (25)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 (26)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183页；《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
- (27) 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 (28) 《论语·颜渊》。
- (3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
-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33)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34)(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第372页。(35)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

卢培琪 王立胜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议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 30 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 年 4 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 17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 30 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 1930 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 1938 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 20 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 1930 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

。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丧送了中国的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了毛泽东把握理论、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拉特·施拉姆所断言的那样：毛泽东“已完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全身心地投身于世界革命。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仅仅为其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国际性与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郑重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休息，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的是使马克思主义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能动地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认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应该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照抄经典作家书本、照搬苏联经验和盲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现实化；另一方面是指，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部分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去，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因此，毛泽东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运用和发展，经典作家们也曾明确表露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意向。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原则，最先明确提出这个原则的是毛泽东。1929年，为了纠正红军中的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和方法，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里讲了两条：第一条是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这是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条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是讲的尊重中国实际。古田会议讲的这两条可以看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雏形。

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大推进了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即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首次明确提出了“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积累和丰富，党和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提高。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公式提了出来，

并把是否善于“结合”看作我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以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根本准则，其内容也随着实践的发展日益丰富和深化。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不仅对普遍原理要结合的具体实际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而且还就“结合”本身阐明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以指导人们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结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定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他所说的尊重事实并不是尊重表面的事实，而是事实的本质、规律。因而，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就绝不是单凭感性经验（割裂了个别与一般、实际与理论）认识事物的经验方法，而是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科学的思维原则，也就是在一般原理和具体实际的结合上理论地反映对象的思想原则。而这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结合”要走群众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一方面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只有到群众中去和到实际中去作调查。因此，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是实现“结合”的主要环节。

——“结合”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它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胜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回顾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当然，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并不是要否定争取外援的必要性，相反，他还特别指出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外援，只是要求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结合”是个创造性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在谈到怎样才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很明显，毛泽东把“创造”归结为“相结合”或“中国化”的标志和本质。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讲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

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基本途径：三个著名公式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所阐明的三个著名公式，实际上是他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的简明表达。

第一个公式：实践——理论——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辩证运动的实质即是对立双方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告诉我们，中国化过程中“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辩证运动必然会结合成新的东西。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践化、现实化，使中国这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运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将不断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必然发生二者的双向转化，一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二是实践向理论的转化，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双方的辩证矛盾运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正是依据理论与实践辩证矛盾的这种实质规定，提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在这里，前一个“实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的实践活动，“理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经验进行概括而取得的新的理论认识，这里已经结合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后一个“实践”是指在已经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将进一步纠正原有理论的不足，从而使理论更加完善，对未来实践的指导也会更有成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辩证运动中不断实现的，并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

第二个公式：个别——一般——个别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一般，各种具体的实践是个别，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毛泽东将个别与一般辩证矛盾运动的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号召大家，要“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12）}。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前一个“个别”是指领导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目的是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来作为全面开展工作的指导；“一般”是指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和指导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时总结出的一般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结晶。后一个“个别”是指用已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其他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这个指导活动将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已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工作方

法，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都是在这个矛盾运动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要通过这个辩证运动来开辟自己实现的道路。

第三个公式：群众——领导——群众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毛泽东将这个统一具体化为相信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与革命政党马克思主义科学领导的有机统一，并提出了实现这个统一的公式：群众——领导——群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具体论述了这个公式的内容：“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3）}。

在这里，领导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群众的具体活动代表着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坚持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实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一般与个别、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辩证运动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

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是由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所谓一般方法，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基本方法，它是具体方法的基础。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提出并大力提倡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毛泽东曾反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使我们具有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一向重视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法。他所周密论证并大力倡导的矛盾分析法，其着重点是置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问题上，并把它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加以强调，目的就在于启发人们要牢牢掌握这一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和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具体方法，是指建立在一般方法基础上，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具体的方法。比如，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方法，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方法，关于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辩证方法，以及一些具体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两个层次，相互渗透，有机统一，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

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总结升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应用性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应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理论特色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在理论内容上，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然而，毛泽东思想又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注重政治伦理的优秀传统，这样，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就具有了明显的伦理性。这不仅表现在关于道德方面的思想学说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在他善于把真理的力量内化为人格力量，把历史尺度内化为人的价值尺度，从而实现了真理与伦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有机统一。事实上，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都既是真理性的命题，又寓高尚的道德伦理于真理内容之中：“实事求是”是忠诚老实的人格化身，毛泽东经常把实事求是的真理性要求同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伦理要求同时并提；“群众路线”体现了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不仅是我党寻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也是我党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则展现了傲然挺立、凛然风骨、自强不息的道德追求。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真理与道德相统一的二重风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起到了巨大的内推的作用。

——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由于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由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也由于受中国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影响，毛泽东思想虽有严密的逻辑构成，但其着眼点不是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是着重于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操作，虽注重真理的科学价值，但不是从纯理论的真理性本身来肯定理论的意义，而是结合运用的实际效果来评判理论的价值。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实践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心目中的真正的理论，应当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并能直接服务于实践的、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理论。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化为科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易于掌握，因而，传播面广，速度快，应用范围大而效果好。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一再证明。

——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特色是理论主体的群众性。这一特色是与上一个特色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理论的实践性也就决定了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关于理论主体群众化思想的基本根据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必然要充当理论的主体。他曾反复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

本里解放出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他明确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¹⁴⁾。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工作。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对工农兵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步骤。建国后支持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目的也是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和通俗化要求的主旨，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

——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可通约的方面，那么，民族化则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它无疑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首先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才能实现。尽管这是表层的，然而却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人工符号，人类语言积淀和浓缩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符号系统的变换中，就同时打上了民族本位文化符号特征的烙印。196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曾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它实则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一方针标志着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化，通过本位文化的“此在”状态下的主体性存在而实现某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意味着这是基于民族性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许多成功的尝试，最富有代表性。他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这些语言形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又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逆向渗透。再从表达方式上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风格。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常带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其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无不偏重于比喻和象征，即通过隐喻来达到描写和证明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显明特点，对此毛泽东作了批判地继承。他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过类比和象征，使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种对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可理解性和清楚明白性的程度，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

——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历来是革命导师所重视的问题。列宁为了强调通俗化的重要性。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本质上是易于为广大工农兵阶层所接受的，然而，不可否认，异域文化的特点以及语言翻译上的障碍，特别是广大群众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中国人很难通过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去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做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是有价值的”，即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科学性，应当是通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为我们系统地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问题，而且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亲自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光辉榜样。如他用“两个对子”来说明哲学基本

问题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功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来说明实践出真知

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道理；用“弹钢琴”来说明党委书记应采取全方位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用“纲举目张”比喻抓主要矛盾以带动次要矛盾解决的道理；用“解剖麻雀”比喻由分析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逻辑方法等。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分析和研究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经历过艰难与曲折，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是又一个历史丰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将随着中国建设实践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深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为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534页，第707页，第534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¹⁰⁾，第702页。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52页。

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1期，第82页。

⁽¹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第111—112页，第297页。

⁽¹²⁾⁽¹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第900页，第899页。

⁽¹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杰出贡献——对几种观点的评析

王素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因此，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意义进行全面、公正和客观的研究与探讨。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正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而且也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必须承认中国历史发展具有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与传统文化相冲突和相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对立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他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由肤浅、贫乏到深刻、丰富的认识发展历程之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解决得成功与否，与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实践经历过曲折的发展历程，也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在同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

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由于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而能够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得到成功地应用，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但是，普遍原理虽然揭示了同类对象的共同本质，但又是以舍弃同类事物的特殊本质与差异性及多样性为代价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普通原理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说明具体问题，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革命条件和环境里“具体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即要实现“中国化”。

自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苏联的经验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为转折点，这两种态度从观念上的分歧发展为思想路线的冲突，并且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与必然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相统一的产物。在这一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具

有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环节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中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特征。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在1937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继续深化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途径的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联结的核心问题出发，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次同时使用了“实事求是”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的创造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根本尺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这样的界定：“‘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很显然，从“实”中“求是”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守旧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地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要“有的放矢”，而“无的放矢”则是教条主义的根本特性。毛泽东推荐给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同志看的四篇文章之一就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指出：“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理论化、整体综合化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最初的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到延安时期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其意义是巨大的，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因此，在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时，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把握住“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从而揭示出毛泽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贡献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二

毛泽东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其中无疑包含着改变共产国际和苏联控制中国革命局面的状况，以便使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仅仅以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即以中国革命的“外因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意义，则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同样，以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国际主义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相冲突，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意义。

从中国革命产生的动力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然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一种相反的评价模式，即认为中国革命乃是共产国际控制中国的“阴谋”，是莫斯科操纵的产物，因此，所谓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思想”亦不能成立；由于中国革命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革命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这一评价模式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归结为“权力斗争”的动因。即便是在较公允的西方学者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权力斗争”往往被用来作为毛泽东主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动机之一。

上述评价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在于中国国情特殊论，即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本质，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和发展。回顾本世纪初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曾有过十分悲观的预测与评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是俄国革命的复制品，因此它缺乏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基础和动力；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性质上相去甚远，因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命运，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结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这种中国国情特殊论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适用性，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过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也正如艾思奇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已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有极高度的组织性

和觉悟性，有它的强大的党、有近二十年的战争的经验，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模范的战争成绩。因此，也就有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¹¹⁾显然，中国革命“外因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并不能掩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基础和动力，也不能否定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思想发展史上还曾经有过另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文人叶青就声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¹²⁾叶青认为，“化”常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却只能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精通”等范例，找不到“改作”、“创造”的字眼，因此便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未“中国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具有“国际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共所主张的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相冲突，不可能同时两个命题都成立。

针对叶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歪曲解释，艾思奇作了回答，艾思奇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另有所“化”，或者化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来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¹³⁾。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作文字游戏和在名词上争议不休。再次，“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和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¹⁴⁾。最后，从理论原则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真理包含着国际主义形式与民族形式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中国化，而且必须中国化⁽¹⁵⁾。

历史发展的实际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即产生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¹⁶⁾因此，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揭示这一过程的历史发展，否则便会陷入一种片面的认识之中。

三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当然包含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过程，其中包含着创造与发展的要求。然而在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及意义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极端化的认识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要么看作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即所谓“儒化”；要么认为是削中国文化之“足”，适马克思主义之“履”。这里涉及到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毁灭者，相反，他们认为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是中国革命走向深入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整顿自身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¹⁷⁾

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认为继承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不仅是把握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重要步骤，而且还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基础和必要环节。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¹⁸⁾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排斥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积极吸收，这一点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正面肯定。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他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始于 30 年代，而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初，这与毛泽东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熏陶形成了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思维特征。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来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¹⁹⁾。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毛泽东能够对中国革命做出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²⁰⁾

同施拉姆一样，西方“自由派”学者一般都肯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然而他们却倾向于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夸大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异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未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因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同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是“儒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变形”过程和向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首先，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传统文化要进行批判地吸收，不能兼收并蓄，要分清“糟粕”与“精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有些论者认为，上述主张只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任何文化方针都有时代的特征，同样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也要反映这一特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就“国民精神总动员”发布过指示，其中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提倡为民族、为精诚团结、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为争取抗战建国最后牺牲而奋斗，而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来养成奋发有为、朝气蓬勃、大

公无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²¹⁾要求“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民族道德，是对古代的封建道德的扩充和改造。这里的“唯一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的事物而得其当谓之义。”⁽²²⁾承继于传统，以拯救民族危亡；确立新的标准，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一点在上述指示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同样这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

其次，在文化选择的原则上，毛泽东与“五四”时代的主题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毛泽东力图避免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偏颇。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²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即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既避免了复古主义，也与“全盘西化”论相区别。如果把后来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和“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左”的东西，逆推为毛泽东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便包含着的因素，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倒多少有些历史宿命论的意味，似乎中国人永远也脱不出传统文化的桎梏。这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文化创新意义。

从一般的原则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而所谓“失误”、“失真”、“变形”与创造性毫无共同性可言，相反，它们却是应该在创造新文化过程中被批判和被排斥掉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但是这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就错了。

毛泽东通过“民族形式”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取得了巨大成就，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在中国文化的重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主题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四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中国社会发展之路，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一条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然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呢？国外有些学者根据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因而“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此断言，中国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

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²⁴⁾。

首先，我们认为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判定具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就直接影响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表明，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得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倾向于把他所发现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看作一种典型发展模式，并以此来探讨和衡量非欧社会的发展道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欧洲社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而非欧社会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矛盾四起，非欧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和关注，他开始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并修正了自己原先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²⁵⁾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坚决反对把多样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只限于欧洲各国⁽²⁶⁾。他已经预感到：非欧国家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²⁷⁾马克思晚年的思索对于东方各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首先是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各具特色，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易的社会发展模式；其次是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传统条件下，东方国家有可能最少波折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而又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整个构想中，实际包含了两种类型、即欧洲向社会主义过渡和非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东方国家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问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空白，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贡献和理论发展。

其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既要避免官僚与垄断资本所带来的弊端，又要肯定民族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民粹主义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批判性。因此，以民粹主义影响来揣度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和实践是缺乏根据的。

第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来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以民粹主义的小生产意识和道德义愤来否定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即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状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²⁸⁾，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这一经济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²⁹⁾，据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坚决批判了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化不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更不

可能以封建经济为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所强调的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國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根本之点还在于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即在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并未背离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拒斥资本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与发展经济的要求相一致，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这也与民粹主义所追求的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小生产方式相区别。1943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稍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为此，“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³⁰⁾

工业化的目标如此强烈地吸引毛泽东，除了上述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认识到它还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之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因此，毛泽东指出：“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任务。”⁽³¹⁾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注意经济工作，以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必要的知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意义：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³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方向，他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为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这之中出现过若干失误，但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始终是通过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它不仅保持了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性，也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³³⁾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的确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误的重要思想认识根源，但是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毛泽东的整个社会发展思想都是以民粹主义的乌托邦为基本出发点的，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成功与飞跃，似乎毛泽东只要“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迹，就必然倒向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此外就不存在毛泽东进行创造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空间了。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对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根源的分析是比较全面和中肯的。薄一波认为，毛泽东的失误有四个因素，首

先,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扩大了这些概念适用范围的问题,即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理解上的失误;其次,有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再次,可能还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其中有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所接触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新村运动”的影响;最后,还可能有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如中国历史上“五斗米道”的平均主义的影响⁽³⁴⁾。如果我们把后两个因素夸大,看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难免会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意义作出简单的、抽象的和片面的判断。

历史发展证明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造。毛泽东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开放和“世界历史”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经过了历史的曲折之后,依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现实政策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对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进程作深入探讨,不能把其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结论绝对化、片面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创造性。由于受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和实践特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现出在理论和实践中多层次深化与多方位展开的历史特点,而它们在顺序上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有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从个别到一般、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因此,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要求来评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第40页,第40页,第41页。

(23)(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5页,第844页,第832页,第10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5页。

(3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第64页,第264页。

〔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5页。

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11)(13)(14)(15)《艾思奇文集》(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第480页,第481页,第486页。

(12)叶青:《论学术中国化》。

(16)(18)(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533534页,第675页。

(19)(20)〔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第46页。

(21)(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5页,第58—59页。(24)〔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0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8页,第450—45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3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页。

(32)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9—776页。

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 中国化

邝柏林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动，中国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大变革。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思维方式的大变革中，毛泽东也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为指导，对中国思维方式进行了变革和改造，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现代化。学界对毛泽东的革命业绩和毛泽东的思想已作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本文只就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作一初步探索，提出一些粗略的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学界。

—

鸦片战争以后，时代已转变，中国社会也在转变，中国人面临着要解决独立、民主和实现现代化的新历史课题，传统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须要变革转型。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经历了“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五四”以前思维方式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严复等人以竞争进化观批判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和循环变易观，以科学实证方法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传统的唯圣唯经观念和脱离实际的经学方法，以逻辑分析方法克服传统的整体直观（直觉）思维的笼统模糊性。另一方面，龚自珍、谭嗣同等人夸张自我“心力”、意志的作用，以唯意志论批判和否定传统的天命论等。到“五四”时期，新派人物提出“打倒孔家店”，破除孔教迷信，打倒老教条，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在这些批判过程中，中国思维方式逐渐从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便迈进一个崭新的阶段——向现代型唯物辩证思维方式转变。

早年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思维倾向基本上传统型的。1917年他给黎锦熙的信，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宇宙之真理为万物的“大本大源”，掌握了这个“大本”的圣人，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这无疑是传统的圣人崇拜、神秘性的天人合一思维，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早年毛泽东又注重务实，讲求经世致用；主张知行统一、重在实行，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正面与负面，对毛泽东都有相当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在近代思维方式变革潮流的激荡下，青年毛泽东日益趋向新学，思维方式在逐渐起变化。在这当中，严复宣传的进化论、近代经验论的科学实证方法、分析方法，谭嗣同等人鼓吹的自我冲决网罗的唯意志论，杨昌济的关于珍视中华民族优秀思维传统的教导，对青年毛泽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五四”前，毛泽东读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从这部书中受到启发，开始对传统思维方式提出若干批判。他借着该书中一些唯物主义经验论观点，批判了传统的先天直觉思维，断定中国传统的所谓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从容中道”，是“不可信”的。这在一

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圣人迷信。另一方面，他从书中一些强调个人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得到启悟，写了《心之力》，以唯意志论思想反对传统的天命论。

在“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于现实斗争，思想在不断跃进，思维方式也发生明显变化。他越来越倾心于从客观现实世界中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7月，他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经验，得到了两个重要的认识：1.“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很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已接近于唯物史观。值得我们注意的还不在于这个认识本身，而是他达到这一认识的思维路线，那就是面向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束缚”。这与他过去遵循传统思维的路径，以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在道德人心，解决问题靠的是掌握“大本大源”精神实体，因而“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简直是截然相反的；与强调自我主观意志的唯意志论，也绝不相同，可以说，到“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已开始摆脱传统的乃至近代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

毛泽东积极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是：一是反对开口闭口“诗云”、“子曰”的老教条、老八股。二是反对传统的唯圣唯经的“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三是反对孔子偶像崇拜。对于“诗云”“子曰”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的演绎式独断，严复等人早就提出过批判，反对孔子偶像崇拜是“五四”的潮流。青年毛泽东是顺应了近代思维方式变革历史潮流的，但是他的思维又很具有特色，这主要就是：

第一，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空虚思想。严复提倡近代科学实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在中国近代引起较大反响。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提出反对“空虚思想”，但是，严复等人只是一般地宣传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科学实证，毛泽东则进一步从改造中国出发，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而且，他身体力行去进行实际的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

第二，以带有辩证性的分析方法，反对传统的笼统混杂的思维。针对中国古代偏重于整体思维，分析思维不够发达的情况，近代自严复以来，即注意提倡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也受此影响。他认为，做学问如果不采取分析的方法，“固未可以蘄其精”，中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但是，中国近代许多人的分析思维方法，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机械性的，比如，关于东西方思想文化，他们片面强调二者的差异、对立，极力赞扬西方，贬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毛泽东则认为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有精华，也有糟粕。与同时代人相比，毛泽东的分析思维是比较深刻的，带有较多的辩证性质。

第三，注重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毛泽东既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反对中体西用论，也反对忽视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的西化派观点。他认为，从过去世界文明的发展来看，“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就是说，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不容忽

视的价值，我们对于她的精华部分，必须汲取。早年毛泽东在近代思维方式变革中形成的这些思维特色，对于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 1920 年，关于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問題，新民学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蔡和森一派主张实行俄式的即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一派则倾向于采取无政府改良主义。面对这样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毛泽东终于对蔡和森一派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那时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他作出这一决断，主要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出发，而是依据于“事实”——社会实践经验的事实。他说萧子升等人的无政府改良主义，“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我们知道，早年毛泽东曾向往过无政府改良主义，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总是不能成功。整个无政府改良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主义“事实上做不到”。当然，他抛弃无政府改良主义，赞成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包含着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否定无政府主义原理，也同样地主要是依据于“事实”，看它能否被“证实”。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经过近代思维方式变革洗礼的毛泽东，从传统思维中继承的注重实践经验、实事求是，与近代科学实证相结合，对于他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接受唯物史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二

自“五四”以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进到了唯物辩证思维阶段。从“五四”到 20 年代末、30 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潮高涨，这一历史时期，唯物辩证思维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机械论相互间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较量。近代资产阶级唯心论、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批判，唯物辩证思潮风靡全国。从 20 年代末开始，反唯物辩证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主要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曾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内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的泛滥，对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批判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成为这个时期思维方式变革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一批判，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是唱主角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现代迷信。在他们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圣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是教条，并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二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处处是从书本（主观）出发，理论和实际分离，认识与实践脱节。中国教条主义者的这种思维特点，与中国不好的思维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自古是以迷信圣哲，崇尚经典著称的，唯圣唯经成了许多人的思维习惯，乃至形成一种思维传统，支配着人们的头脑，经过了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思维传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它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的潜在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便是以传统的唯圣唯经的思维习惯、思维框架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结果，马克思成了带有浓重的传统中国味的“先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当

然，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苏联德波林派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影响，采取了新形式，与传统的旧教条有所不同，可谓是土洋结合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深刻地分析了这种“新”教条主义的社会历史渊源，说它“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新八股、新教条主义除了洋气外，还有一点“土气”。从思维方式来说，它既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又承继了中国老教条的传统。因此，批判教条主义，不仅是政治思想的尖锐斗争，也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继续和深入。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着重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

首先是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写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科学与迷信是不相容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有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

在反对教条主义者现代迷信的斗争中，毛泽东突出地阐明了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思想。有鉴于教条主义者对马列“本本”尤其是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迷信，照抄照搬，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¹¹⁾。只有不迷信“本本”，独立自主地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中国的特点，找出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毛泽东看来，要了解中国情况，最重要的，是“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他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到他“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但到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三十多天考察调查，“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写出了与“领袖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调查报告”。他说：调查报告“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¹²⁾。调查研究，向群众请教，是破除迷信、不受条条框框束缚的一个关键。后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¹³⁾。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在破除教条主义者的现代迷信的同时，紧紧抓住他们的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这个关键进行分析批判。

首先是批判教条主义者从书本出发的思维方法。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则是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的思维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词句出发。他们开口闭口“拿本本来”。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极为主张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革命道路，强调当时的形势是全国性“革命高涨”，采取全面“进攻路线”，等等，几乎都是从斯大林的报告、共产国际的决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那里直接搬来的，而不是根据于中国的实际，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毛泽东批评这些教条主义者说：“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

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¹⁴⁾。就是说，教条主义者的思想路线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是导致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犯错误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

第二是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这里讲的“理论”，是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教条主义者重“本本”、轻实践的特点，毛泽东特别突出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深刻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种种革命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又是经过了革命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的是对人们的革命斗争实践给予理论的指导。理论和实际（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直接违反了这条基本原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¹⁵⁾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强调的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教条主义者却从根本上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统一，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的教条”和不变的公式，到处套用。他们的思维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毛泽东还从人们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批判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他说：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进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¹⁶⁾从认识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的关系，便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实践），不但破坏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而且割裂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历史观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迷信先哲和经典，无视人民群众及其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其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轻视乃至歧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因而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与教条主义者思维方式的对立，实质上也是两种历史观、价值观的对立。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写道：“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¹⁷⁾。这里说的“中国德波林派”，指的就是中国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明确指出，教条主义者的根本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又是机械论的，这是对他们的思维方式性质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评判。

毛泽东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从思维方式上讲，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论。毛泽东在与教条主义斗争过程中，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这是中

国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三

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一方面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不好的思维传统（如前所述），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则实行批判的继承，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有机地融合起来。

中国近现代，不论在“五四”以前或“五四”以后，思维方式的变革、新思维方式的逐渐形成，其新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几乎都是从西方汲取的，这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思维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型到近现代型的转换），因此，新思维方式的建立，决不是抛开自己的传统。于是，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系，便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西化派和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都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本国的历史传统，只知道一些外国情况，“言必称希腊”。他们离开了历史传统，在中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无视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根本谈不上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历史地形成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我们的历史传统。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¹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中国化。

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毛泽东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基础上对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实事求是”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国自古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讲求务实，注重实际，实事求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表彰刘德为学有“实事求是”精神。到宋、明时代，出现了“理在事中”、“即物穷理”的观点，而且从明至清，逐渐形成一股“实学”思潮。曾国藩认为，“实事求是”也就是即物穷理。在近代，人们则以近代科学实证去理解传统的“即物穷理”、“实事求是”。如严复就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即物而穷理”，“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¹⁹⁾。毛泽东深受这一优良思维传统的影响。他早年就比较看重“事实”和实际经验，注意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自觉地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自己的整个理论和实践中去，在全党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等形式的主观主义。不过，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思维是朴素性的，尚缺乏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还不能真正找出事物的客观规律。近代科学实证，运用了实验手段和分析、归纳，但它的方法基本上是机械性的，不能深刻揭示事物内部矛盾的规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解释。他讲的实事求是，是一种基本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它要求人们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事物的内部矛盾，然后加以综合，找出事物的规律。他的这种实事求是，不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吗？是的，在毛泽东那里，传统的实事求是已是经过了改造，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融合在一起了。

第二、对知行统一的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在中国，关于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有一个优良的思维传统，便是讲求知行统一，注重践履。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王夫之讲“行可兼知”，“知以行为功”，“知行相资以为用”。但中国古人讲的知行，往往是局限于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认知和践行。在近代，孙中山在总结民主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具有近代性质的知行学说。他说的“知”，主要是指近代科学和民主革命的知识；“行”，包括有民主革命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内容。他基本倾向于知行统一，但不彻底，夹杂有分知分行的思想，未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导学生“知则必行”，“置重于实行”。毛泽东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的这一优良思维传统。知行统一，知了就要行，重在实行，是青年毛泽东坚持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丢掉这一传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基础上，予以批判的继承。《实践论》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他的这篇关于认识论的专著，以“实践论”为标题，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关系，突出地强调“实践”的意义，这与中国的讲知行统一、注重践行的优良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当然，传统的知行观在毛泽东那里也已是经过了改造，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他的知行统一观的“行”，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知”，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他的知行统一的模式是：“实践—认识—实践”，这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地不断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他把传统的知行统一观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高度，把二者融合为一。

第三、对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当丰富，毛泽东对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又是多方面的，由于论文篇幅所限，难以一一论列。就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主要点来说，一是矛盾的辩证思维，二是变化日新观。在矛盾的辩证思维方面，中国又有自己的特点——在古代，偏重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统一，讲求阴阳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转化；近代受进化论影响，则突出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竞争是进化之母”。这些，对毛泽东都产生过较深的影响，其中有不少合理思维成分为他所批判地汲取。毛泽东写了《矛盾论》，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辩证法；他主张事物（以及人的认识）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旧过程的终结，同时也就是新过程的开始……。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受到了中国传统矛盾辩证思维 and 变化日新观的影响，是显然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以不少篇幅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转化，同时又十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这与中国古代和近代一些辩证思维的特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过去的辩证思维的不足之处予以了纠正，如他明确指出了事物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斗争性是统一的，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或片面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的缺陷。不仅如此，毛泽东建构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思想体系，是个科学的体系，克服了传统辩证思维的直观性和朴素性。

上述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中国优良的思维传统的批判继承，也就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一方面使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思维的特色。

四

如何帮助广大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掌握现代唯物辩证思维方式，摆脱旧思维方式的束缚，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仍是以传统式的小农生产为基础。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参加革命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他们的思维还是比较传统的。迷信圣贤和经典，又崇尚狭隘的经验，是他们的一种普遍心理。他们的思想常常表现出主观性和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便是他们这种思维偏向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因此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²⁰⁾。这一矛盾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思维方法的对立。

怎样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中解决这一矛盾呢？毛泽东提出的根本办法，是对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教育，提倡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对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方法，纠正党员中浓厚地存在的主观主义。后来他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着眼点也主要是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方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性、片面性的思维方法。接着，他采取整风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其中最根本的、摆在第一位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形式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个别论断当作不变的教条和公式，到处套用，不调查研究客观的实际情况。经验主义者则看重经验，忽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夸大为普遍适用的真理，他们同样不注意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的思维特征是理论与实际（实践）相脱离，都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这种主观主义的坏学风时，不是一般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倡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际（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²²⁾。在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思维方法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思维方式一次深刻的变革。张闻天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思想革命，它“是为推翻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一个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前者就是主观主义的，后者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²³⁾。他说的推翻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实践方法，发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实践方法，不正是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吗？

由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唯物辩证思想路线，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基本解决了这个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最深刻的矛盾，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便被确立为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成了党的优良作风。实践证明，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深刻的变革，对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居于领导地位。在这个新历史时期，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三件事：一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二是开展反对唯心论的斗争，如对胡适、梁漱溟等的批判。他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²⁴⁾。三是毛泽东提出：“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三件事尽管在具体贯彻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基本精神是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消除其社会影响，同时要帮助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方法论，这是毛泽东在新历史时期里，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开展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伟大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中，毛泽东作出了怎么样的贡献和居于何等历史地位了。毛泽东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第一，在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中国思维方式变革的最伟大的成果。第二，通过整风等方法，对广大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及群众进行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实践）相结合的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的教育，使之深入人心。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²⁵⁾。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路线在干部和党员群众中深深扎下根，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后，他晚年犯下的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很快就得

到了纠正，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思想路线，很快被恢复过来。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里，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当然，对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毛泽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中国传统的偏重矛盾的和谐统一思维的价值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近代的唯意志论的批判有所忽略，对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批判不够充分，等等。他晚年所犯主观片面等错误与此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伦理学原理）批注》。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民众的大联合（一）》。

《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

(15)(20)(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2页，第820页，第798页，第1108页，第813页。

(11)(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第24页。(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14)(1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第43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19)《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1248页。(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2页。

(23)张闻天：《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9页。

(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8页。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述略

刘诚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创造了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他科学地界定了中间阶级，认为中间阶级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并对之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

准确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毛泽东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中间阶级是可以争取参加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间阶级的阵营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锐审时度势，不断扩大可争取的中间阶级的范畴，极大地扩大了革命阵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不是中间阶级，而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党的幼年，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是有分歧的。陈独秀认为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民虽然和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相联系，但身受三重压迫的中国农民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历史主动性和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不能把农民作为中间阶级，他们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面临的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农问题，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小农阶级作为旧生产方式残余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历史的分散性和被动性。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同盟军的作用不那么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只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后备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拘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 80% 的国情出发，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不能作为中间阶级来看待。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正确划分和认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甚大。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认识不一。瞿秋白谈到的小资产阶级有四种，即“店主小资产阶级”、“工匠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彭述之认为小资产阶级主要由“中小商人、手工业厂主”和“富农”组成。谭平山则笼统地说“农民群众”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这些划分把“工匠”、“手工业者”、“农民”、“富农”都划为小资产阶级，混淆了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细致而正确的，他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为“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

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从而准确地划清了当时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且第一次明确了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避免了笼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点。

准确地划分小资产阶级是正确认识这个阶级革命性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在当时四亿人口中占一亿五千万，“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强调和具体论证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这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小资产阶级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曾独立地把革命推进到以雅各宾专政为标志的最高峰。在20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则成了“依赖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力量。因此，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产生于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小资产阶级必然既不同于1793年革命时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二月革命”中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作用，陈独秀等人是认识不清的，他们一概把小资产阶级视为“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有时可以做革命，有时可以做反革命”的动摇势力。毛泽东摒弃了这些错误观点，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其左派“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而在革命潮流高涨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约占40%）一定参加革命，中间派（约占50%）可以参加革命，右派也会附和革命，而不会像俄国小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只能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而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独立革命的能力。第一次给予了中国小资产阶级一个完全恰当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与否有密切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极为复杂，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稳定，政治态度左右摇摆，因而人们不易在短时期内准确地把握它的特性；另外，在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的其它文献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介于买办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华资银行工商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关系密切者，是这个阶级的右翼；“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是这个阶级的左翼，从而否定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存在，“还谈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两重性的特点，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并指出“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¹⁰⁾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迫随于大资产阶级之后叛变了革命，但毛泽东指出：“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

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¹²⁾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¹³⁾为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深入研究，在考察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表现以后，对该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特点的认识臻于完善。他深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富农也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富农，与欧洲和俄国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人数少，俄国富农占农村人口15%左右，中国富农只占农村人口5%左右，而且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不典型，很多富农的剥削带有半封建性，因此也不能照搬马列关于富农的定义，而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富农，也非易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为中产阶级的小地主实际上乃为富农。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央把富农作为革命对象和地主同受打击，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正确的认识，1933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他指出：“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并且指出“剥削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富农。”使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质的规定性，这一界定，不仅使党对富农的政策有了科学依据，更重要的是稳定和团结了中农，使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富农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所占的比重很少，在民主革命时期，富农是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地主有区别。

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并统称之为中间势力，把中间阶级概念扩充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¹⁴⁾。在1940年4月22日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的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

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党派，共七种。两个月以后，在 1940 年 7 月 7 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内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杂牌军、中小地主等⁽¹⁵⁾。1940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在总结反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¹⁶⁾。从而把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了中间势力。

准确地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科学地加以界定，因时而异地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

决定胜负的筹码

争取中间阶级是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相当强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相对比较弱小，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¹⁷⁾正是从这一总的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重视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而且特别重视中间阶级的作用。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他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作了详细分析后，认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深感正确处理中间阶级问题的重要，他指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¹⁸⁾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富农，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十分注意对富农问题调查研究，并且逐渐总结出正确解决富农问题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完整地制定了党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反之，则妨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严厉打击，给农村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丧失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的大好形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党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关门主义“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

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¹⁹⁾“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从而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重要性，使全党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

中间阶级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决定胜负的筹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对中间阶级重要性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完成了质的飞跃，他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²⁰⁾稍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阐述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的中心环子，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²¹⁾毛泽东还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因为顽固派也极力争取中间派，并且企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经过几年来和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看作是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步骤，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争取中间阶级理论进一步发展，重点是争取各民主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1948年5月1日以后进入了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建新中国的斗争。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争取中间阶级与争取革命胜利紧密相联，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西欧，而西欧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使中间阶级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对中间阶级更多地是持批判态度。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的中间阶级，尤其是富农，基本采取剥夺与消灭的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农业合作化，前后相贯，毛泽东不言从于本本，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了中间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正确处理中间阶级的问题，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核心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即中间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据此，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都

作为可争取的中间阶级，抗日战争时期，则增加了本质上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乃至国民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蒋介石嫡系黄埔生等都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核心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战国策派；开明绅士和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军；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和少数的反共磨擦专家等，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团结了中间势力，使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又联合又斗争。中间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剥削工人、农民的另一面，他们在政治上有明显的摇摆性。因此，党不仅要团结他们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要和他们的妥协性展开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关于中间阶级的总政策。

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概括地说，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吸收他们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必须保持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不允许在中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建立所谓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上，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据地，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不超出革命政府的法律范围，不但不加阻止，还要加以提倡和鼓励。在同封建经济作斗争时，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在税收政策方面，按收入的多少规定纳税的限额，不允许将税收完全放在资本家身上。在劳动政策方面，在改良工人生活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多地加薪减时，提倡工人必须遵守劳资契约和劳动纪律，必须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但必须实行节制资本，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计民生。

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对富农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和左倾路线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富农的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政策，以瓦窑堡会议为界，之前主要采取中立，限制政策，之后是保护富农经济。

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闽西一大重申：富农与豪绅地主阶级不同，可以中立。并规定对富农“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²²⁾。1930年6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规定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作为限制富农的原则，其后在《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红色区域在经济上不要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而主要限制富农半封建性的剥削，允许他们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中农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完善了限制富农的政策。

华北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把限制富农政

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即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断完善了关于对富农的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²³⁾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起草和发表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文章，使他关于富农的政策系统化。其主要点有：第一，纠正了对富农定量分析上的偏差，提出把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由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提高到25%。第二，他提出处理富农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第三，他认为必须把老解放区的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其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中间党派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因此极需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和扶持。

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注意对中间党派的研究。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制定了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主要有政治上积极引导，组织上支持帮助，方法上区别对待。

政治上积极引导。党对中间党派政治上积极引导。帮助和推动他们不断顺应历史潮流，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与闻国是权利，成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坚持和平民主；当中间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时，党则引导他们展开深入讨论，批判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1947年11月，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时，党及时指出：民盟应该“坚决地站到真正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²⁴⁾不久，民盟在中共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召开了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路线，周恩来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²⁵⁾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民盟彻底摆脱了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完全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民盟三中全会前后，各民主党派也都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与新民主主义汇流”⁽²⁶⁾。中国各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终于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走上了革命救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组织上支持帮助。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它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各中间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各中间党派的历史是“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

(27)。民盟在总结其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的几个民主党派，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而且很多党派在组织上也是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搞起来的。”(28)

党十分重视对中间党派的工作，并派遣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决定“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29)

中国共产党对各中间党派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组织协助，即派组织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这是中间党派本身具有的阶级联盟性质所允许的。舆论支持即在各党派成立时，通过我们党主办的报纸，为他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而昭示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氛围。经济援助即在各党派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物力上予以帮助。

方法上区别对待。中国各中间党派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尽一致，《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指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勱、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30)有鉴于此，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左翼进步力量“诚恳忠实地帮助”他们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31)，“亲密地同他们合作”；对中间党派的中派，争取同他们合作，同时照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中间党派的右翼，“赞助其某些进步办法，批评其错误主张，并影响和争取其进步分子”或“批评其上层，影响下层。”(32)由于我们党的政策得当，中间党派绝大部分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毅然站在人民一边，走上了历史的必由之路，而极少数右翼则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关于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力主和反蒋的蔡廷锴及陈济棠等订立停战抗日反蒋协定，华北事变以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实现了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方实力派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毛泽东、党中央制定了对其基本政策是争取、团结。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他们”(33)。

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惧怕蒋介石对其吞并或假手消灭。对此，我们党采取帮助和巩固地方实力派地位的政策。党中央指出：“国民党方面对同情我们的人，时常采取孤立与消灭其力量的政策”，“因此，我们对策应保护同情者，”(34)“帮助同情者巩固同情者地位”(35)，以击败顽固派。

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另一重要政策是不挖墙脚，多交朋友，地方实力派在和我党的交往中往往心存疑虑，害怕共产党挖他的墙脚，赤化他的部队。

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党中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³⁶⁾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提出：“由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改为扩大交朋友的工作，”⁽³⁷⁾消除他们的疑虑，“以真实的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二百万友军”⁽³⁸⁾与我合作抗日。对个别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实力派中的少数反共顽固分子，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发展，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我国的个体劳动者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农民不同，他们与个体所有制相联系，既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有时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消费者的利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带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是民族资本，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有益补充的一面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私营企业主的两面性：有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面，也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随着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将会出现新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师范学院）

注释

《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9页，第777页。

谭平山：《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民》第1期。

⁽¹³⁾⁽¹⁸⁾⁽¹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页，第4页，第145页，第70页，第154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40页。

《列宁全集》第2卷，第289页。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¹¹⁾《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42页，第41页。

⁽¹²⁾《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第5页。

⁽¹⁴⁾⁽²⁰⁾⁽³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3页，第748页，第747页。

⁽¹⁵⁾⁽¹⁶⁾⁽²¹⁾⁽²³⁾⁽²⁹⁾⁽³⁰⁾⁽³¹⁾⁽³²⁾⁽³⁴⁾⁽³⁵⁾⁽³⁶⁾⁽³⁷⁾⁽³⁸⁾《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28页，第502页，第457页，第593页，第334页，第561页，第491页，第481页，第234页，第360页，第457页，第460页，第569页。

⁽¹⁷⁾《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²²⁾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2页。

⁽²⁴⁾《晋察冀日报》1947年11月1日。

⁽²⁵⁾⁽²⁷⁾《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53 页。

(26) 陈铭枢《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49 年 23 日。

(28) 《统一战线与民主同盟》，第 20 页。

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崔振生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长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没有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深入研究农民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所说：“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 and 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一、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段话讲得很精辟。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早在童年时代，毛泽东在读旧小说时，有一件事感到很不平。他说，“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1917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毛泽东童年的农村生活和学生时代对农村的调查，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建国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当警卫战士把农民吃的糠菜窝头送给他时，他竟双手颤抖，流出同情而又内疚的眼泪；当他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时，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开始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和农民接触，他发现农民不仅是个受苦

的阶级，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可见，他对农民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巨大的思想升华，即不仅把农民做为被同情者，而且，把农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动力。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并把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选编，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中。同年，毛泽东对江浙及长江流域农村进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号召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1926年底，毛泽东回湖南，步行1400里，走访了五个县，做了32天调查，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科学论断。可见，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是无路可走时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这个根本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十年内战，毛泽东一边指挥武装斗争，一边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他先后搞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他说：“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

这标志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已经成熟和系统化。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地建设必须依靠农民；土地革命，是为了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可见，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所以他能够站在正确立场上，对错误路线加以抵制。1931年共产国际发出“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王明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于1933年制定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并指出“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

抗日战争中，为了团结中小地主阶级抗日，同时又减轻农民负担，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为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打下了基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而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则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首。可见，毛泽东对解决农民问题是何等重视！

全国解放前夕，当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时，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建国后，他又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为了使农民走上富裕道路，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确立

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对农村两极分化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过于急迫，但毕竟在极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根本性变革。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首先从农村入手，纠正“左”的错误。他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亲

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对农民关心的若干问题，如供给制、按劳分配、食堂问题进行了比较恰当的解决，从而稳定了农村，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恢复了农业生产。

不难看出，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做出许多科学论断，如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的思想，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援助引导农民“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¹¹⁾的思想。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光辉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1. 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¹²⁾恩格斯从法国农民支持波拿巴的投票中认识到，违反农民意志，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为夺取政权，德法诸国的社会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¹³⁾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这个同盟者的支持，才能孤立无产阶级的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并没有把农民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而是把农民视为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级”，是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这种中等阶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¹⁴⁾法国农民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台后，马克思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¹⁵⁾

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¹⁶⁾列宁还提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

级要注重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实行革命转化时，“要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即一方面是要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¹⁷⁾。可见，列宁是把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的。

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入关于农民问题的个别结论，而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首先，在阶级划分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占农村人口 70% 以上的贫农、半自耕农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这就在阶级划分上确立了农民的主力军地位，避免了宠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念。其次，在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敌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就决定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¹⁸⁾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¹⁹⁾

这里，毛泽东完全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欧情况对农民做出的结论，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农村找到了自己强大的依靠力量，农村根据地在敌人的包围中得以巩固和扩大，工农武装割据成为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²⁰⁾

2. 关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联合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是列宁把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强调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并把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看做巩固工农政治联盟的基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²¹⁾他认为，“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是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前提⁽²²⁾。因此，毛泽东始终注意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通过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巩固工农政治上的联盟。在民主革命中，他把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做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抗日战争中，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中，毛泽东没有照搬苏俄土地国有的土地政策，而是从中国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不仅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而且给予贫苦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人民解

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毛泽东及时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城乡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质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乡兼顾的思想，是毛泽东战争年代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教训时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好地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²⁴⁾，并提出对工农业品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平等价交换的政策，而反对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做法。1958年后，他率先纠正“一平二调”“左”的错误，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未能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他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通过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3. 关于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仅建立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系统理论，而且确立了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把农民做为革命主力军，是就农民整体而言。实质上，革命主力军主要指占农民总数70%以上的贫农。他称赞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²⁵⁾，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²⁶⁾。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团结农民中的其他阶层。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基本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对于中农，毛泽东一向采取非常审慎的政策。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²⁷⁾。同年，他首次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而把中农中的其他阶层做为土改中的依靠对象。无论在土改中，还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他都一再重申不得侵犯中农利益，“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²⁸⁾，并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²⁸⁾。为了调动中农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他强调，在老区应“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³⁰⁾。土改后，毛泽东根据农村阶级关系变动情况，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做为依靠对象，从而解决了合作化时期依靠和团结农民大多数的的问题。

对于富农，毛泽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俄国的政策和策略。在俄国，富农经济比较强大。十月革命后，富农站在反革命势力一边，疯狂反对十月革命。所以列宁称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³¹⁾，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决战”⁽³²⁾。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富农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同时为了孤立封建地主阶级，稳定中农，使贫农免于孤立，对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30年5月，他作了寻邬调查，专门了解富农与地主的问题，1930年6月，并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在查田运动中，他对共产国际“消灭富农”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富农进行“无情坚决斗争”的指示进行了抵制，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在土改中，他把富农区分为旧富农、新富农；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封建富农、半封建富农、资本主义富农。对富农的财产又区分为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和多余的土地，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50年，为了发

展生产、减少土改的阻力，防止四面出击，他又把原来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直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制定了最后逐步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地团结了中农，壮大了贫农的力量。

毛泽东为党在农村制定的阶级政策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农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孤立敌人，夺取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仍然大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造成了晚年的失误。

4. 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的思想。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不能不尊重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一向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力“痞子运动”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赞贫苦农民是“革命先锋”。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赞农民运动：“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³³⁾请看，他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何等尊重！

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尊重农民革命首创精神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做为小生产者，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信念。由于小生产的限制，农民自身有很多弱点，只有加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³⁴⁾他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³⁵⁾，因此，“应该长期地耐心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³⁶⁾为了抵制农民小生产者的消极的思想影响，他一贯强调在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军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严肃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³⁷⁾解放区的土改开始后，他严厉批评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³⁸⁾。同时，他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非无产阶级口号都及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建国前夕，当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提到日程的时候，他又严肃地把教育农民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³⁹⁾。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并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他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教育引导农民的思想还是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系统的、丰富的。除上面论及的以外，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不断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心的思想；相信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加巩固的联盟的思想；农村的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的思想；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确定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未觉悟时，要积极引导，不要逼着他们去干的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仍有重大意义。

三、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几点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广大农村欣欣向荣，开始向小康目标挺进。农民问题是否还那么重要呢？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进行的。11 亿人口，9 亿农民。到本世纪末，农民的数量也不会显著减少。西方资本主义是靠掠夺农村、剥夺农民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促进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实现的。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不能走使农民破产来实现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坚持城乡兼顾、共同繁荣，使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现代化，使工人和农民都富裕起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是一个统一整体，而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因而，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和农村自身的要求，而且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工业的支援、城市的帮助，但主要还是靠农民自身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提高。没有农民自身的努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其余三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这说明，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改革为动力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特别是 9 亿农民的支持。否则，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成功。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通过改革，农民取得了经营自主权，焕发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农民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并身体力行地投入改革。如果违背了 9 亿农民的意志，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村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可以说，农民是推动农村改革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居乐业，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保证。农业发展了，农村稳定了，就会为工业发展、城市繁荣和整个社会的

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说：“对内经济搞活，我们首先从农村入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⁴⁰⁾可见，农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既然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动改革的主力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那么很自然地应该得出结论，农民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注意巩固工农两大阶级经济方面的联合。工农联盟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以这两个阶级的经济联合为基础，离开物质利益的联盟是不可能持久的。工人阶级要巩固与农民的联盟并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到农民的物质利益。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十分注意通过解决农民的物质利益来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证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制止向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等，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近几年一些领导机关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严重滋长，超出经济实力的“大办”不断升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工农业品剪刀差有所扩大。据统计，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1，1992年已扩大为2.3:1；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84年的59.2%下降为1990年的55.2%；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至1984年年均增长15.1%，“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4%，扣除物价因素，1989—199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仅0.7%，而农民负担“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2.2%；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87年为455元，而1992年高达1042元。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并做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但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为现代化建设已做出重大贡献。从全国解放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民以“剪刀差”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金，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或社会积累资金的40%。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个大的提高，以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

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一条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离开占人口80%的农民来谈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不可思议的。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否尊重，从本质上说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农村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十

多年来，我国农民有两大创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两件事，都不是由中央由上而下强迫农民干的，而是农民自己创造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农民在实践中突破了中央的某些规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干到户，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党中央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在农民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并向全国加以推广，使农业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曾受到多方责难，被讥之为“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们党对农民的创造没有横加指责，而是给予积极扶持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民致富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一条新路。所以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⁴¹⁾谈到乡镇企业时，邓小平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⁴²⁾

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⁴³⁾。当前，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生机勃勃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靠哪个天才头脑的凭空构想，它需要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更需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仍然要十分注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以帮助他们摆脱历史的包袱，提高自身素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向平静的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们已经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勇立涛头的弄潮儿。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毕竟是一个受小生产影响较深的阶级。千百年来形成的旧的传统和陋习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可能在短时期荡然无存，科学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可能在农民头脑中自发地产生。由于对外开放，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的同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会乘机而入；加之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会借机还魂。由于自身科技文化素质差，思想理论水平低，某些农民把资本主义的痼疾当做瑰宝，把封建主义腐朽的东西当做新生事物。一些农民富起来后，搞赌博，嫖娼、封建迷信；一些农民公民意识淡薄，不愿对社会承担义务；一些农民，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只顾自己发家，既不顾国家和集体，也不顾左邻右舍；一些党组织涣散的地区，宗族势力抬头，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蔓延。这说明，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后，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一些富裕农民的人道主义“义举”，也不能和社会主义觉悟划等号。因为前者是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开明人士都可以办到的，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本质特征。所以，要引导农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产党一刻也不应放松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义新农民。

总之，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要吸收其思想精华，调动 9 亿农民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政协）

注释

《中流》1992 年第 1 期。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09 页，第 122 页，第 135 页。

《农民运动》第 8 期，1926 年 9 月 21 日。

转引自张宁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第 64 页。

(27)转引自曲折《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第 131 页，第 130 页。 1933 年 10 月《斗争》32 期，1933 年 6 月 14 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23)(28)(29)(30)(38)(39)《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27 页，第 1427 页，第 1314 页，第 1251 页，第 1277 页，第 1314 页，第 1477 页。

(24)《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6 页，第 274 页。

(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上），第 310 页，第 296 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下），第 699 页，第 693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上），第 261 页。

(16)《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90 页。

(17)《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92 页。

(18)(19)(20)《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92 页。第 692 页，第 635 页。

(21)(22)(25)(26)(33)(34)(35)(37)《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9 页，第 130 页，第 20 页，第 21 页，第 16 页，第 77 页，第 183 页，第 91 页。

(31)(32)《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83 页，第 584 页。

(36)《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49 页。

(4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66 页。

(41)(42)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 21 页，第 20 页。

(43)《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269 页。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刘奔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时事的急剧变化，往往使人们忙于应付眼前事变，而顾不得冷静地思索历史和现实间的深刻联系，看不到百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的巨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纪念，会变成纯粹的形式。

然而，对于没有丧失巨大历史感的人们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纪念毛泽东，就绝不是应景的事情。现实是历史的合乎规律的继续，未来靠透彻地理解了历史和现实的本质联系的后继者去创造。纪念毛泽东，缅怀他永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至关重要是深刻地理解他的伟大之根本所在，及其对今天和明天的深远历史意义。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早在 15 年前就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此后，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视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更加明确指出：我们今后的事业仍然要靠这条思想路线。

党的十四大在总结 14 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今天，我们回顾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无比重要性。为了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大字不致成为空洞枯燥的套语或装璜门面的点缀，需要密切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深刻领会它的丰富内涵。为此，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几点：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二、实事求是与理论工作的关系；三、思想路线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

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线

历史上每一次深刻的革命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头脑中的革命，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冲破陈旧、僵化观念的束缚和禁锢，改变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以便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为实行社会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但是，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分野。

解放思想无非是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而思想领域的矛盾不过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想解放，是从科学地分析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入手，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以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标准，正确鉴别禁锢、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坚持反映论的观点揭示旧观念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寻求克服这些旧观念的现实途径，并代之以适应变革要求的新观念。只有坚持这条

唯物主义的路线，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在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理解中，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思想领域中的“造反”、单纯观念上的奋起。由于它是以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实践为其根本特征，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就表现为单凭主观愿望、热情和胆量，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追求不要任何限制的思想上的“绝对自由”，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表面上看似很激烈、很激进，但在观念变革上却很容易流于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即仅限于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清算旧观念，而没有兴趣从实质内容上解决问题。其结果看起来是对旧观念的最极端的否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在对旧观念的虚假“摆脱”的外观下维护旧观念，在新形式下复活旧观念；要么是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否定之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思想禁锢取代另一种思想禁锢，为真正的变革设置新的思想障碍。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一个标本。马克思曾辛辣地指出：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不过是他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不过是对现存关系的粉饰，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先将思想解放运动奠立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先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以端正思想路线为根本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次整风中，他深刻地批判了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解放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提倡科学和民主，揭穿和反对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信奉的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独立自由的希望。”但是，五四运动本身也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要么是绝对肯定，要么是绝对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使一些人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以洋八股、洋教条取代旧八股、旧教条。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导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这样，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在人们中的影响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延安整风的经验乃至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端正思想路线，乃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之所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针对性，所要破除的旧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不同时期对于解放思想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也不论要破除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观念只要是僵化的，成为思想的禁锢，那么，从思想路线上说，它们一定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所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使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流于形式主义，从

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清算僵化的观念模式，都必须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根本环节来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可以说，这是对解放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结论，至今还有人不甚理解，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强调实事求是，会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从这种观点看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过程不受任何约束，以至把正确的指导路线也看作是实现思想自由的障碍。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极大误解。

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受任何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正如不可能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行动一样。你不受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约束，就会或迟或早滑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为泡影。那么，实事求是的路线会不会构成思想自由的限制呢？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其中最根本的一环，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判定。而真正这样做了，就必然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本身不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吗？15年前开展的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其直接成果是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长期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辉煌的胜利面前，什么人会感到思想不自由呢？难道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之下反倒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吗？

实际说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最可靠保证。不折不扣实行这条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大家不分职位高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迷信任何权威，都以实践来判断是非对错。这又怎么会构成思想解放的障碍呢？正如游泳术约束游泳者不致淹死在水中一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反映，是约束追求真理的人自由地达到真理的“游泳术”。真正的游泳健将在水中是自由的，真正的思想者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也是自由的。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解决前进中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全国上下，思想已经有了很大解放；但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还不能说完全改变了。那些直接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僵化，较为容易识别和克服。而那种由于形式主义的束缚而导致的貌似“解放”、实则僵化的观念和模式，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例如，过去对马列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把马列主义的僵化理解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列“过时了”、“不灵了”，转而以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发展模式，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算不算思想解放呢？有人说，这是“解放思想过了头”。其实，这不过是以一种僵化形式取代另一种僵化形式，以一种迷信取代另一种迷信，从思维方式上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马列主义本来是科学真理，而一旦成为迷信的对象，就会走向反面。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时代特点，教条主义地照搬，即使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会丧失其合理性。这两种迷信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违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则。

思想僵化也常常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是迷信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不顾时间、条件和地点将其无限制地夸大为普遍真理。这种对有限经验的迷信，有时会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出现。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冒出来的，实际上是“放”到唯意志论的泥坑中去了，后果当然就很糟糕。在去年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以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之类的“名言”。很明显，这不过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口号的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说这与经验主义有关系呢？因为，这种口号的出现，往往都有其经验上的“根据”。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在某件事上发扬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别人不敢想的事自己却办成了。这其中当然会有值得汲取和推广的经验。但因此就认为不管办什么事情，也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只要胆子大就什么都能办成，那就会失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这种方式对待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哄而起”，“大轰大嗡”，同样是要吃苦头的。解放思想，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但勇气和胆量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情况和具体条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限经验的迷信上，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搞社会化的大生产，更需要把我们的思想从狭隘经验论中解放出来。

主观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所以是僵化的，是因为它们将理论和经验凝固化、绝对化，不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面性及其对立统一的灵活性。然而，在强调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时，如果不注意使概念的灵活性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客观过程的辩证性质，而对这种灵活性加以主观随意地应用，那就会导致“僵化而空洞的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其特点是抹杀不同事物客观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等等。这也是一种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

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关于解放思想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切不可遗忘。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摆正理论工作的位置，使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及其功能的不正确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专门为澄清“理论”、“理论家”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我们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温这些原则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地理解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功能，加强理论工作，对于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十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探索，坚持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各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填补了不少空白，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些研究领域正酝酿着新的突破。理论探索对改革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严肃负责的理论探索对于改革实践的重大意义，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矛盾，

表明尚有许多没有能从理论上解决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当然，这是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而正是在这种难题上，最能显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最能暴露忽视、无视理论作用的狭隘经验主义、唯意志论的严重危害性。为求得问题的实际解决，不但不能没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不“到位”，也还是不行。所谓理论分析“到位”，就是要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这样的阶段，是以是否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为基准的。真正的“消化”历史教训，也应坚持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唯此，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例如，在经济建设中，由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这样的反复，在建国以来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多次，每次过后也都作过反省，决心不再重复错误了。但是，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在我们多次体验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失控的苦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做了不断的反省后，仍然未能避免“旧病复发”呢？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从主观方面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对历史教训的反省还未能达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从而懂得“病理”，没有搞清和根除“旧病”的“病因”、“病根”。

改革的深化，对理论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勿须讳言，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状况，值得注意。

其中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倾向，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庸俗化，将其贬低为忽视乃至无视理论作用的所谓“务实”，而“务虚”，即对规律性的探讨和“事事找理论根据”被斥之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按照这个庸俗化的观念，如果说理论还有一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也只是行动的注脚，论证任何一种一时得势的主观意志或行动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而是造成理论工作中接踵而来的、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使理论成为不可置信的东西。忽视理论作用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致“短期行为”；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又会导致理论上的短期行为，理论上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助长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到头来，势必加剧改革的难度。

对理论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理论降低到日常经验的肤浅意识的水平，甚至为一些腐朽观念推波助澜。例如，把讲求经济效益混同于“一切向钱看”，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给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涂上理论的油彩，使之更具迷惑作用，为抵制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寻找种种借口。

再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一般规律性问题，比如在生产要素组合、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社会化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透了，就能减少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加自觉性，避免大的震荡和损失。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诸多糊涂观念和思想混乱，以为用“大哄大嗡”、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方法就可以哄出一个市场经济。于是，在不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乃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加分析，不顾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一刀切”的主张和做法，结果在诸多方面给改革增添了人为的矛盾和困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都是在“思想解放”、

“换脑筋”的名义下出现的。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为改革帮倒忙，发展下去甚至有把实践拖到绝境的危险。因此，要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排忧解难的作用，同样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上述庸俗化观念和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

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反复证明，要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仅限于从认识的角度去理解、解释和宣传，把它仅仅看作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妨碍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的深刻理解，不能从应有的高度去看待这条路线的根本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和党的根本态度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认为“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或者说，思想路线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问题。即使是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同历史观问题相脱离的。

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又总是教育全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一切真理是有益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根据客观真理来确定。这就是说，从客观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其实，毛泽东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讲，不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吗？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根据唯物史观，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的重要方面。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与现存世界的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主体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追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价值追求的认识活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才有利于达到客观真理，有利于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把握客观规律。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一切因主观认识失误而导致的挫折，例如上面谈到的经验主义、唯意志论造成的恶果，往往都是囿于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急功近利，“恐资症”和“恋资”症，盲目地担心否定自己，“怀旧”癖，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都会扭曲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及其规律的认识，甚至对规律性的探索毫无兴趣。当然，有些情况下的失误并非主观愿望不良不善，主观愿望是好的，也是真诚的盼望国家昌盛，然而单是因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足以使认识走向歧途。而且，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追求，又会架通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桥梁。因此，为了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真正地统一起来，把价值取向真正建立在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真正地解放思想，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

敢做、敢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不良倾向，需要有面向实际、眼睛向下的满腔热情，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研究问题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耐心，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私心杂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比如急功近利，即使是急人民之功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在远见卓识上下功夫了。更何况，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之大利，很难说是为人民高度负责了。至于那种从个人或小集团狭隘私利出发的急功近利之价值观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格格不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哪里还会有用于仔细地研究客观实际的聪明智慧呢？于是便有把主观愿望、感情当作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现实，贪便宜、图省事、图侥幸的思想懒汉作风与之相适应。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个坚持唯物史观还唯心史观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则是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甚至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种价值体系最喜欢、最容易接受违背群众自愿原则、靠行政力量搞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工作方法。这也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套不彻底革掉，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有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以机构改革、发展第三产业的名义搞“翻牌公司”；以行政手段强制地从农民那里集资，搞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在社会化服务的旗号下搞高收费、低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一些行业脱离实际地推行农民出钱、部门获利的所谓“达标活动”，等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益。结果是不正之风披上了改革的时装。这种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不良风气如果蔓延下去，势必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前途，害国殃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从价值观念上讲，这里有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实现这一基础作用的主体。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却存在着轻农思想，“对两亿城市居民不能动用的方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而在当今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而无视9亿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从客观实际出发”岂不大半成了空话？

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价值观念不端正，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使科学理论去屈从于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其结果不是歪曲客观真理，掩饰现实矛盾，就是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作“思想解放”，在新的装束下复活陈腐观念。用这种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不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才是一件怪事。

例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就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

和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论者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发展态势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只能重复西欧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异化道路。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虽然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恐怕也不能说与人们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毫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农民的破产为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行得通？对于这种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探讨和充分地论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否则，在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能说是价值观很端正吗？

种种不利于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解放中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

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正是这些现实矛盾，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改革，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并把端正思想路线和价值观念作为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抓好。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但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像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任何意义的解放一样，绝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前进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和新的考验。然而，使我们感到无比庆幸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法宝，已在他后继者手中发扬光大。让我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毛泽东的英名及其业绩与人类共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第133页，第323页，第323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0页、第517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3页，第800页、第826—827页，第1094—1097页。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8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试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邓兆明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存今天的改革开放中，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科学价值和意义。

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不可能作详尽的论述。只能将其主要的或最核心方面的内容作概要的论述。在我们看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14日，在给周世钊的信就表示：“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后来他回忆这个情形时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只是朴素地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毛泽东很快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在从事韶山一带农民运动时，把调查研究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并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贫富悬殊，有雇农、贫农、中农、地主之分。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础，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在1927年，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步行一千四百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考察报告》以调查所得的大量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于1927年11月写出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对当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反动派的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土地分配的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基于这些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强调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深坑。”在这里，毛泽东既提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谈到了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性。把调查研究提到了解决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高度。接着，他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在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把它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的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成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反对本本主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如果说，毛泽东以前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实践的话，那么，这便是对长期调查研究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认识论的高度对调查研究所作的理论上的深刻阐述。随着理论认识的提高，调查研究的实践也不断深化。1930年前后，他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深入到寻乌、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较好地解决土地革命中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顺利地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为了总结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在百忙中，亲自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里，毛泽东着重讲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同时，指出调查研究应注意的方法。要用对立统一观点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要详细地占

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仍然没有发言权。如此等等。这是我们达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保证。但是，认识客观世界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次完成，因此，调查研究也不能一劳永逸。“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逐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他还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这些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表明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已达到成熟、完整形成的标志。毛泽东的大量社会调查，为我们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和客观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全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新问题，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获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接着又发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离开了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偏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违反了客观规律，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相脱离。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向全党重申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贯彻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制定其他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入城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去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同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这几年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情和估计办事，主观地决定问题，从而政策、方法、措施都不对头，使我们的工作吃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强调，只讲普遍真理，只有原理原则，只有总路线而没有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定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条例，就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做工作必须坚持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他曾在一封信上严厉地批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经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为此，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要求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不仅要亲自抓典型，对一两个工厂、商店、学校、农村、连队等基层单位作系统的周密的历史的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

他在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巡视大江南北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

2.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

第一，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主题是中心，也即是我们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若无主题，犹如瞎子摸象，随便到一个地方去乱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会浪费人力物力。主题应该集中，每次调查最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仍然是没有发言权。”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问，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¹¹⁾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凡调查项目可以制表格的，就应该事先制成调查表。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原则。

所谓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中的唯物主义，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不是为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要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假说，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¹²⁾我们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

二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在社会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牵连，或其他种种的局限，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因此需要验证、核对。为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做周密系统，深入细微的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也不能偏听偏信。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和利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新规律，往往会遇到强烈的反抗，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存在某种阻力。比如当调查研究揭示出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的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就

要求我们的调查者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打击，没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要想调查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

第三，调查研究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注意事物发展动向，为预测和决策工作服务。

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产生时总是比较软弱无力，居于少数。一般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扶持才能迅速成长。因此，“我们应当填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¹³⁾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不特别注意发现新的幼芽，即使新事物就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失之交臂。这样就会使新生事物遭到埋没，延缓了它成长壮大的时机，或者由于不懂得分析鉴别新生事物，说不定把腐朽当神奇，不自觉地压制新生事物。如同毛泽东所说的：“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¹⁴⁾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为了前进而去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在现实生活中，及时地发现新生事物，对于预测和决策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70年代末，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出现的时候，仅仅属于个别情况，而且不少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我们党及时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事物，迅速打开农业生产的新局面，并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拓开出了一条新路子。运动在发展中，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因此要努力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第四，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¹⁵⁾。

首先，甘当小学生要有满腔的热情，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和解放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些“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¹⁶⁾

其次，甘当小学生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没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有些人下去调查，盛气凌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一开口就是官腔，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而生畏，根本不愿理睬。只有眼睛向下，平等待人，才能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最后，甘当小学生还必须要有求知的渴望，虚怀若谷。抱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接近基层干部的意见，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地发展变化的，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因此，调查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搜集大量材料与数据，要反复思考与

分析，不花气力，不动脑筋是得不到真理的。

3.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实践的发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但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其中有：

第一，普遍调查。

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应根据所要了解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一般可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两种方式。

普遍调查是从面上了解一般情况的方法，可以采取“走马观花”、“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从整体上掌握事物面貌，如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具体指导，及时推广，指导全局。也可以采用填表等书面方法进行，对有关范围内所有的对象逐一的进行调查。例如，人口普查用填表方式便于统计，能具体准确地反映情况。普遍调查的好处就在于它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只能了解表面现象，得到比较肤浅的材料，不能对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普遍调查必须与典型调查相结合。

第二，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取得更为详细的具体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综合起来，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就是“下马看花”。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极为重视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¹⁷⁾。

典型调查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够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寻乌调查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作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仅选一个典型往往不够，应该在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内由一个典型再及一个典型。因为在一个典型材料中，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而且只研究一个典型材料，有时也可能把它所特有的现象，误认为一般，有了若干点的，详细的典型调查，还要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方法，了解的情况才能既广且深，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第三，会议调查。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人数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要深明情况有代表性，“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

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¹⁸⁾

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不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讨论式是调查会的长处，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由于各个人的经历、环境和职业的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探讨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专门召集调查会外，还可从各种会议——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议等来搜集材料。这些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对情况都掌握得具体，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机会。还有一些会议，如座谈会、汇报会，本来就是调查研究性质的会议，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第四，蹲点。

蹲点实验是深入基层调查的有效方法。有时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不能仅限于开会，访问等方法，而要使调查研究与当时当地的工作结合起来，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实践一番，可以在工作进程中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结果是否真实，也可以随时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有助于摸到有用的材料，抓住事物的本质。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乡村，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试点的过程。了解情况，决定采取某种措施，推行某种政策，在全面铺开之前，先在点上试验，发现利弊，使之不断完善改进，以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第五，试点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为了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要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当正确的意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普遍宣传，并在以后应用此方法于一切工作。亦即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就是试点。

试点方法对党的领导方法有什么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进行试点，一下子就把作为领导意见的一般号召全面推开，那“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也就是说，试点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在工作全面推开之前，通过试点的实践以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运用。”⁽¹⁹⁾以上就是毛泽东对试点方法的论述。

可以说，试点方法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试点方法的普遍提倡，无论对当时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对后来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建国后党的一切重大工作，如“三反”“五反”运动，土地改革等，都普遍推行了试点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试点方法既然是从属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因此，一旦离开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试点方法就要被歪曲。在“左”倾思潮泛滥时，许多所谓的“试点”，实际上蜕变成推行“左”倾政策的实用主义的手段。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调查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特点、新趋势意味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

1. 调查研究的社会化。这是相对于过去那种在个体农业、手工业条件下的调查研究而言的。调查研究的社会化不仅表现在调查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因素、多层次的；而且还表现在调查的组织、实施，具有全社会范围的性质。

调查研究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关系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目标，它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涉及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涉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必然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以经济建设为例来说，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不仅需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综合平衡，而且也需要社会生产各部类内部各行各业的综合平衡。还要对各种行业的产品的供销关系进一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向前发展。既要对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又要对社会生产每个部类内部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否则对经济建设很难做出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

调查研究的社会化，还表现在对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受经济建设制约的。所以其他正确的调查研究，也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具有社会化性质。如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生产发展状况为转移。因而制定人口增长规划时就不能只对人口状况做调查，还必须对国土资源、经济建设规模、生产发展状况、劳动力就业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做综合调查，这样的调查显然具有社会化的特点。

2. 调查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这是由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而且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调查要有效为四化建设服务，就必须相应地采取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以便更广泛、更快速、更准确地收集、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

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主要指先进的信息设施，它是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先进的计算工具和信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录音、录像、电传、电子遥测工具等等。没有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就没有调查研究的现代化。以手工操作方式为主的调查研究，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目前我国很重视调查研究的现代化。并已初步具有了现代化的调查手段。近年来我国引进和自制了一系列先进设备，国家和各省、市成立了电子计算中心、信息网络服务中心、为四化建设的调查研究服务，收到了良好效果。如 199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统计数据多到手工操作根本无法完成的程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人口普查工作，我们利用了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各

省人口普查机构及时将统计数据上报中央，中央汇总后，再分类编码，由电子计算机中心做出最后的数据统计，达到联合国有关人口普查的特定要求。类似这样程序繁多、数据庞大的统计工作，不凭借现代化的调查研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

3. 调查研究的精确化。所谓调查研究精确化是指调查研究的结果，既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又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又是密切相关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质的量，也不存在没有量的质。对客观事物要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除了进行深入典型调查之外，还必须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必须“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调查研究的精确化，是经济建设所要求的。四个现代化本身具有精确化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精确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这因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都是科学技术的转化形态，其中都渗透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国防。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本身就是高度精确化的成果。因此，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也就必须具有精确化的特点。我国兴建长江三峡水电站的整个论证过程，都是遵循调查研究精确化特点开展工作的。所以，这项宏伟的建设规划工程本身就是调查研究精确化的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新民学会文集汇编》，第21—22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2页。

(11)(16)(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第2页，第2页，第25—26页，第21页，第26页，第27页，第10页，第27页，第20页。

(12)参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13)《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14)(1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第206页、第308页。

(15)(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0页，第897—898页。

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社会调查的理论

童星

毛泽东是我们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他亲自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泛、作风之深入，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他既注重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又重视总结调查的技术和方法，并对调查成果进行理论概括。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中国的“实际”究竟怎样？当前的“实事”到底如何？对此仍有相当多的同志感到陌生和茫然。倘若不知道当前中国的“实际”或“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岂不成了空话？要扭转这种局面，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回到毛泽东，重新恢复他当年曾经大力倡导的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对社会调查极为重视。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后来他多次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的发言权的”。毛泽东把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视若珍宝。他多次提及最令他可惜的事是：1927年春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而损失；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为什么毛泽东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这是因为：

他深信，“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曾深情地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

他深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方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回忆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他还深信，通过面向实际作调查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完全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然而，现在我们有不少同志却非常不注重社会调查。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唯上”，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就是不愿沉到实际中去，

认真调查实情、调查民心；即使到了下层，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学者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唯书”，从书本到书本，就是对实际不屑一顾，甚至不承认调查报告也属于学术成果。这与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时时处处“唯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极不适应我们所面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所以必须回到毛泽东，认真面向实际作调查。

1. 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或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他们根本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只是照抄照搬马列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车伊始，胡乱指挥，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大地，坚持对中国社会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弄清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指引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认真进行社会调查，不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结果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纠正“文革”的错误。导致这场拨乱反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期间被撤职流放，长期生活在基层。他们非常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疾苦和真实心愿，一旦掌了权，就顺应民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一步步地达温饱、奔小康、求富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面向实际作调查，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从实际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依”、“无经典作家的论述作根据”的伟大实践，必须时时处处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办好。所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当携起手来，像毛泽东当年一样把向实际作调查放在第一位。

2. 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制定并坚持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曾经强调，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时期，他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向一切革命者清晰准确地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土地战争时期，他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正确地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确立了“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革命路线⁽¹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在广泛听取实际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政策⁽¹²⁾；并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一起总结增产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¹³⁾。所有这些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其外观都有具体、清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反之，没有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所提出的工作指导必然会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在当前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大量基于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之上的方针政策，它们不仅正确，而且可操作性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根据安徽农村的经验，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多么朴实的群众语言、多么便于操作的分配政策啊！城市的“利改税”以及后来的清理“三角债”，也扎根于充分的试点经验，界定清楚，政策具体，步骤可行，便于考核，当然执行起来切实有效。相比之下，另有一些方针政策就相当模糊，随意性大，比如在宏观控制上“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在企业体制上，“经营权和所有权可以适当分离”；在分配上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要上下封顶下不保底，又要照顾左邻右舍”等等，就属此列。不论它们多么“全面”、“辩证”，可就是不好操作。“中看不中用”。如果在这些方面迈开双脚深入实际作调查，就一定会得出比较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来。

3. 只有面向实际作调查，才能根据中央指示解决好具体问题。

如果说中央一级的任务主要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地方各级就要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找到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实际工作的办法。显然，这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批评说，对上级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¹⁴⁾在他看来，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照抄照搬上级指示，是最省力的消极怠工，邓小平也多次告诫各级领导不要作“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不动脑筋⁽¹⁵⁾。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弄清楚了许多国情，为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全国先后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和一次 1% 的人口抽查，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资源和国有资产普查⁽¹⁶⁾，在全国 2000 多个县（市）中搞百县县情调查，从而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资源紧的国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又如，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的时期，为了准确掌握转轨的进度以便找到合适的转轨途径，就必须弄清楚我国城乡人口的实际比例。有人根据人们的户口性质，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二八开；有人根据市镇和县乡两类不同行政区划所管辖的人口数，统计出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五五开。其实这两种计算方法都不科学；有不少人（及其家庭）具有农村户口，却从事非农职业，居住在市镇，过着城里人的生活；而在市镇所辖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及其家庭）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乡村，过着农村人的生活。根据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的抽样调查和推广测定，我国城乡人口比例约为三七开。这个结论比较切合实际。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略举两例。

其一。1985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全社会造成尊师重教的好风气。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指示。可是有些地方在传达贯彻这一指示时，却不调查研究，不联系实际，从省市直到县乡，各级教育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人竟然原封不动地要求下面“少说空话，多于实事”，自己拿不出具体的实干措施。邓小平寓意深刻的指示变成了内容空泛的套话。“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¹⁷⁾。正是由于缺乏调查，情况不明，因而在尊师重教方面决心不大，方法欠妥，时至今日，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其二，1992年以来各地根据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上新台阶的步伐。可是有些地方不作实地调查，不搞可行性论证，不顾客观条件，一窝蜂地圈地开办经济开发区，“筑巢引凤”，结果荒废了大批耕地，却没有引来“凤凰”；到处办艺术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结果搭台花了许多钱，戏却没能唱成；没有“超常规”的条件，却硬要“超常规”的速度，层层压指标，结果出现了浮夸。毛泽东在大跃进浮夸风失败以后，曾坦诚地对来华访问的英国朋友伯纳德·蒙哥马利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¹⁸⁾我们不能轻率地忘记这些话。

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作为社会调查的开拓者，扎实的调查作风首屈一指。我们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的同时，还要在社会调查的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

毛泽东在调查中的扎实作风首先表现在“眼睛向下”，而不“昂首望天”。1930年11月6日，毛泽东从峡江去吉安布置撤退工作，7日宿东塘，8日到吉安，即使在这种紧急关头，沿途也做了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4个乡（村）的调查⁽¹⁹⁾。他对于向下作调查的热忱和踏实由此可见一斑。他为了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情况，曾与佃农张连初一起长谈，细算了一个三口佃农家庭全年田收、喂猪、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等4项收入，以及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杂用等11项支出，其中仅农具消耗就排出了犁、铁耙、耙头、锄头、打禾桶、箩筐、络脚、鸢箕、撮箕、风车、晒谷用具、南盘、米筛、推子、碓等15种，逐年折旧，算帐精细，最后得出“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的结论⁽²⁰⁾。毛泽东调查作风的扎实，令人叹服！他批评有些人“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²¹⁾。他告诫许多干部同志“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²²⁾。

其次表现在“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身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深信“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²³⁾他在面向中下级干部特别是各界老百姓作调查时，总是虚心求教，平等讨论，亲自做记录，决不假手于人。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²⁴⁾

再次表现在态度诚恳，善于和群众交朋友。毛泽东曾这样介绍他自己的经验：“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²⁵⁾

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也搞调查研究，但作风却很浮，不扎实。有些人整天坐在机关里，挂一个又一个电话，发一张又一张报表，向下级索取情况，催要数据，一点儿也不体谅基层同志工作的甘苦，一点儿也不思索基层这样报上来的情况和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即使去了基层，也是住进高级宾馆，不接触群众；或是坐着轿车，前呼后拥，这儿停停，那儿转转，“蜻蜓点水”，不求甚解；或是到处题词、讲话、接见、剪彩，自以为是，形式主义。

这种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普遍存在，固然与当事人缺乏群众观念、有官架子等等主观因素有关，因而有必要通过思想教育、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办法来遏制它。但浮而不实的调查作风之所以在干部中普遍存在，有其深刻的客观根源。

客观根源之一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带来“家长制”、“一言堂”，有的“第一把手”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遇到大事，既不召集“一班人”讨论，也不同其他领导成员商量，独自决定重大问题，或随意改变集体原先已作的决定；对不同意见，一概加以否定，甚至打击报复。这就使得许多干部不敢或不善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是简单地服从上级、追随“第一把手”即使在上级或“第一把手”的指示、意见同实际不符合时，也不敢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既然如此，还不如不做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为好，这样至少可以减少苦恼，逃避良心上的谴责。如果不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不破除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一言堂”，不充分发扬民主，只是号召广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恐怕于事无补。

客观根源之二是传统的干部制度。长期以来，干部的任用和提升都是领导选拔、上级任命，很少基层推荐、群众选举（即使选举，也极少差额）。干部的考核和评价不看政绩，不问群众，只看领导满意不满意。这就造成不少干部不问群众疾苦，只对上级负责；不解决实际问题，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会面向领导恭恭敬敬地搞接待，又怎么会面向基层扎扎实实地搞调查呢？

客观根源之三是一系列僵化不变的套话在社会上畅通无阻。比如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成绩总是九个指头，问题总是一个指头”，“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等等。整党刚刚开始时，就已经传出结论“党员和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腐败斗争尚未打响，就已经断言“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的只是极少数”；对于先富起来的人，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又定下调子“绝大多数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讲这些话既省劲，又保险。相反，如果深入某个乡村或单位，调查出那里违法乱纪的干部已不是少数，先富户大多数并非合法经营，却会被扣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流行的这些套话当年曾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认真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现在却演变成了不作调查就可以照说不误的空话。究其原因，缘于客观实际在变化，而人们满足于对过去实际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没有对变化的实际进行新的调查，引出符合变化了的实际的新的结论。毛泽东在延安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

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²⁶⁾“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²⁷⁾

为了在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上回到毛泽东，扎实作风上赶上毛泽东，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上述导致人们“唯上唯书不唯实”的种种客观根源排除掉。对社会调查最重视、作风最扎实的毛泽东，到了晚年不再面向实际、面向群众作调查，恐怕也跟这些客观根源有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²⁸⁾

在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上超越毛泽东

搞社会调查不仅要具备满腔的热忱和扎实的作风，还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当年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现代化建设蓬勃向前的新形势下，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并没有过时，仍然在不少方面成为我们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局限在典型调查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应当有新的超越。

先考察一下典型调查。这就是所谓“蹲点”、“解剖麻雀”，即从社会上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单位，调查者深入其中去进行细致的调查，在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以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

毛泽东亲自蹲点，通过开调查会的方法来“解剖麻雀”，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不得已而为之。他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²⁹⁾言下之意，在欧美日本那里，共产党人通过资产阶级已经预备好的材料也可以了解起码的甚至较完备的社会情况，而不需要“事必躬亲”。当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引用了资产阶级提供的现成材料，仅在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第五节中，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除了引用大量著作、报刊上的材料以外，还数百处地采用英国官方蓝皮书中关于人口、农业、进出口乃至流放和徒刑方面的统计资料，援引枢密院医官关于公共卫生的系列报告以及国内税务委员、童工调查委员、济贫法视察员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摘录议员在下院的演说、大法官备忘录甚至保险公司代办所的表格⁽³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承认，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³¹⁾现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和城乡调查队已经健全，它们定期定点开展调查统计，并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工作者的调查报告并不少见；报刊上也经常发表反映社会各界现实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等等。任何人只要留心收集、注意研究这些材料，同样可以了解许多社会现实情况。但是，即便社会分工使得调查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专职工作，领导干部的典型调查也不应取消。因为领导干部只有经过亲身的典型调查，才会知道调查的甘苦和调查结果的来之不易，从而尊重别人的调

查；才会通过比较亲身调查和别人调查的不同结果，发现问题，真正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典型调查一种方法。早在 1931 年他就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以及两种调查表格，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展人口和土地普查⁽³²⁾。解放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好转，毛泽东使用文献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频数也明显增多。那种认为毛泽东只提倡也只会进行典型调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应当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以及现有材料多寡的差别，分别采用或同时并用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

毛泽东重视典型调查，但也审慎地看到了典型调查得到的结果其适用范围有限。他在作寻乌调查时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³³⁾他在作兴国调查时以永丰区为典型，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³⁴⁾也就是说，他仅仅把典型调查的结果从空间上推广到赣南至多是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处，从内容上推广到土地斗争。后来转战到了陕甘宁边区，革命的内容也由土地斗争变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就不满足于原先的调查所得，又开始了新的农村调查，强调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为出发点，“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³⁵⁾

典型调查结果在应用范围上的局限性，源于任何典型不仅包含一般的共性，也包含特殊的个性。社会结构的状况直接决定了各社会元素共性与个性的相对含量，从而影响着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的大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如同马克思所说，“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³⁶⁾通过典型调查，解剖一个马铃薯，搞清一个同名数，就可以带动一般性的认识，指导一般性的实践。然而现代工业社会是由众多异质元素相互纽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巨大系统。由于日益精细和深化的社会分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差异即个性也日益突出。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沿海和内地的开放差异显著，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企业和机关的活动原则明显有别，长线部门和短线部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显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条件地推广典型调查的结果，无限制地使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指导，必然会造成“一刀切”。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翻两番”，各行业部门的具体目标就不能照搬“翻两番”，而应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定出各自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需要翻 3—4 番，有的则只能稳定规模，有的还必须适当收缩。只有这样，全国“翻两番”的总目标才能实现。某项典型调查结果的应用范围越小，意味着需要对越多的点进行典型调查，以便分类指导。因此，在新形势下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就必须根据现代调查技术，在选点上除了一般的单独选点以外，还可以多重选点、分类选点、对比选点、分级选点；更多地应当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既可以搞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分群随机抽样），也可以搞非随机抽样（包括任意抽样、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普查的方法。

再来看一下阶级分析。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

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³⁷⁾此后，阶级分析法贯穿于他几乎所有的农村调查实践。当然，毛泽东在1956年向中央34个部门的同志作调查并写作《论十大关系》时，在1958年深入各地农村同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科技人员调查研究农业增产经验并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时，基本上没有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过总结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全部实践乃至他的一生，可以说，注重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他持之以恒的观点和一贯作风。这一观点和作风使得毛泽东在1956年以前几乎总是正确、战无不胜，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现实就是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也使得他在1957年以后屡遭挫折，因为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轨开始的，这一转轨并不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阶级分析的作用，但毕竟要求把阶级分析方法局限在观察和处理带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时加以运用。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应当更多地采用利益群体分析法，准确了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老年、中年和青少年等不同年龄层，大学、中学、小学、文盲等不同文化层，还有不同收入层、不同职业群、不同身份群人们的现状、利益和要求，以便协调好他们的相互关系，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前，我们正在向前推进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大业。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调查方面不仅回到毛泽东、赶上毛泽东，更要超越毛泽东，以满腔的热忱、扎实的作风加上科学的方法，经常向社会作调查，以便永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胜利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注释

(14)(21)(22)(23)(24)(25)(26)(27)(29)(32)(33)(34)(3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第13页，第17页，第41页，第15页，第16页，第2页，第22页，第8页，第3页，第8页，第2页，第17页，第16页，第27页，第17页，第21页，第17页，第12—13页，第42页，第182页，第26页。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51页。

(11)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19页。

(12)(13)(17)(18)转引自陆学艺、徐逢贤：《毛泽东与农村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15)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3页。

(16)这次普查还纠正了关于国土总面积的传统观念，我国国土总面积并非过去一直讲的960万平方公里，而应为1045万平方公里。

(19)(20)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4—263页，第28—34页。

(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30) 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 1 卷（下），第 711—780 页。

(3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7 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3 页。

(37)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光辉的哲学遗产——试论毛泽东的“结合”思想

胡振平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富，其中最为宝贵的就是关于“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下简称“结合”思想）。尤其今天，它是我们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创建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因此，进一步深刻地研究“结合”思想，大力宣传“结合”思想仍然是当今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笔者将自己学习“结合”思想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敬爱之意。

一、“结合”思想是时代和国情的需要

毛泽东所以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逐步形成他那一套“结合”的思想，是与当时的世情和国情密不可分的。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把握中国在这时代中的历史走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结合”思想的重要地位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几千年来，它屹立于亚洲的东方，总的来说独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到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打断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冲击着它独成系列的文化传统。中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强大的、威胁着它生存的文化，并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守旧和革新的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古今中西”文化大冲突。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或者固守已有传统、拒绝西方文化；或者抛弃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者大胆地面对这种新文化，在冲撞之中接纳它、吸收它，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如凤凰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第一条路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100 多年前西方的利炮坚船就已经打破了对这条路的幻想。第二条路虽也美妙，然而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绝不是一下子抛弃得掉的。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目的并不是让中国跟着走西方的路繁荣富强起来，他们的利益决定着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和解放已成为中国富强起来的先决条件。第三条路也决非帝国主义列强所愿意，但却是通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冲撞本身就意味着文化的影响、交流和接纳，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无法阻挡的。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又抵制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革故鼎新，以政治之变革首先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后进一步吸收和借鉴西方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文明成果，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中国，这才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路。而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又不丢弃民族的优秀传统、以完成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有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所以，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流是中国后来产生“结合”问题的第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传进来的，也是在剧烈的冲撞中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当然它也有一个同中国实际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仅立足于当时欧洲社会化大生产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生产的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也与整个西方思想

文化发展的脉络、其发展至近代所包含的矛盾及这些矛盾所预示的解决方向相关。这个理论虽然极有利于中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极有利已经诞生并在一次大战中有所发展的中国无产阶级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中国和西方不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而且社会环境也偶然不同，因此，它之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还需要中介和过渡环节。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通向中国的中介，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环节。

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按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了。马克思的时代与中国革命时代之间的时空差距已被列宁主义联结了起来。第二，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又遭失败之时。人们面对一次次失败在徘徊彷徨，不知中国出路在何方。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比邻大国革命的胜利，对处于失败和困境中的中国人民无疑有着极大的震撼力和巨大的导向作用。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才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乃至最初走上“结合”的道路，也与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的帮助有关。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等等都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解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还抱病接见了中国的一部分代表。这些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而“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才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形成了大体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步走的革命纲领，改变了“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决定，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的策略，在“结合”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革命走上“结合”的道路是时代使然，是世界大势使然，有着它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思想所以在中国产生还有着中国特殊国情的根据。中国是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俄罗斯，甚至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殖民地的国家。它有着极其特殊的国情。毛泽东对此曾多次作出深刻的分析。其中最根本的有二条。其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很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造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实际上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其二，中国是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诸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中国国情的这些特点及其与别国国情反差之大，决定着中国不仅迫切要革命、能够革命，而且有其特殊的革命性质，要走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直接借

用，唯有走“结合”道路，即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去探索去创造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路。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是这一特殊国情的客观要求。而毛泽东正是因时代的召唤、国情的需求，在自己的、也是不断总结全党的斗争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他的“结合”思想的。

二、“结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和理论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结合”的历史。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的认识却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痛苦过程。

建党之初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结合的道理。但许多党员都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这期间，毛泽东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参加国共合作、开展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尤其是用大半年时间回韶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使他对中国社会、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同时期同类的文章中以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之自觉和对中国社会了解之深刻而独占鳌头。这表明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已经比较走在前头。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困境中不仅显示出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而且表现出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善于斗争的高超艺术。他领导秋收起义本来的目标是打长沙。但在几支起义部队军事上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打大城市，会师文家市，并一步步作出了沿湘赣边界南下、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决定，勇敢地迈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步伐。

毛泽东的伟大更在于他善于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论，进而逐步形成他关于“结合”的思想。纵观毛泽东在井冈时期的实践和理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的逐级升华。1928年10月5日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首先实现了对建立红色根据地由下自觉到自觉的认识飞跃。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则对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概括。1929年12月毛泽东通过与红四军党内错误的思想斗争，又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重要文件。该文件把工作中许多问题提到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来，从加强思想工作入手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如何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接轨有着决定的意义。就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结合”思想开始萌发。按龚育之同志的说法，其中关于主观主义的纠正方法的论述，“是后来明确地规范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先导’”。这样毛泽东才能于1930年1月5日的信中，针对当时中央的主张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明确地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理论。

当这一道路不仅得不到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首肯，就是在根据地内也受到不少同志教条主义态度的阻碍时，毛泽东于 1930 年 5 月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著名的小册子。该著作不仅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些表明“结合”的思想在“结合”的实践中通过毛泽东的提炼初步产生了，虽然还没有取得后来那种完备的表达形式。

“结合”思想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智慧的结晶。“结合”思想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是在同种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斗争的需要。但是，随着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出现，特别是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迁移到中央苏区，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冲突更加尖锐了。王明一伙占据着中央领导地位，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又动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的确吓唬住了许多同志。而毛泽东的那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却被诬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受到了排斥。只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陷于将被歼灭的困难境地，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教育了毛泽东。毛泽东通过王明路线更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路线还必须有正确理论的支撑。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便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以建树起抗日战争中我党的战略策略理论体系。为着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批判教条主义，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进行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于 1937 年夏写下了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对他的路线完成了理论上的升华，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证。

“两论”对“结合”思想的最后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将毛泽东的路线与马列主义有机联结起来的关节点。它为“结合”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如果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对其井冈山时期的实践经验第一次作了哲学理论上的提升导致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话，那么“两论”则是通过一次反复，主要是王明路线带来的反复，对新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在哲学理论上作的又一次提升。由于这次提升是在第一次提升之后，更由于经历过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所以第二次提升的理论意义更为重大。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实践观点，建立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上相一致，又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这理论不仅将理论和实践之统一、一般和个别之统一这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突出了出来，而且作了系统的周密的论证，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系统化了。更重要的是，“两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两个不同角度内在统一地为“结合”的思想路线作了充分论证使之更具理论深度、理论特色和理论的说服力。至此，我们可以说“结合”思想已经成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

之后，又经过二年多酝酿，到 1939 年 10 月 4 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以完备的形式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结合”为基本线索概述了党的历史。这样“结合”思想被概括了出来，并放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上来了。“结合”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 18 年实践和理论的艰辛，凝聚着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三、“结合”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在讨论“结合”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之前，应对“结合”思想作些分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就马列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我们国家特殊性来说的，是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来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然应从这一层次上来定义。但是，“结合”思想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首先从哲学上看，“结合”讲的是理论和实际、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站在这个高度上看“结合”，那就不仅仅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这一层面上要讲结合，而且在理论和实际关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有个结合的问题。正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¹¹⁾。这样“结合”思想就应理解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所不同的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态度，对马列主义的态度，即毛泽东说的“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从哲学世界观、方法层面上讲的“结合”思想。《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个层面“结合”思想的展开。

其次，“结合”思想还包含着一系列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包含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际上都是实现“结合”所必须的，实事求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结合”的基础，是实现“结合”的根本环节和根本方法。群众路线则是使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脱离实际的重要保证，也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贯彻下去的重要途径。独立自主是鉴于“结合”思想而形成的处理国内国际、内因外因关系上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关，毛泽东总结了我党革命斗争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有利于“结合”的工作方法。譬如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及蹲点、解剖麻雀、弹钢琴、抓典型等等。

此外，“结合”思想更为大量地体现在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解放后的一些成熟了的毛泽东的著作之中。在这些著作中，“结合”已不仅是一种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成了实现了的活生生的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对“结合”思想有了这样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结合”思想的地位。

第一，“结合”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哲学思想涉及认识论、辩证法、方法论、唯物史观、伦理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内容十分丰富，但其精髓就是“结合”，即认识和实践、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统一于实践、统一于个别的思想。这因为它站在哲学基本问题高度，极其概括而精辟、唯物而又辩证地回答了普遍的思想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一开始就论述这一思想并把“理论的基

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¹²⁾概括为实践的观点，称之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¹³⁾。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阐述了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之后，也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¹⁴⁾。“两论”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结合”思想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实践论》论述认识和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结合）的运动；《矛盾论》以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层层深化具体化的剖析为主线展开了他的对立统一（结合）学说的。而“两论”本身则又是毛泽东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第二，“结合”思想也是贯彻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可以按历史时期划分，也可以按涉及的领域划分，甚至还可以从每个时期和领域中进一步分出基本思想理论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等许多层次，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层次上，毛泽东都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但是作为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结合”思想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或者说是基本特征。且不说人们熟知的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中贯彻的“结合”思想；也不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等领域中他“结合”上的贡献，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毛泽东也是强调“结合”的。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¹⁵⁾。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结合”的产物，是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吸取苏联在建设上的经验教训，集中精力对34个部门进行两个半月调查，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他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尽管今天来看也许会觉得还不够深刻，但无论那一条都无可否认地体现出了中国的特色、体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探索。这在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第三，“结合”之所以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阶段方面，是因为它是毛泽东构建自己思想理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在建树起了“结合”思想之后，他便以此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逐一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乃至具体政策的制定等一系列抗日战争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出了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着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使之成为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这样毛泽东思想才系统形成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后，中国共产党人用“结合”的思想武装了全党，“结合”作为一种根本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全面贯彻，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进一步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在新的“结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四，违背“结合”思想也是毛泽东晚年的失足之处。“结合”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特点是它的过程性，它强调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在理论创立之初，而且在实践和理论跨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坚持新的“结合”，一旦我们又背离了“结合”，或者在新的结合上做得不那么好，同样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使事业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这样。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突出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从此，党的八大曾对国内主要矛盾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伟

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却不那么谦虚谨慎了。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他没有坚持按“八大”变化了的认识去观察整风反右中的问题，相反沿袭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去看待新形势下出现的诸多矛盾，将许多人民内部的问题扩大为阶级斗争，以至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¹⁶⁾。这样通过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三落三起，愈演愈烈，到社教中更是作出了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严重估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估量下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在这种估量下形成的。它们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也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根本上背离了“结合”原则，最终给全党、全国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事实从反面也教育我们，“结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能离开的。

四、“结合”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武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努力，那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实际上背离了“结合”原则，导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留下更多的是沉痛的教训，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应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算起。

“文革”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建“结合”的原则，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两个凡是”的斗争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重建“结合”原则的斗争，是“结合”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深化。毛泽东当年建树“结合”思想主要针对王明路线，反对照抄马列主义的词句，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而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着新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我党自己在“结合”中形成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晚年错误，以及如何走出历史的误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时期开辟出新的道路。因此，（一）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重建“结合”原则的过程中更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并将它提到了新的高度。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他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¹⁷⁾。之后，他们不断强调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系统地、历史地专门论述了实事求是，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¹⁸⁾，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同年9月16日他又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¹⁹⁾，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²⁰⁾。（二）也因此，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解放思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将解放思想列在第一位，首先论述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接着又论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所以突出解放思想，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从毛泽东晚年错误阴影中走出来，就不能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时

期，“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²¹⁾，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放不了”⁽²²⁾，更谈不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了。正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树立实事求是作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在于它重建了“结合”原则，为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顾改革开放15年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回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树过程，我们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到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放作用，不能不深刻地体会到“结合”思想的伟大威力。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时，就强调“结合”。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²³⁾。这个理论形成的每一步也确实坚持着“结合”原则，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像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从这个理论包含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新的时代特征的分析，还是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无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是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法，以及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等等，无一不体现着“结合”思想，无一不是邓小平在“结合”上的创造。

邓小平的“结合”思想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结合”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有着与毛泽东“结合”思想相同的理论内涵，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邓小平自己的理论特色。

所谓时代特征，一方面指，由于5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和多少年来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了，和平发展成了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我们有了长时期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也指，中国通过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之后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建设，并真正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时代和工作主题的转换，势必要求我们换脑筋，要求我们实行新的“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新时期实现的新的“结合”，所以它被称为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的“结合”思想又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结合”中的坚定性、独创性和彻底性。这些特色在他1992年南巡讲话中表现尤为突出。（一）坚定性，即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丝毫也不放松。有人以为邓小平是不大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实不是这样。他十分注意学习马列，他的理论也都是背靠马列基本原理的。只不过他强调“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待马列主义本身的正确态度。比如，邓小平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这是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坚持

了这一根本观点，并且抓住不放。1962年的猫论就贯穿着这个根本点。1975年复出主持工作后，他仍坚持这一根本点，抓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卓有成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更是以此为出发点开辟出了新的时代，1989年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也未能使之动摇。（二）独创性。邓小平在马列主义根本点上的坚定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因此他又最大胆最灵活地从当前世情、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鲜明地体现出邓小平在理论上的独创性。要知他在1979年11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在当时情况下，这要有多么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啊！（三）彻底性，即将“结合”思想贯彻到底的务实精神。务实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反映到理论上就是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就拿“发展”来说，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²⁴⁾，“发展才是硬道理”⁽²⁵⁾。但他讲的发展决非泛泛之谈，而是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现同当今中国面临的实际结合起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的，而且这种讨论层层深入，越来越落实到实际上。首先，邓小平讲发展是依托着对当今时代和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着实在的时代特点和国情需要。其次，他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²⁶⁾，“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²⁷⁾等又使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机遇条件和更为具体的发展形式。再次，他讲发展还强调从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实际出发，决不搞攀比，决不搞一刀切，包括上台阶、翻两番都不求一律，都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²⁸⁾。这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把发展必须实事求是的思想贯彻到底了。

“结合”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并在将来仍然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思想武器。实践在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要保证理论的正确、实践的成功，只有靠我们更自觉地坚持“结合”思想，在“结合”中创造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新理论。“结合”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的光辉哲学遗产，邓小平又丰富和发展了这笔遗产。它是我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注释

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是关于“结合”思想的最新概括。它同过去的概括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比，精神一致，表达则更科学。

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8页。

⁽¹²⁾⁽¹³⁾⁽¹⁴⁾《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98页，第98页，第109页，第115页，第116页，第284页，第284页，第320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页。

⁽¹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¹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¹⁶⁾转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8页。

⁽¹⁷⁾⁽¹⁸⁾⁽¹⁹⁾⁽²⁰⁾⁽²¹⁾⁽²²⁾⁽²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第109页，第121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72页。

⁽²⁴⁾⁽²⁵⁾⁽²⁶⁾⁽²⁷⁾⁽²⁸⁾《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2 页，第 238 页，第 236 页，第 236 页，第 236 页。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特征

李恒瑞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逻辑。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同时，它又是在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实践的环境中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它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的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到的特征。完整地把握毛泽东哲学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向前推进，必须在总体上了解它的基本的理论特征。

作为在中国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具有下述三个基本的理论特征：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紧紧围绕着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必然性进行哲学的论证，对实现这一“结合”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予以科学的阐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体，也是它的首要的理论特征。

毛泽东 1938 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理论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哲学上说明实行这一“结合”的道理，制定实现这一“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上指导全党“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

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必要性，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这种论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上，说明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由人类认识的过程和科学真理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又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从人类对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的认识的基本秩序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道理。这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及其内在的统一上，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哲学理论依据。毛泽东阐述的这些基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

其次，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批判，扫除了实现这一“结合”的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阻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要的错误思想，是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研究工作就不能不“以扫清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去解决党内“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不仅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阶级基础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理论渊源，而且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主要哲学特征及其认识论的根源，这就是：从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从领导与群众相脱离，而走上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彻底地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的任务，突出了反对那种从破坏民主到脱离群众到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仍然是我们今天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再次，毛泽东还在如何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系列科学认识论的原则以及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四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这就是：第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达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客观这二者之间的具体的一致、符合；第二，创造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解放思想，“标新立异”，作出合乎中国实际合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第三，自觉能动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高度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发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正确的能动性（正确的思想和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的行动）；第四，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人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去办，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办，通过自己的艰苦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一整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可见，系统阐述和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教导人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理论表现。

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这

—“结合”作逐步深入的哲学论证，又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主线。

研究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几次系统的自觉的哲学总结。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结合”的经验进行过三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1930年前后，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主要的理论标志；第二次是1937年前后，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论标志；第三次则是1942年前后，以延安整风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主要的理论标志。通过这三次大的哲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问题，逐步清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在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的经验进行了两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1962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主要理论标志，着重从认识论和民主集中制相统一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哲学总结；第二次则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对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刻的哲学总结，逐步清算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通过对“结合”经验的这几次大的哲学总结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基本特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由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所直接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反复申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学说的发展道路，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和各国工人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对他们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应以当时的和本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各国革命者自己决定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直接实践阶段，各国革命者面临创造性地解决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任务。帝国主义打破了各国政治、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又加剧了各国政治、经济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遇到了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社会条件，出现了马克思时代所未曾有过的复杂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特别强调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把马克思的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本国具体环境，“自己来找出路”。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它所要解决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而困难的革命任务。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就寸步难行。但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公式，同样也无济于事。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相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更加迫切的和命运攸关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成功与失败的曲折经历中，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自觉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并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以完整的理论形态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一“结合”的基本思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道路，解决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没有解决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的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

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和解释的“板块结构”的思维模式，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的“一体化”上，解决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问题，创立“中国革命的认识逻辑”，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论表现形态，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理论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重要命题，认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三者“是同一个东西”，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把这三者作为“同一东西”并且“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即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观察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为主线，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作为认识论加以系统阐述。其后的《哲学笔记》，仍然以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和阐述。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在解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也不能把它的各个方面或部分割裂开来。列宁的哲学思想体系，是科学认识论的体系。斯大林后来却忽视了这一点，搞了一个“板块结构”的哲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板块结构”的思维模式不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而且不利于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手中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毛泽东贯彻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上述重要的理论原则，克服了斯大林的“板块结构”的哲学模式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缺陷，并且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溶为一体，去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论表现形态。这些，集中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和建国以后的一些重要讲话中。《实践论》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观察分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揭示了认识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过程、规律，阐述了中国革命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而《矛盾论》则从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角度，精辟地论述了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也是人类思维运动的根本规律，强调思维的矛盾法则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法则的统一。在这两部著作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直接溶为一体的，同时也溶进了科学历史观的基本精神，看不到“板块结构”的痕迹。正是这种“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其后，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又进一

步将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作为“一体化”的东西运用于党的实践活动和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并精辟地论证了党在一切实际活动中的根本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把反映论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溶为一体，并将它们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统一起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论来阐述。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精辟地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别的。这就从更高的角度，从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的高度，说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原则。就是说，毛泽东从“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传统理解的狭义认识论）这一理论高度去说明“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见解，明确地否定了“板块结构”的传统思维模式。

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体现了三者“一体化”的精神，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体系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看法，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首先，作为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范畴——实践范畴，是溶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为一体的“综合性”范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中，实践观点是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共同的基点。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实践范畴是同一个范畴，而不是两个范畴。后来，列宁又进一步把实践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要素加以强调。毛泽东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阐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传统。《实践论》对实践范畴的阐述，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加以规定，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谈起，从人类的生产活动谈起，进而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活动，而“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毛泽东还十分强调社会实践首先是群众的实践；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因此，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性范畴的社会实践，乃是传统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一体化”的“综合性”的范畴，是作为三者的共同基础的同一个范畴，而不能把它割裂为三种不同的“实践范畴”。

其次，贯穿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关系或基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狭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学说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传统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些“板块”，其共同的基础范畴是社会实践，其以一贯之的主线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它们共同的任务或宗旨，是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点，以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为主线的哲学思想体系，当然也就是科学认识论。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首先是就哲学的性质、宗旨而言的。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同恩格斯关于近现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哲学的基本的社会功能是认识论功能，即为社会实践、实证科学提供一般认识论的即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的指导；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问题。实现这种“结合”，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哲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任务，实质上就是“社会认识论”的任务。可见，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因而也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基本的理论特征。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的“一体化”，或者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征，也是毛泽东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正是毛泽东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作为“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把它们运用于同一门科学——“中国革命的逻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同样，在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这三者“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三者“一体化”的东西加以理解和运用，而且也高度重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军事科学的交叉、渗透、综合研究。列宁所称赞的“《资本论》的逻辑”，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了方法论问题，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围绕着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从上述的三者“一体化”上，将哲学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又一个基本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又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当然难以建立真正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是，仅仅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还不等于就有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是建立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而科学的方法论则是科学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科学世界观得以具体贯彻的条件和保证。不重视方法论研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也不可能贯彻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重视世界观轻视方法论的倾向，以及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重要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可以一笔带过的东西，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但他们没有来得及建立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他们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列宁十分重视“《资本论》的

逻辑”，一再强调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他在谈到唯物史观时曾明确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须的宝贵方法。列宁提出了辩证方法论和社会认识方法论的若干新原则，但他同样把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留给了后人。毛泽东在其革命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把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纠正了那种重世界观轻方法论和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在毛泽东手里得以大体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还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而迫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群众的锐利的认识工具，它十分强调发挥哲学的方法论的功能。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方法论问题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要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和掌握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主要的思想障碍是发生于党内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主要的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从不同的两极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它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关键在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干部、群众手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并且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的体系内容相当丰富，而且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它包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基础内容，或者说是它的“元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形成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遵循的根本的认识路线和科学方法。第三个层次，则是各个具体领域和各项具体工作中的方法论，如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辩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方法，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方法，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等等。这方面的内容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几乎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和实践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又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理论形态，也使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个方法论体系是完整的、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成功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就其主要内容和实践功能来说，乃是“社会认识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当然，它的“元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无疑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是在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经验进行哲学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为解决这一“结合”的历史任务而制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总和”。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是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的“一体化”上，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原则，去解决方法论问题和建立方法论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结构，既贯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又是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的生动体现。方法论的问题是这么，世界观的问题是这么，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问题也是这么。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上述三个基本理论特征，既是由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反映。同时，从直接的理论渊源上看，中国人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列宁主义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主要的是受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毛泽东虽然参阅和吸收了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研究成果（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源自斯大林“哲学模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斯大林“哲学模式”都是在列宁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两个并列的“分支”，两种并列的“再生形态”，二者在理论体系上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上具有重大的差异。斯大林忽视了或者说舍弃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见解，割裂了“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搞了一个“板块结构”的体系模式。毛泽东哲学体系则不是这么。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现代演进中出现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是在继承和发展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由列宁建构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上，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种“再生形态”的“斯大林模式”相比，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体系上更加丰富和更具创造性，而且克服了“斯大林模式”的片面性和理论缺陷，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哲学思想遗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3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9 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3 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8 页，第 4 卷，第 292、450、456、472、475 页。

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2、203 页，第 4 卷，第 626 页。

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3、59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新哲学体系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次生形态”是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现形态，这主要指的是列宁和卢卡奇的“哲学模式”；“再生形态”则是更多地直接继承“次生形态”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形态，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哲学模式”等。关于马克思

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可参阅高齐云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一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年出版），也可参见作者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的绪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一文（《岭南学刊》1990 年第 5 期）。

毛泽东关于“质的安定性”的辩证探索

尚乐林

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毛泽东于1937年7月发表《矛盾论》后，继续深入研究哲学问题，对与矛盾学说有关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从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读书笔记、哲学批注和书信看，毛泽东重点思考过与绝对的矛盾运动相关的相对的“质的安定性”问题。今天看来，弄清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辩证内涵，对深入研究和理解矛盾学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同年2月20日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又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毛泽东这些关于相对的质的安定性的阐述，虽然见之于书信，而未发表论文专著，但是观点系统精辟，已将质的安定性概念的主要规定表述的很完备：

1. 质的安定性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它贯穿于“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说，从感性的物质生活，到理性的精神世界；从具体的金木水火土，到抽象的宇宙时空哲理，无不需质的安定性，以便作为某种存在能够独立有定，发展有常，以便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能被辨别彼此，判断是非、把握实质、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这便使得事物与概念普遍地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质。大千世界，七彩纷呈。要形成各种色彩，就需要各种不同光波波长的相对安定。市场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国家的昌盛，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总之，一切为了显示存在，一切为了希图发展，一切为了有所适从，一切为了“为我”所用，都普遍需要相对安定的质。

2. 一个对象的质是对立统一体，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这就是质的独特的根据。必须偏重主要方面，才能确立一个质，否则便否定了质。毛泽东说，“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偏”，就是指偏于重点、中心、主要方面，以防止折衷主义用“一方面、另一方面”来否定掉相对安定的质。客观事物相对安定的质，都是有所偏的。原子偏重于原子核，核子又偏重于质子。计划经济偏重于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偏重予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买方市场是因为供过于求使得买者处在有利于讨价还价的主导地位，卖方市场是因为求大于供使得卖者把握了有利于自己要价的主动权，主观上的一切概念内涵，也都是应当有所侧重的，否则会使思想动摇，概念混乱。无论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概念，都有相对安定的质。任何相对安定的质都是由决定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3.确立对象之质，必须从量上设立质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度。以一定压力条件为前提，水在一定温度内为液态，不及这个温度为固态，超过这个温度为气态。人的品格也有度，俭与吝、豪与奢、谦与懦，恭与谄，尽管差异几微，但都有公论的量度。对概念给出定义域，确定上限与下限的量的标度，概念才有质的安定性。此概念定义域之外的对象则是异质，即另外的概念。供过于求的市场，叫做买方市场；求过于供则为卖方市场。这种市场性质以供求数量的比例变化而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即以形上形下为规定界限。概念如此，概念所反映的一切对象事物亦如此。

4.确立界限，“过犹不及”。“过”是过量、过份、过“左”，超过了定义域的上限；“不及”是份量不足，过右，达不到定义域的下限。“过”与“不及”都在质的量度规定性之外，是为异质。因此，要确立一个质，必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两条战线斗争在此是一个哲学概念，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一条战线防止超过上限，是为防“过”、防“左”，另一条战线防止不能满足下限，是为防止“不及”、防“右”。办事、说话、想问题、写文章，实际上都要运用“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凡事当留余地，论理要讲真理。清夜扪心惭过激，高丘驻足仰先驱。文章得失由心定，上不轻天下重人。这些都是重视“过犹不及”方法的警言。搞好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最忌“墙头草，随风倒”的思想作风。不能反“左”不怕右，反右不怕“左”，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代系统观认为，为了达到系统稳定的目的，必须不断利用给定信息和目标差信息，进行反馈调节控制。它的正反馈是忽左忽右，偏离稳定目的的，负反馈则是纠左纠右，使运行趋达目标的。控制论的反馈调控原理，用哲学概念来概括，也是两条战线斗争。控制论一词的希腊语源原意就是掌舵术。

5.因此，质的安定性是从两战线斗争中产生、确立的。两条战线斗争是确立质的安定性的方法途径，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则是确立一定的质，使之与异质相区别。在否定旧质，确立新质时候，旧质则是需要区别开来的异质，在创新新质、发展新质的时候，调整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域上下界限，并为此而作的两条战线斗争，则是区别旧质和一切异质的手段。所以两条战线斗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确立相对的质的安全性。

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上文所引的两封信中关于质的安定性的阐述，已经讲明了以下几点：

1.质的安定性需要的普遍性；2.质的安定性根据的特殊性；3.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规定性；4.规定相对安定的质的方法途径，即“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5.规定相对安定的质乃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的看法，已经不是一般讲讲而已，而是系统精辟地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质的安定性问题与矛盾问题的关系

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与统一性、同一性、常住性概念是一个东西的不同提法。从对象的内在矛盾角度讲是统一性或同一性，从对象运动形态角度讲是常住性，从对象质的规定讲是相对的质的安定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有“过程的常住性”和“矛盾的同一性”的论述，由于《矛盾论》一文，重点任务在于对立事物内在动因的原理，在于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

与动力，在于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因而文章定名为《矛盾论》，这正如《实践论》的题名，“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是一样的道理。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与动力，同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归宿与目的，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论题。它们也是“必须要有所偏”，才是有的放矢的。因此，以上两封信中强调把握相对的质的安定性以作为“斗争的目的”，对《矛盾论》具有一定的补充发展的意义。

理论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对人们是会产生行动指导和心理导向作用的。人们在具体的行动或思维中，为了一定的目的，总得建立一种调控机制，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以期设立界限，确立相对安定的质，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形而上学观点指导下，不承认或忽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没有必要的、足够的斗争动力和过程，产生右的倾向，就是“不及”。反之，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当作不讲具体条件的绝对化，无限制地斗争下去，无所谓目的界限，冲击了质的安定性，出现“左”的倾向，就是“过”。“过犹不及”，“左”倾与右倾对目的同样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防“左”防右，从理认完备性的要求上讲，就必须既有动力系统，又有目的系统。《矛盾论》显然是侧重于对动力系统的哲学概括的。而质的安定性则是一个目的系统的哲学概念。毛泽东在发表《矛盾论》之后，又发表质的安定性的理论，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看，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需要。中国当时内忧外患重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也从来没有统一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也还是刚刚重新建立，远未统一全国。国家的民主统一是人民幸福的保证，理论上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思想作指导。当时这种理论也便应运而生。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涉及到统一问题，虽是哲学概念，也与国家统一问题密切相关。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1939年5月以后，毛泽东在研读《哲学选辑》时，针对原文中关于“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统一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列宁说：‘相对的东西中间，也包含着绝对的东西’”这段话，写了较长的批注，其中写道：“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这段批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深刻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毛泽东指明了质的安定性的二重性和它与统一的一致性，更进一步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细节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绝对相对关系的理论，从总体上突出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尚未具体展开论及统一在暂时也是绝对的。当时他征引列宁所说的“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这句话，只是用以论证“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的论点。这在论述对象层次上，是以矛盾的二重性为对象来谈“相对中有绝对”的。艾思奇实际上正是根据《矛盾论》中这个意思，引申到以统一问题的二重性为对象的具体一些的层次，论证统一也具有绝对性之可能，毛泽东纠补艾思奇论述之不足，在艾思奇论证统一问题的同一层次上，明确肯定事物的安定即统一在暂时就是绝对的，而不是什么“可能”的问题。这在理论意义上，明确纠正了将斗争性推向绝对化而否定质的安定性的偏颇。这实际上是防“过”反“左”之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在将统一导向民主进步的国家目的上，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意。

从现实背景的实践方面看，毛泽东指出“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决不是无的放矢，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理论阐述都有现实针对性。写《矛盾论》时，刚到延安不久，是从“保安”到“延安”的。“保安、延安”，表达了追求安定的意思。两三年以后，形势日趋好转，革命力量在延安站稳了脚跟，毛泽东不能不通盘考虑国家问题和革命阵线的暂时绝对安定问题了。这可以用以后的形势发展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脉络为证。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发现了“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强调以团结为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可见，质的安定性的提出具有现实的、实践的针对性，可惜在实践中未能始终贯彻。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经提出，《矛盾论》是适应历史需要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写出新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些新的理论问题，至少包含了《矛盾论》发表以后受到重视的“质的安定性”问题。

质的安定性与矛盾斗争性的关系

统一问题，事物相对安定的质的问题，同矛盾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难点问题，需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一般哲学难点问题都存在着微妙的分界线，分析上如果差之毫厘，结论将会导致谬以千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就曾经给艾思奇指出过失误，为哲学学术研究的缜密性严肃性留下了典型示范。

关于统一或质的安定性的绝对与相对关系，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本身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即“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拿列宁的话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这是将统一性在空间普遍联系和时间永久联系上与斗争性比较，指出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这层意思带有第一的、原则的意义，是一般原理，不能违背，违背即表现为“不及”，表现为右。而在1939年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毛泽东又指出统一“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就在坚持矛盾对立统一的相对与绝对关系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将统一即质的安定性问题在空间的具体联系上和时间的暂时联系上，相对斗争性而言，作出具体分析，指出统一性在暂时存在的绝对性。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同样又征引了列宁“在相对中有绝对”这句话，因论述对象层次不同，形式上结论相反，而内容上的原则性内在联系却是一致的。与此相关，在矛盾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同时也作了具体分析。就在上一批注的同一页，毛泽东写道：“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将统一性和斗争性在时空形式上具体分析后，毛泽东综合起来写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在统一性的绝对相对关系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时空度量关节，存在有时空上普遍性、永久性的相对性这个第一层次和具体性、暂时性的绝对性这个第二层次的差别。如不分析这些差别，如不承认并把握这些差别，就要犯“过”与“不及”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在哲学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一例典范。正是在这个难点上，艾思奇有“过”与“不及”两种理论失误，毛泽东以探赜索隐之笔，为他作了订正。

上文分析了毛泽东指出艾思奇关于“统一之绝对可能”提法之失误于“过”之所在。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例毛泽东指出其在质的安定性问题上失误于“不及”之处。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中写道：“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质的不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维持的。”毛泽东读到此处，将最后一句下面划了横杠，立即写道：“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原文只说了斗争的片面意义，而且是保守的意义。”“质的终久必变”是斗争的积极成果方面，维持质的安定性是斗争的保守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维持质的安定性的斗争”这一提法的片面的、保守的意义，表现了毛泽东哲学理论坚定性和彻底性品格、指明了艾思奇论述斗争性的“不及”之处，意义非常深刻。与此问题相关，在另一处，毛泽东针对“中庸主义”批评十分严厉。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庸思想从量上找出并确定质的安定性从而反对“过”与“不及”，即反对“左”右倾向本来是对的，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但“中庸主义”却必然导致思想顽固，将质的安定性绝对化。就在艾思奇所写“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这一段话之后，毛泽东写道：“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中庸问题也是一个有难点的哲学问题，其难点就在质的安定性的相对绝对关系上。肯定质的安定性在暂时是绝对的，但不能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前者是中庸思想从量上反对“过”与“不及”的“一大功绩”，后者则是中庸主义本身的一种“不及”的错误。因此，在艾思奇所写“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和“错误”的一段旁边，毛泽东批注道：“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方法，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¹¹⁾可见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是，质的安定性在暂时具有绝对性，但没有绝对主义的质的绝对安定性。辩证法是关于发展原理的学说，质的安定性终久是相对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所研究的质的安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毛泽东对质的安定性概念的阐述，虽然没有写成论文专著，但他的观点，已经是很系统、很精辟、很谨严的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坚定性，有的放矢的理论针对性，哲学思辩的理论缜密性，富有内在联系的理论自恰性和完备性，哲学党性的严肃性和战斗性，都是十分突出、富有鲜明个性的，毛泽东不愧为革命导师，他的哲学思想遗产，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继承。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2页，第146、14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2页，第333页。

⁽¹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4页，第374页，第371页，第147页，第380页，第368页。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思想的精华理论的高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之比较研究

杨超

前面的话

1938年5月，我从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12班结业后，就到了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在马列学院一度掀起了学习高潮。在学习过程中，我有许多体会，主要从哲学观点上，写了一批墙报。觉得意犹未尽，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毛泽东收到信后，约我去谈话，讲了他的一些有关思想。他送我一本油印本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告诉我：《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姐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

1939年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和培元和我。每星期用一个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在他住的窑洞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主要讨论的《矛盾论》，每人发了一册《矛盾论》油印本。我所参加的三个月左右的研究中，大家都无拘无束，各抒己见。给我的启迪颇多，影响甚大，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毛泽东与我的那一次谈话以后，我就萌发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作比较研究的念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但因战争年代的条件所限，一直未能提笔。此后几十年间，又因工作比较紧张，此念虽时萦脑际，终未成文。直到今天，方写出这样一些认识，遂了50多年的心愿。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一、特殊性——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思想之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是他制定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国内革命战争也是持久战，是他制定国内革命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持久战的思想，是毛泽东贯穿于《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的、指导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说：“战争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又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持久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日本、中国双方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比较。日本的特点是一优三劣：一优——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很强。是世界著名的五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三劣——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军事封建性，决定了它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其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的特点是一劣三优：一劣——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不如日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三优——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更有了代表着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

际上是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的这四个方面的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立论根据。

所谓特点，即现实即条件即矛盾的特殊性。中日这一对矛盾就是这样四个特殊性。若概括他说来，它又表现的是两大特殊性：（一）现实的双方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的悬殊差别（它远比国内革命战争敌我双方力量大得很多很多）；（二）未来双方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必然转化。由现实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差别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由未来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转化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结局中胜日败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决定了矛盾的长期性和矛盾发展结局的必然性。抓住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性，认识它不同于其它战争的特殊的本质即能够发现和掌握它的特殊规律。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得非常精辟与深刻，亦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也是持久战呢？

在《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的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

这四个特点，归纳起来，说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特殊性。

其一，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有一支数量空前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共产党的军队——红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数量很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非常困难，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即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也即矛盾过程的长期性。

其二，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能够存在和能够发展。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在世界上只有中国革命才有的奇事，是中国革命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一革命的特殊性，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毛泽东所说的“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决定了敌人的最后失败和我之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特别是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过程，也伴随着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革命高潮到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右倾、“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长期的与“亡国论”“速胜论”作斗争一样。）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方法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决定了中国革命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最

后胜利的必然性。

总而言之，持久战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作了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具体分析之后，对其特殊性的科学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中国革命长期性这一基本特性。“持久战”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也是两者的共性。但后者的内涵更丰富，矛盾更复杂。除中日两国这一对主要矛盾之外，中国这一主要矛盾方面又有若干对矛盾，如共产党和国民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抗战派与投降派、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和其他阶级等等。而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对矛盾，又影响着决定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此，又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即《论持久战》所论述的“持久战”思想，内涵更丰富，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得更充分、更为复杂。而在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扩大了对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侵略战争，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人民的矛盾。故在得道多助的一节中又分析、指出了我们抗日战争在国际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

二、阶段性——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之比较研究

国内革命战争或者抗日战争，皆是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在其根本矛盾得以根本解决之时，这一过程方得以完结。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为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还有许多的大小矛盾。这许多的矛盾因条件的变化或激化、或缓和、或解决、或发生，这就使这一长期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表现出一定的特点来。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多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大致经历这样三个大的阶段：1930年以前，“围剿”与反“围剿”是局部地小规模地进行的，矛盾处于局部变动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1930年至1935年，“围剿”与反“围剿”是全面地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地更为激烈地进行，矛盾处于全局的显著的变动状态。这是第二个阶段。1935年以后，红军经过一万多公里的大战略转移（长征），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比较稳固地扎根于陕甘宁边区，敌人也暂时停止了全面的大规模的进攻，矛盾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当然这也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这是第三个阶段。不论是哪个大的阶段里，革命战争的形式都是反“围剿”。每一次反“围剿”就形成一个战争阶段。而每一次反“围剿”——每一个阶段，其本身都是由“围剿”与反“围剿”的两个小的阶段——即敌进攻我防御的第一阶段和我进攻敌防御的第二个阶段构成的。整个国内革命战争进程就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以及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

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期地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是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所谓两阶段，指“围剿”（敌攻我防）和反“围剿”（我攻敌防）这两个阶段。所谓胜利，是指反“围剿”的胜利即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整个国内革命战争的进程，就是这两阶段胜利的长期地反复的进程，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形态。

在深刻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抗战10个月的实践，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并把握了抗日战争新形势的突出的、基本的特点——敌我力

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别已很悬殊了，毛泽东曾形象地比之为龙王与乞丐比宝。抗日战争是世界少数几个极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日本。与极其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之间的矛盾，其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又远甚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力量对比。从这个基本的特点出发，毛泽东客观地分析、清醒地判断，科学地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从而把国内革命战争“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发展到抗日战争的长期的、复杂的、残酷的三阶段胜利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整个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为什么是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战争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也叫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占领我大片国土和一些重要城市、交通干线和枢纽。我则作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我们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辅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第二阶段又叫战略的相持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得不决定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终点之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仍将有广大的战争，而我之主要战争形式则主要是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在这第二阶段开始后，我军尚有大量正规部队，除正面防御部队之外，将大量地转入敌后，配合民众武装，依托一切敌人未占领的广大区域，开展广泛而猛烈的游击战争。第二阶段将是长期的残酷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在国内还将有反复出现的分裂投降活动和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但国际形势将向有利我不利敌的方向发展。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总的说来，第二阶段将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转变的枢纽。第三阶段即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主要地依靠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加上国际力量和日本国内部变化的援助，逐步收复失地，消灭和驱逐敌人。战争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在现象上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并且将由战略内线变为战略外线。此阶段中，我之主要战争形式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仍辅之以游击战。

由以上之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还是抗日战争的“三阶段”胜利论，都是由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差别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二）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所呈现的是国内革命战争波浪式发展过程，揭示的是敌我之间的长期而曲折的力量消长规律。（三）三阶段胜利论揭示的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的中日战争进程和规律。（四）“长期反复的两阶段”的国内革命战争之战争形态比较简单，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三阶段”的抗日战争则是一场“特殊形态”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其中包含了“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复杂的形态。如毛泽东所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三、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之比较研究

一切战争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本质的共性。一切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皆是为此本质或根本目的服务的。这是一切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共性。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差别极其悬殊，这是其特殊性。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则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差别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进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本质和特殊性。

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对他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之本质，作过这样朴素的阐述：“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辩证法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本质和根本法则。“以一当十”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是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条件所决定的。“以十当一”是战术的说法，是对局部的战役战斗而言的，是在局部造成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条件，以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由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所规定，从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出发，为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服务，遂有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等等军事原则、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这些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诱敌深入”的方针是和集中兵力相联系的。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进攻之敌的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情况下，我们要求强弱众寡的对比发生变化，便要采取此方针，使敌人深入我根据地，脱离其依傍，“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而红军实行所谓“求心退却”，使红军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待机对敌实行“以十当一”而歼灭之。如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所说：“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

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使它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概括地说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运动战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军事原则，都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即红军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的正确军事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正确军事原则，也是在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所确立并为全党所接受的。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是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以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以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会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到抗日战争即《论持久战》时，不仅得到广大而充分、绝妙而完美的运用，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军事思想，形成为“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科学表述，这一军事思想，又具体包含了“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战役战斗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又具体包容了“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反攻战。”

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特殊形态”的“犬牙交错的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它所呈现出的种种战争形态，所需要的战略战术，是以往国内革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所未有过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诸如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决战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发展到一个空前博大、高度完善的阶段。

四、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虽然是研究军事，讲战争问题，但其通篇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处处闪耀着哲学的光辉，可以说，哲学思想是内核是灵魂，军事思想是外壳是血肉。尤其是《战略问题》的第一章专门论述演绎了一些哲学范畴，专门论述了军事辩证法的基本问题，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已初步展示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基本轮廓。

《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认识与实践

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即认识，使用即实践，实践也是认识，而且是更重要的认识，认识的过程，不但存在于计划建立之前即调查、研究、决策的阶段，而且存在于计划建立之后即实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得出的认识，要在第二个阶段里检验，根据实践的情况修正，得出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因此，毛泽东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这里讲的是实践第一性的观点。

（二）主观与客观

毛泽东说：“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又说：“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他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比较地会办事，比较地多打胜仗，就是在长时期内认识了矛盾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如何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呢？那就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周到的调查，熟识矛盾双方的各方面情况，通过缜密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找出其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么，什么是规律呢？毛泽东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积极反映论。

（三）一般与特殊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这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一般，即矛盾的共性；特殊，即矛盾的个性。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一切同类事物，都有其同类的矛盾即一般的矛盾。但同类的事物，又因其环境，条件性质等等的不同，又在这一般的矛盾之上，各各显出其矛盾的特殊性来。因此，毛泽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形，特殊的性质出发，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掌握其规律的特殊性，“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关于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此后在《矛盾论》中所论述的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思想。

（四）全局和局部

毛泽东说：“凡属于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又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而我们尤其“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也“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要注意什么环节。要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矛盾）。

全局，指事物一整体及其发展全过程。局部，指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没有全局也没有局部。但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局部的有机统一，它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对于局部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局部尽管必须服从于全局，但它对全局也有一定影响。而当某个局部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时，它对全局的发展就会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论述，实质上讲的就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与一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关系。要求我们：第一，分清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把握两者间的关系。第二，注意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即抓住“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

（五）方法论

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正确决心——正确判断——周到侦察——联贯思索——研究关系——正确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正确部署，这是认识及实践的过程和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科学思维的过程和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在此后的《实践论》中有了更深刻更完整的论述：“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根据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

《战略问题》之后半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专著，其哲学思想理论成熟。此后半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不但将哲学思想融会贯通，高度运用于军事政治之中，更将其哲学思想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例如：

1. 关于过程论

过程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它和矛盾论、实践论共同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过程论的思想，贯穿于《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及其它著作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认识是一个过程。他在《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认识论就是“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并且，“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以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他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

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过程。《矛盾论》中更贯穿着过程论思想。矛盾即过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

过程论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和高度发挥。“三阶段”胜利论，是运用过程论对抗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从战略退却的第一阶段，转入战略防御或相持的第二阶段，是一个过程，第二阶段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三阶段，是一个过程。非经过此一过程，不能进入下一个过程。敌强我弱的悬殊差别，决定了抗战是一个长过程。非经过这一长过程，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将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过程论的思想，运用发挥得多么精彩完美。

2. 关于量与质

关于量与质，量变与质变，质量向上向下的两种变化的规律，毛泽东论述得非常深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日战争，同于敌我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对比之悬殊差别，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同样，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也就是说，敌我双方在战争——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量与质将分别发生向上向下的两种变化。具体说来是：在第一阶段里，因为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缩减，我之劣势更为严重。但是，另一方面，我取得了战争的经验，军队有了进步，政治有了进步，人民得到动员，文化也向新的发展方向，游击战争出现了，国际的援助也增长了。因此，我之量与质的向上向下两种变化，在“第一阶段里，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敌之变化亦是向上向下两种，只是其本质恰恰相反。在第二阶段，敌我双方继续沿此态势向上向下变化发展。我逐渐上升，敌逐渐下降，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我将脱出劣势，敌将脱出优势，先达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到第三阶段，经前两阶段向上向下两种变化，敌我双方在量与质方面都已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我之优势已经形成，敌之劣势也已造就，解决矛盾——战争的条件已具备。这一对矛盾运动的过程也就完结。

旧的量与质，通过向上向下的变化，分别变成新的量与质；矛盾的一方从优势到平衡到劣势，矛盾的另一方则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这就是矛盾双方量变质变的普遍规律。

3. 关于部分质变

关于“部分质变”，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明确使用这个理论概念，但其“部

分质变”的思想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部分质变论，应该说是属于量变质变规律的范畴。它所反映所揭示的是质量变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态势和规律。

《论持久战》中说：我“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又说：“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以我之努力，以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造成局部的胜利即局部的量变和质变；再以若干个局部胜利即若干个部分量变和质变，最后达到全部的胜利即全部的量变和质变。军事上是如此，其它亦然。当全局的矛盾不平衡，不利于我之发展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创造条件，首先在局部造成矛盾之平衡进而我之优势，实现此一部分的量变质变；由此多个的部分量变质变，使矛盾向着我之规定方向变化，最后达到全局的质变。此即部分量变——部分质变——若干个部分质变——整体量变——整体质变的过程和规律。

在战争的敌强我弱的悬殊差别情况，即在整体矛盾极不平衡的情况下，部分质变的手段，是我们逐步改变敌强我弱即整体矛盾极不平衡状况的唯一正确抉择。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原则，诸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乘敌之隙等等，都是以“部分质变”为目的的。

实现部分质变的前提，则是我之主观努力。“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这是因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由此，则又引出毛泽东哲学的又一范畴——“自觉的能动性。”

4. 关于“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积极反映论，是正确反映客观并进而改变客观的能动性。就战争而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们为着战争的胜利，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改变敌我形势，争取战役战斗胜利直至战争胜利的主观努力，也可以说，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论持久战》中说：“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就把“自觉的能动性”概括阐述得十分准确而深刻了。

毛泽东很注意、很强调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也即重视和强调人的因素。《论持久战》中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战争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方面的客观条件，只是提供了胜负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则必须经过主观的努力，即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就是决定的因素。战争是这样，其它方面也是如此。“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对“自觉的能动性”的本质作如下概括：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本质特点，实践中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自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质属性。自觉的能动性的本质，是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正确改造客观世界，把可能变成现实的主观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人们不能超越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主观愿望的实现，但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主观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它是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根本区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理论的发展。

五、从《战略问题》到《论持久战》——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

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核心、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样也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核心、为标志的，这是其共性。但其特殊性，在于其哲学思想是伴随其军事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时刻面临生死存亡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根本任务和主要任务，是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从根本上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全党全军所接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同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和相对安定的环境。至此，毛泽东方能有条件坐下来，对15年来特别是自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经验作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总结研究的结果，1936年12月写出《战略问题》，1937年7月和8月，分别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1938年5月写出《论持久战》。《战略问题》是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从军事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哲学思想的理论总结，是论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专著。而《论持久战》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抗战10个月来的实践，对抗日战争趋势、规律和结局的科学预见。

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伴随其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观点，在《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即有充分的体现。扼要说来，这两著作都论述的这样两个根本问题：（1）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能争取最后胜利，说的是“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认识论。（2）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说的是“怎样做”“不怎样做”，这是方法论。在这两著作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得到了十分娴熟十分完善的运用和发挥。可以说，《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哲学与军事熔铸一体、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博大精深的科学论著，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没有也不会从政治的角度、以政治的方式给以界定，学术界亦未取得一致的定论。但是，毛泽东自己以及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毛泽东1938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骨干，而且造就了

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邓小平和陈云都多次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重点是《实践论》、《矛盾论》、《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些著作，除《论联合政府》外，都发表于1935年至1938年这期间。有同志认为，1936年至抗战初期，是毛泽东的理论高峰时期。这一看法是非常深刻的。

通过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以及对《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比较研究，我认为：（一）1935年至1938年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高峰，是毛泽东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二）《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其中所蕴含、所论述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过程论这“三论”，即构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三）从1935年到1938年，也即从《战略问题》开始，经《实践论》、《矛盾论》到《论持久战》，以哲学思想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此后种种，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

（刘文耀协助）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开创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略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余品华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无论对中国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的探索 and 解决，都具有关键的作用。党的十四大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宣传。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回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进而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原因和契机、过程 and 特点及对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重大作用，无疑有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着重掌握历史唯物论，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着重掌握唯物辩证法，有其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首先接受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建党到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宣传重点。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理论的传播首先和满足社会的需要有关。20 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进行社会变革的强大思想工具。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最具革命的现实性，最能直接回答社会革命的诸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部分必然最先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然而，偏重唯物史观，正如艾思奇 30 年代所指出的那样，说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真正全面为中国人民所了解，因为“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说，比其它任何的介绍都更其重要。”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讲，1927 年前唯物辩证法既然在中国尚未占到上风，那么当时占上风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哲学方法论。毛泽东 1936 年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成分。1942 年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又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陷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这里他所说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形而上学。

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唯物论转向唯物辩证法，同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从实用主义方法论转向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分不开。两者是同步的过程。

五四运动“是以新的科学方法之建立力基础”。但是这一与中国传统哲学方法不同的“新的科学方法”，当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它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不仅五四运动在哲学方法论的引进上是一个失败，而且直到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也还没有真正从理论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缺陷使它必然要被唯物辩证法所取代。这种哲学方法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改良的哲学，无法满足 20 世纪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对于变革的急迫要求，满足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要求。它的“浅薄的、美国式的”“拿证据来”的方法只能教人点点滴滴的改良，而不能教人根本变动现有社会制度和寻求中国出路的真正科学方法，自然要被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的先进份子所抛弃。

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破产，是中国共产党人转向真正的科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因和契机之一；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这种新的历史观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这是他陷于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因。可见，中国人民要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掌握唯物辩证法。

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展开，即中国革命新实践的开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迫切地寻求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极其艰难复杂的 10 年。这是中国革命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大起大落，正反面经验极为丰富的时期；是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激烈斗争的时期；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时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国内主要矛盾开始发生转化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时开始从通俗化的介绍性宣传，进到使之具体化、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特点去具体应用的阶段。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呼唤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是 1927 年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流传的最根本原因。1936 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时指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哲学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中国唯物辩证法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民族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到 30 年代中期，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就很好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在 1927 年后为中国人掌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

导，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也已具备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以整体观、思辨性和朴素辩证法而著称，在一定程度上使唯物辩证法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毛泽东长期受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有很深的哲学功底。他在此时期能突出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他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优良传统不无关系。

其次，1924年前后翻译介绍辩证法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唯物辩证法逐步风靡全国。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黑格尔辩证法几乎同时。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康德哲学（认识论和伦理学），1919年前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介绍很少，出现过“只知有康德，不知有黑格尔”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是先了解新康德主义，然后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从康德哲学进而知晓黑格尔哲学，合乎情理。恩格斯说，“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1921年，瞿菊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黑格尔》一文。30年代初期，朱谦之、周谷城、贺麟等人陆续介绍过黑格尔哲学。在介绍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也得到介绍和传播（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张君勱等人也是以反对黑格尔哲学为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1924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为较早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译文。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先系统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当属瞿秋白。他从批判实用主义的需要来宣传唯物辩证法，1924年写有《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他说：“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1923—1926年他写了《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的宇宙观概论》两本书，对唯物辩证法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限于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而是解释一切现实的方法总论”，“是唯物论辩证法的综合”。他明确阐述了矛盾的涵义及其普遍性问题，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凡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这就是“辩证法”。瞿秋白的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的重要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有重大影响。

到30年代，唯物辩证法确已“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青年都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

再次，毛泽东这时能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实践，成为杰出的代表，也和他历来重视哲学方法论，重视从世界观、方法论总体上求得根本解决办法有关。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即具有重视方法论的特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是他早期哲学思想和大革命时期对唯物辩证法初步运用的发展。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即把哲学方法论看作认识世界的“大本大源”，看作开启智慧、安身立命的“工具”。1920年11月他在给罗学瓚的信中谈到“引起思想迷误”的思想方法上的四种迷误，“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

强调决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反映出他反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点。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优于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正在于他一贯重视认识的方法——思想方法论，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时期他已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开端。后来他回顾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他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此时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都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阶级分析方法来运用的典范。他通过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实地考察，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各种阶级矛盾，如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特点的分析，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解剖，对中国农民各阶层的研究等等，在当时都高人一筹。特别是他关于“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之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的鞭辟入理的分析，表明他一开始就将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认识方法来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立统一方法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通向唯物辩证法的中介和桥梁。后来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方法”一节中，毛泽东将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相提并论，正是阐明二者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科学方法论。1929年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到“思想方法”。同年，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有关“党内教育问题”一节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纠正唯心观点（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的估量”。这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而与唯心方法相对照。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科学的分析方法”的概念。1933年—1934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强调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到延安后写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为了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代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唯心的方法”。建国后1960年他在天津会议上更说“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哲学就是认识论”，所谓“架子”，也就是思维模式或概念图式。把哲学看作方法论，是毛泽东一贯的哲学观点。

三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来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方法，那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已有质的飞跃。这时已不局限和停留在阶级分析方法上，而是

开始直接地加以运用。特别是通过掌握和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来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和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这表现在：

（一）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方法。

“矛盾”范畴，中国古已有之，原表示互相对立或不相容的事物。毛泽东早年接触或用过这一概念，但当时还不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最早在《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中用了此范畴：“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遽这态度。”这里还仅限于将“矛盾”用于描述主体的矛盾心理和态度。真正将“矛盾”范畴用于研究社会，分析客观，这是他到井冈山以后的事。

“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石。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范畴已有所了解，但直到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在论述中国社会诸矛盾时，往往使用“冲突”、“争斗”等概念，而鲜用“矛盾”这个哲学范畴。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1927年8月和11月通过的两个决议方案中，曾使用过“矛盾”范畴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当时极为险峻的革命形势，如“沪宁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但在1928年初的一些文件中，仍沿用“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国民党各派的冲突”等等，甚至1928年6月中央给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的信，也还用“冲突”来代替“矛盾”。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用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中日互斗的各派之利益相互矛盾”。之后，7月中共六大的决议已全部用“矛盾”范畴来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势。不过当时所有中央文件同共产国际决议一样，并没有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展开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因而也没有产生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1928年—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中，开始集中、突出而又创造性地运用“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从而开始产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可谓是我党在“六大”后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一个典范，是从帝国主义矛盾引发中国各军阀矛盾这一基点出发，剖析国内形势，确定革命任务和道路的第一篇深刻文章，也是毛泽东本人直接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表明唯物辩证法已开始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在“国内的政治状况”一节中，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伐打下京、津后，即形成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¹¹⁾从这个立论出发，他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方面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是中国的特征之一。它“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

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可见，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及其在中国引起的各派军阀矛盾，是他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客观矛盾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指出革命者在策略上应视白色政权内部矛盾发展之不同而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战略和策略。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一年多的经验，他提出了“红色根据地区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思想。

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更趋纯熟自如。这表现在：

1. 文章大量运用“矛盾”范畴，对必然引起中国革命高潮的诸种矛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指出“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¹²⁾而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来的，是新的—连串矛盾的加深和发展。如广大的赋税负担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广大士兵群众、广大学生、城市贫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同洋货的矛盾；等等。他说，“如果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¹³⁾特别是他的至理名言——“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可说是后来《矛盾论》思想的先导。

2. 更为重要的是，此文直接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强调这是正确进行时局估量和决定战略方针的关键，表明了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更大自觉性。

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犯有革命急性病和革命悲观论者的共同认识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种科学分析方法，对革命和反革命这对矛盾的两方面，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从而“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陷于唯心论（主观主义）。一些人被客观情况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特别是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紧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在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¹⁴⁾他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所谓“实质”，也就是“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只有考察事物内部的矛盾，才能抓住事物的“实质”，避免主观片面性。这篇文章明显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它和同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起，形成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

1935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继续大量使用“矛盾”范畴，是二战时期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又一重要著作。文章特别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¹⁵⁾

文章还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狗打架”的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进一步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战争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他着重阐发了矛盾的特殊性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¹⁶⁾的重要论断。此文从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到进一步研究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研究主观和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形成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而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导。1937年在《力争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

由此可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已做到全面的运用。

（二）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于中国，从而运用了这一规律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

1915—1917年，列宁陆续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制矛盾的理论，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得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不平衡，并使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¹⁷⁾“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再认识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列宁在酝酿这一理论的同时，集中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下了《谈谈辩证法》、《哲学笔记》等，表明离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和帝国主义理论。

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运用这一“不平衡”规律于中国，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历史，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¹⁸⁾但是，会议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会上布哈林等人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估计非常悲观，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否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¹⁹⁾

同年7月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按照共产国际精神，也运用了“不平衡”规律：“（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够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²⁰⁾但“六大”在运用“不平衡”规律时，由于在指导思想还是以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为中心，所以仅认为中国

革命失败，原因在于农民运动落后，未支持工人运动，而未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正要求革命必须以乡村为中心。

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谈到：“六大”本来可以对共产国际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一种特性是运动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点作具体的研究，但却做得不够。“六大”“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²¹⁾不仅如此，立三路线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在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央七号通告”，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后来错误的根源。”李立三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就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之他主张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错误又与他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真正创造性地将列宁的“不平衡”理论运用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是毛泽东。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一原理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

这种运用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思路是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到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再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把革命发展不平衡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另一条思路是，从认识人类历史上两种世界革命（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到认识当代两种类型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再到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条思路交相辉映，最终导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

从1927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开始，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由之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认识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1929年4月他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信，已初步提出农村革命为中心和中国城乡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他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²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已初具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更从过去间接运用列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原理，到直接运用这一原理，明确提出“中国是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²⁴⁾

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进行了新的精辟概括，指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²⁵⁾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使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他还指出，1927年冬到1928年春在井冈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时，他就已经把这个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特点指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答复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认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是认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基础，而且是认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和持久性特点的分析，也来自对这一“不平衡”的认识。1936年他说，“在1930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²⁶⁾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必然造成敌人营垒的矛盾和分裂，这就产生了利用敌人矛盾决定我们的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毛泽东十分注意分析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井冈山的斗争》就提出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认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产阶级。”⁽²⁷⁾1935年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他分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化，指出“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这不过是大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斗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下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²⁸⁾据此，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问题。

党的六大也指出过军阀战争不断的特点。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军阀战争的分析不同于‘六大’之处，‘六大’尽管也讲了种种矛盾，但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着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²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除上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两者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量使用唯物辩证法诸范畴，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特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大量运用了一般与个别（特殊）、本质与现象（实质与形式）、必然与偶然、主观与客观、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辩证范畴，充分表明了他的辩证思维的特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直接全面运用，奠定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理论的基础，对毛泽东哲学认识论、军事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统一战线等理论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运用，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1937年毛泽东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深刻总结，既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是对开创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哲学总结。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艾思奇文集》上，第62页，第57页，第6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

(11)(12)(13)(14)(15)(16)(23)(24)(25)(26)(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第47—48页，第100—101页，第101页，第100页，第149页，第173页，第102—103页，第152页，第188页，第153页，第70页，第148页。《瞿秋白文集》，第24页。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第5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80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2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18)(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4页，第173页。

(19)(21)(22)(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页，第56页、第5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认识和运用

胡长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经典式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毛泽东则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考察，反映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艰辛历程和思想成果。

一

“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唯物史观合逻辑地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青年毛泽东通过研读唯物史观的启蒙著作和认真总结现实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转变最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牢固树立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二是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按照唯物史观的体系和结构来观照，青年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问题上。

青年毛泽东在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启蒙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但是我们注意到，青年毛泽东并未把阶级斗争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在阐述自己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在这里，毛泽东尚不能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是单纯地把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当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据，这就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伦理谴责的色彩。由于脱离了生产力，毛泽东也难以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而将其无限制地泛化和扩展了，认为当时人类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这就势必得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阶级斗争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但它并非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从逻辑关系上说，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反映。从历史角度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阶级斗争则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未把阶级斗争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固然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有关，但同时也与他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与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目标问题，一是手段问题，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便形成了社会改造的完整方案。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前，毛泽东追随过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改造方案，但这些方案终究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不仅因为它们在目标上显得空泛和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其所设计的手段根本无法和目标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不仅明确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他素所怀抱的大同理想相契合，而且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有效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泽东所言：“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青年毛泽东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出发，有着强烈的实践理性，这决定他首先汲取的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最具有实践性的内容，而非社会基本矛盾等抽象的、深层次的理论成果。

与同期的李大钊、李达等人相比较，李大钊、李达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要明显超出于毛泽东。李大钊在解释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 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李达也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墓”。此外，陈独秀、蔡和森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但是，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有一种共同的理论上的困惑，即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把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力量，类似一种“自然进化说”，另一方面则突出和强调阶级斗争，又像主张“人为的革命说”，这两个方面不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也最易遭人责难和非议，如李大钊对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便“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陈独秀与蔡和森在关于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信中，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陈独秀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不难看出，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离为二是当时不少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产生的根源是他们认为“进化说”与“革命说”之间存在某种矛盾并力图化解这一矛盾，但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仅仅变成了对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而不能被人们自觉地当作历史规律，发挥它在创造将来历史中的认识功能和指导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忽视现实的经济条件而超越阶段。如果说李

大钊等人的上述见解还是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质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则使他们感到马克思似乎过高地抬高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与俄国有着很大相似性的中国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在与梁启超、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局限，这就是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估计不足。李达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就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是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是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蔡和森说：“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

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要超出于毛泽东，但由于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相互关系，没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见解与毛泽东处于同样的思想层次，即都主张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唯物史观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但唯物史观并非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在历史领域活动的全是有意识、有目的、凭思虑和激情行动的人，离开人的活动就无从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在一切生产方式呈现对抗性的社会中，必然分化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几个基本阶级，造成阶级斗争的局面。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然而，阶级斗争的性质、规模及其结局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恩格斯在评价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 also 说过：“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¹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当时俄国处于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俄国随后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准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遇到挫折。于是，列宁转而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及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都不可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和俄国相比较，中国和俄国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但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0%以上，而中国在抗战前夕，现代工业的比重才仅达10%左右。撇开具体的历史境遇的差异不说，单从经济上讲，中国也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努力研究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紧要的政治任务

是用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集全党的智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关于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学术界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可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过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认识和运用处于何种状况，则仍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民主革命在经济上的动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关于中国生产力的状况，毛泽东在1923年4月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便指出：中国“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后来在广州农讲所给学员讲授《中国农业问题》课程时，毛泽东初步表达了中国要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思想：“在中国的生产力上说，大部分还是农业生产，而经济上的要求是要由农业的生产进至工业生产……我们要努力工业经济，以与帝国主义的工业经济相抗衡。”⁽¹²⁾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必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初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革命》半月刊上，随后经历两次不同程度的修改，分别发表在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在原稿和头二次修改稿中，毛泽东都未能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划分社会各阶级，而采取了根据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办法，即打破都市与农村的界线，把城市和农村经济地位大致相同的社会集团划归同一个阶级，如城市中的官僚买办、军阀与农村中的大地主同属于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华资工商业主与农村中的小地主同属于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未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仍有将中国社会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点及其反动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当时的国民革命理解成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

不久毛泽东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写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维护。”军阀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把地主（大、小地主）从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加以分析，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封建生产关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解决了我党长时间以来不知道军阀代表什么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问题，明确和突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

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以重租、重捐、高利贷等剥削方式残酷地压榨农民，造成农村经济的普遍退化和凋敝。要解放农民这一中国“生产的主力军”就必须打倒地主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所谓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才能提供工业原料，购买工商业产品，从而带动工业的

振兴。

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强调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这相对于党的创立时期来说，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还不善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入手来分析中国民主革命的缘起。他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阶级”的概念，而几乎没有提到过“生产关系”的概念。尽管他所列举的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对象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正是中国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分析》一文中有关生产关系的一些论述，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等，则属毛泽东 1951 年对该文作第三次修改时所补充，不能完全代表毛泽东当时的理论水平。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了较自觉的运用，他初步意识到，中国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¹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¹⁴⁾地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文化上推行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使农民知所遵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而政权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故农民必须以政治斗争为主，兼及经济和文化的斗争。政治斗争的任务是摧毁封建地主的政权，不推翻这个政权，就不会有农民的地位；经济斗争的任务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文化斗争的任务则是打倒“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¹⁵⁾毛泽东着重指出，文化斗争是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为前提的，“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庭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¹⁶⁾农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的解放，在经济问题解决以前，不宜生硬的勉强的动员农民进行文化的斗争，“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行的。”⁽¹⁷⁾总之，文化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出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看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变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关系的认识虽然是就农村而展开的，而且还不十分明晰，但却是他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思想胚胎和萌芽形式。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方面，加之处在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读到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因而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运用方面，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来说未有实质性的突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发愤攻读马列主义原著以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为了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把学习和钻研唯物史观当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¹⁸⁾他还向刘少奇推荐恩格斯

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的《唯物论》等著作，并表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¹⁹⁾此外，艾思奇、吴黎平在写作《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鼓励。随着这种集中和刻苦的学习，毛泽东对作为唯物史观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阅读 30 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国内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时，对其中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段落密加圈画，标上单杠、双杠、曲线、竖线等符号，对论述不够清晰之处则打上疑问号，留下了苦苦钻研的痕迹。1937 年 7、8 月间，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时，便多次提到社会基本矛盾，如在论述研究矛盾的特性必须以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为前提时，他指出：“这种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很好的模范。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矛盾统一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政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²⁰⁾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毛泽东得以全面、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思想条件。

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怎样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以为只要无产阶级领导各革命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便基本具备了，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前提。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虽然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在实际上却极力贬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瞿秋白认为：“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²¹⁾蔡和森也指出：“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²²⁾这样就把民主革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毫无实践意义的论断。从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认为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这显然也是侧重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左”的经济政策，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要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争取和团结革命力量。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及作用，他没有作出预见性的阐释。

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深化的基础上，通过深湛的理论思考，才解决了如何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呈现多层次、反差大、整体水平低的状况。抗战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 10% 左右，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 90% 左右。毛泽东立足这一现实的国情，科学地阐述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演变趋势。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建立它的生产力条件在于中国有了 10% 左右的现代工

业，没收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垄断的现代工业的绝大部分，便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中国大约有 90% 左右的落后的与古代近似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决定在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则既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辅助力量，又分别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向公有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介形态。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是把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因而对待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可简单地用伦理评价去代替历史评价，而且对其存在价值的判断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刺激下产生起来的，人们在痛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同时，也不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持厌弃的态度，把资本主义一概视为消灭的对象，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眼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的必然产物，而且各自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剥削制度在历史上均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即是说“恶”往往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杠杆。他们考察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²³⁾他们之所以要求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像巫师一样已无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无法再容纳和驾驶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力。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便决定中国革命的锋芒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和私有财产，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换句话说，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立足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经济条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资本主义给予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他在解释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理由时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²⁴⁾他进而指出，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²⁵⁾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是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可以说，确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未来中国有其重要历史进步性的观念，标志着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认识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令我们联想到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俄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革命后不可能实行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当时俄国的一些清谈家和惯于唱

高调的人指责新经济政策是“倒退”，是“右派布什维克”的“妥协”。对此，列宁严肃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向资本主义作出必要的让步，才能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些表面上格外革命的人常常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实质上是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只从中抽出两种成分来作简单的比较，而不知道，“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²⁶⁾正确的态度应是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列宁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渗透着冷静的历史主义精神。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以断定，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受到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启示。

拿新经济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相比较，两者在利用资本主义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在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转而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则是毛泽东自觉地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而设计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从一开始就肯定了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借这种过渡的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形态代替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辨析，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毛泽东则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体的社会形态进一步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对三者辩证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²⁷⁾把上层建筑分成政治和文化两大部分，说明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经济的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化和发展，其特点在于突出了政治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更具体更内在地揭示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辩证统一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即这场革命不仅要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要廓清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²⁸⁾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这种新政治和新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凝炼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立这种文化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宗旨，其目的在于清除长期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带来的文化灾难，把一个受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毒害而愚昧落

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的文明先进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国民素质的全面进步。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社会，只有具备了三方面的条件，才能转向社会主义，否则不能轻易地谈转变。正如毛泽东所倡言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²⁹⁾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意图和目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把握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时高度自觉的整体和系统思维方式。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深入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注释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150页，第23页。

《李大钊选集》，第223页，第190页。

《李达文集》第1卷，第34页。

《独秀文存》，第837页。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3号。

(22)《蔡和森文集》，第77页，第767页。

(1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第248页，第256页。

(12)广州农讲所学员冯文江1926年6月听课笔记。

(13)广州农讲所学员金绍绩1926年听课笔记。

(14)(15)(16)(1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页，第31页，第32—33页，第33页。

(18)(1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第219页。

(20)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21)《瞿秋白选集》，第254页。

(24)(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25)(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第663664页，第664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章竟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价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贡献。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70年代初，他对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在天才论思潮泛滥之际，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问题的根本立场

林彪原本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杰出人物的才能是天赋的，先验的。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此他捡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天才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在所难免。千百年来，在哲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关于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天才”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林彪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认为有“天才”，他本人赞成天才论，而在于他把天才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硬要全党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加以接受，使其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集中暴露了他的这一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以后又多次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称天才”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强加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企图推翻党中央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就不单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毛泽东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他的党性，都使他不同任何唯心主义思潮妥协，不允许任何错误观点玷污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尽管在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个人崇拜曾在认识上产生过偏差，警惕性有所减弱，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林彪这种甜言密语和曲意逢迎所陶醉，相反地，他越来越感到“讨嫌”，特别是在“天才”问题上，他依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同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党的九大之前，他

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天才地”是什么意思？这是无法作科学解释的。照林彪的说法，就是毛泽东“天赋很高”、“天资很高”，是“天才”。可是，把毛泽东继承、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赋”、“天资”、“天才”联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适用于一切人，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断然圈去三个副词，完全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定信念，出于对林彪鼓吹天才论、搞个人崇拜的厌恶，而不是像林彪集团所歪曲的那样，是出于所谓的“伟大和谦虚”。

圈去三个副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这深深触动了林彪那敏感的神经。通过对毛泽东“称天才”，使自己也登上“天才”的宝座，通过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本是他的如意算盘。毛泽东的做法，惊扰了他的美梦，危及了他的根本利益。林彪终于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在开幕式上发表突然袭击式的讲话，中心就是坚持“称天才”。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为了在理论上用马列主义的“老祖宗”压毛泽东，欺骗与会的中央委员，林彪集团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他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材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天才论思潮进行一次总清算。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当时正处在“语录”盛行的时期，“语录”几乎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为什么毛泽东断然斥责他们编的称天才《语录》是“谣言和诡辩”？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总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判断。

首先，这个《语录》的用心，是要把马、恩、列、毛这些革命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成为天才论者，是要证明“称天才”并非自林彪始，而是从“老祖宗”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天生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等，都是“废话”。其后，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及一些书信中，又对天才论反复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也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观，特别是阐述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

列宁曾多次论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能，但从未强调过“天赋”、“天资”等等，而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才能的极端重要性。如他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文章中指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组织才能和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在谈到倍倍尔时特别指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才能，是个坚定的实践论者。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反映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也表明了他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是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的。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其次，《语录》所采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即利用马列著作中有“天才”字样的只言片语，歪曲、阉割它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

《语录》共摘编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七句有“天才”字样的话，其中恩格斯一句，列宁五句，毛泽东一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话。其实，若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话也可以找到，恩格斯有“天才”字样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多。但是，若根据这些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天才”，赞成天才论，那就像仅仅根据唯物主义者有时也用“灵魂”一词，就断定他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也是唯灵论者一样的可笑。

“天才（Genius）这个概念同“灵魂”一样，是从神学的胎胞里出生的，本身并不科学，但因为流行已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要剔除它很不容易。何况，在辗转流传中也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沿用这个词，但其含义已不再是指“天生的才能”，而是指“卓越的才能”或“非凡的才能”。“天才”含义的这种演变，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如歌德在早期曾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控制的神力；但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虽仍用“天才”这个词，其含义已侧重于“卓越的才能”的意思。所以决不能因为歌德后来仍用“天才”这个词，就不加分析地认定他始终是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

只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这个词并不是在它的原始含义（即天生的才能）上使用，而是已注入了新的内容，给予它新的含义。

一是作为赞誉词来用。如马克思说贝尔纳多特“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恩格斯说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这里的“天才”显然是指比一般才能更高的杰出才能，同样，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称赞康德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

系是逐渐生成的这个观点为“天才的发现”，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非凡的”、“卓越的”或“出类拔萃”的意思。

二是作为讽刺、调侃语来用。如马克思说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说耶利米·边沁是“资产阶级蠢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有时还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即学者、律师等称作所谓的“天才人物”。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既不顾“天才”含义的历史演变，更不看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天才”一词，只是把一些有“天才的著作”、“马克思的天才”、“富有天才”、“天才条件”等字眼的句子摘出来，就牵强附会地冠上“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这样的标题，这是不是“诡辩”？

由此可知，“谣言和诡辩”乃是《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短文的“点睛”之笔，确实抓住了《语录》的要害，揭穿了林彪、陈伯达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阉割其精神实质的骗局。

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从而与天才论划清了界线

毛泽东对于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一向坚持有破有立，以破带立，以立促破。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也是如此。这集中表现在：他在批驳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的同时，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看起来似乎很浅显，实际上却抓住了根本，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

1. 它明确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对任何事物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属性，即搞清楚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才能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如果把本质属性搞错了，认识就会陷入困境。天才论的失误，首先就在于没有弄清楚或者说看错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早期的天才论是神赐论，如柏拉图就认为诗人的才能是神赐的。到了近代，神赐论逐渐为天赋论、遗传论所代替。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断定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实际上就是认为才能的本质属性是生物性。如现代西方天才论的代表人物高尔顿和弗洛伊德，在才能的研究中就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学倾向，用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的话来说，“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天才和创造行为主要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林彪强调“天赋”和“天资”，把他的脑袋特别灵归之于父母的遗传，同西方天才论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生物学倾向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特别重视家谱、亲缘关系、遗传基因、精神病理、童年智力、出生次序、早期个性心理等等的研究，想从这些基本上是生物性课题的研究中，寻找才能的来龙去脉，揭示“天才”的奥秘。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类研究并不成功；尽管有些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过“轰动效应”，但终因经不起实践检验相继陷入困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精深哲学修养的理论家，一向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针对林彪的天才论作出的“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对才能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界定：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

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如实反映了才能的本来面目，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它突出强调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是对天才论者所宣扬的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等生物学观点的彻底否定。

由于受天才论的影响，有些人总是把天赋看得比知识还重要，认为才能的高低，才能的差异，主要不是取决于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取决于天赋是否优异。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毫无疑问，人的才能都要以生理素质为基础，以肌体的生理能力载体，而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确有先天的成分和天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人的一般行为能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才能（指创造能力）并不是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的自发延伸，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使知识与肌体相结合，使生理能力变成知识能力才形成的。一个人即使天赋优异，若不与知识相结合，不经过知识的灌注和训练，也不可能具有创造才能，就像任何聪明的小孩，不经“呀呀学语”，不可能自发地会说话一样。所以，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天才论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天赋”，而在于“天赋”指的是什么。若是指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马克思称之为“自然力”），这没有争议；若是指才能，即知识能力，那么，它既不可能天赋，也不可能遗传，只能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这里他以个人的经历对“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对天才论作了有力的反驳。天才论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区分生理能力与知识能力，只根据某些表面现象作出普遍的结论；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却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2. 它集中概括了前人对才能本质属性的认识成果。

千百年来，在才能的研究中虽然出现许多学说、学派，但从根本上划分，主要是两种：天才论和知识能力论。知识能力论作为天才论的对立物，为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我国，王充是最早的注意研究才能的本质，并对天才论作了系统批判的学者，他明确地将才能看作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力量，他在《论衡·效力篇》中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论断，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安放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诸葛亮也是个知学论者，他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在欧洲，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能力论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歌德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¹¹⁾。赫胥黎说：“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来培养的”⁽¹²⁾。他们都把知识看作是才能的基本要素，都看到了才能的知识属性。

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向强调才能的知识属性；即使有时他们用“天才”这个词，但实际所指并不是天生能力而是知识能力。如林彪、陈伯达编的《语录》中第一条是：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他只是借以赞扬马克思对刚刚发生的事变的卓越理解和透彻洞察。他紧接着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¹³⁾只要通读全文，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会看到，恩格斯虽然用了“天才”这个词，但他决不是一个先天能力论者，而是一个坚定的知识能力

论者。同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时，有时也沿用“天才”二字作为赞词，如“马克思的天才”、“天才思想家”等等，但是他从不认为马克思的才能中有什么先天的成分。相反地，他一再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是“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他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¹⁴⁾。说明在才能问题上列宁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是明确而坚定的。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成果，而且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些认识成果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由于前人还没有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样的概括，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才能认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 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同天才论划清界限。

长期以来，由于对才能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许多人包括一些唯物主义者都无法抵挡天才论的影响。有的全信。如狄德罗是个唯物主义者，在别的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聪明智慧，但在才能问题上却陷入了迷信，他说：“天才是一种纯粹的天赋”⁽¹⁵⁾。有的半信。如严复在评论诗的创作时说：“大抵论诗功，天人各分半”⁽¹⁶⁾。傅雷在谈到艺术才能时也说：“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¹⁷⁾。有的基本上不信，但仍保留了一条天才论的尾巴。如报刊上还常见这样的观点：“人的才能大部分是出生后学来的”；“才能固然有天赋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的”。应该说，这种观点是相当唯物的，基本正确的；但是，肯定才能有先天的成分，默认才能少部分是先天的，那就在实际上为天才论留下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可能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彻到底，也难以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毛泽东关于“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不仅明确了才能的知识性，而且强调了知识的后天性；由于它在理论上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没有给先天论、半先天论、少量先天论留下任何活动地盘和繁衍空隙，所以能够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贯彻到底，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澄清天才论造成的思想混乱。

强调才能要靠社会实践，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为才能的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

毛泽东对于人的聪明才智的形成和发展，一向坚持两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的观点和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在同林彪天才论的斗争中，他再一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两个基本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知识从哪里来？他认为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来。

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是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首要条件。在《实践论》中，他针对那些自恃聪明而轻视实践的所谓“知识里手”，深刻阐明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

唯物论者。”这段话，不仅把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讲透了，而且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的关系讲透了。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才能也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它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说：他们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里他虽然提到“天才条件”⁽¹⁸⁾，但着重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是离开实践任何天才也不能成功，实际上是对天才论的否定。但是林彪、陈伯达的《语录》，竟将这句话摘编进去，歪曲为“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对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驳说：“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天才论者虽然煞费苦心，但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论据，只靠歪曲马、恩、列、毛的话过活，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何等贫乏。

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吸取和集中群众智慧。他有一句名言：“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里他说的知识，主要是指有关中国革命的知识：这种知识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只能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去发掘，去寻找，去总结。他说：“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¹⁹⁾。在毛泽东看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是获得知识的捷径，也是救治愚昧无能的良方。他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²⁰⁾。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隐含着对天才论的憎恶和批评。知识不可能靠“天才”得到，有些人以无“天才”而自卑，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固然不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另有些人以有“天才”而自傲，同样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也不可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经验，当知道林彪极力吹捧他“是天才”，“是世界最大的天才”，极力突出他个人，以至把他神化的时候，他不是高兴，而是气愤，不是引以为荣，而是引以为耻。他明确指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里，他虽然并不反对沿用“天才”这个词，但却赋予它新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同天才论者突出个人、制造对“天才”的迷信截然不同，他把个人放在集体中，强调的是才能的集体性。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深刻的，科学的。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家前后相继，接力奋进的历史，他们每个人的才能不仅以前人知识成果的利用为前提，而且以这种利用为内容。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才比这些巨人看得远些。文学家何尝不是如此！歌德在晚年总结他一生的成就时说：“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天才”人物“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他们的伟大处，就在于“懂得怎样和旁人合作，怎样利用旁人去替他工作”⁽²¹⁾。由此可知，毛泽东关于“天才是

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不仅概括了他个人的实践经验，也反映了历代“天才”人物成长、发展的普遍规律。

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所强调的上述两个基本观点，为正确认识个人才能与社会实践、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向导，从而为分清两种才能观和历史观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准绳。如果说毛泽东过去强调这两个基本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和领导方法方面来立论，那末，这次则进了一步，将它直接同才能、“天才”联系起来，为才能、“天才”的知识性和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有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个论断，再加上知识、才能主要靠社会实践、靠集体智慧这两个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就不再是抽象的笼统的理念，而是一座已经立起梁柱的建筑物，虽然细部仍需建造和装修，但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这无疑将对才能问题的研究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结了天才论泛滥的教训，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列和对“天才”问题“要继续研究”的任务

天才论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潮，这已是唯物主义者的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不应成为问题。为什么林彪竟能使它在党内兴风作浪，并且确实欺骗了许多同志？

这里当然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如当时党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崇拜气候，这种气候为天才论的繁衍提供了温床；林彪又是打着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幌子“称天才”的，而且给“天才”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这就容易迷惑人和欺骗人。但是，对于受天才论影响的同志来说，最根本的教训，还是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他特别提出：凡有阅读能力的，都要读十几本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此外，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

强调读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读哲学史，当然不是说从中可以找到有关天才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可以从中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吸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其中也包括两种才能观）斗争的经验教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两种才能观的斗争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天才论的泛滥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历代唯物主义者都同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思想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它的指导下，对才能的认识和对天才论的批判，都获得了新的进展。如：天才论者强调天赋能力，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知识能力，强调要具有从事复杂劳动的、发达的、专门的劳动能力，就要经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天才论者认为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主要的先天条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是社会实践、社会分工，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²²⁾；天才论者突出个人，把“天才”看作是“唯一者”加以神化，而马克思

主义者则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²³⁾；天才论者看重“天资”或“上帝的恩赐”，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勤奋学习和积极实践，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尽管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出有关才能的专门著作，但从他们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从他们有关才能的这些精辟论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批判天才论的有力武器，尤其可以学到认识和研究才能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毛泽东强调读马、列，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避免上当受骗。林彪的天才论之所以迷惑了不少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所谓称天才的语录进行欺骗。他们摘取的是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了它的原意，颠倒了理论是非。但由于对原著不熟悉，对基本原理不熟悉，就不容易识别，就像毛泽东说的：“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所以，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避免上当受骗，避免在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问题上“闹出大笑话”，就得认真读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

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认真读点马、列，而且提出对“天才”这个既是认识论又是历史观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他所说的“还要继续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当时虽经批评，林彪及其一伙并没有改变篡党夺权的野心，并没有放弃唯心主义天才论；另一方面，“天才”问题是认识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千百年来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许多思想上的混乱需要清理，有不少认识上的难点、疑点需要研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由于同林彪的斗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所以当时对天才论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批判。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揭露了林彪的阴谋，批判了他的一些天才论观点，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一句顶一万句”、“顶峰”、“大树特树”等等。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他所说的“继续研究”未能继续进行，但是，他的《我的一点意见》，他对林彪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批判，已向我们提示了“继续研究”的可靠途径和有效方法：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外部表现和内在本质。如果只看现象，只凭感觉和印象，而不深入研究才能的本质，就容易为扑朔迷离的现象所迷惑，把才能神秘化。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²⁴⁾在批判天才论时，毛泽东首先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才能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才能的后天性，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从原则上同天才论划清了界线。

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吹得天花乱坠，但终归因为不符合事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对林彪的“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的谬论，就首先指出这“不符合事实”。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

出现一个呢？”由此可知，通过摆事实把道理讲透，这是破唯心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也是立唯物主义的最可靠的途径。这就需要广泛地收集材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要既从认识论上进行研究，也从历史观上进行研究。“天才”问题首先是个认识论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历史观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天才论者大都坚持英雄史观，就像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谈到蒲鲁东时说的：他们认为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²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时也说过：按照他们的理论，就是“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即应崇拜天才”⁽²⁶⁾。林彪的天才观与这些论者可以说一脉相承。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唱《国际歌》，因为“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重提“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丝毫没有可以忽视英雄人物个人的历史作用的意思，而是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一句话，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正确地看待个人、评价个人和宣传个人，而不要上天才论的当，受唯心主义的骗。

我们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早已成为过去；但是这场斗争所包含的思想理论内容——毛泽东批判天才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却因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而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还要继续研究”，是毛泽东的遗愿；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样，就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了。”“林彪、康生这些个人野心家则利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完全否定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并且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0、451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70页。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7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57页，第634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第2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

《天才和杰出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7页。

关于才能的本质、才能的形成问题，我在《知识力：才能的内在本质》（《求是》1993年第16期）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

《诸葛亮集》，中华书局出版，第28页。

(11)(12)《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04页，第250、251页。

(12)《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科学出版社出版，第53页。(13)(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第602页，第124页，第82页。

(14)《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8页。

(15)《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31页。

(16)《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85页。

(17)《博雷家书》，第37页。

(18)这里所说的“天才条件”究竟具体指什么，不是很清楚。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指“天赋”、“天资”条件，即先天的生理素质方面的条件。

(1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2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与科学价值

赵南起

本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这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指挥艺术之高超，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革命战争，以其辉煌的胜利。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遭受列强侵略与欺凌的耻辱，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自豪、自信和自尊，表明自己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驾驭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指导这场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是武装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军事工作作为党长时期的工作重心，毛泽东始终以极大的精力注重战争，研究军事，指挥作战。据统计，毛泽东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指挥和参与组织指挥的战役战斗就达 239 次之多，尚存的从 1927 年到抗美援朝时期亲自撰写的军事论著和指挥作战的文电达 5000 余篇（件），约 400 余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仍对军事斗争倾注大量心血。毛泽东的军事实践，包括领导武装夺取政权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最成功、最精彩的实践；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大系中最丰富、最完善、最系统化的理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亿万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是与他百战不殆的军事实践和科学的军事理论创造分不开的。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军事人物如群星灿烂。可是，像毛泽东这样集政治领袖、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融实践的开拓性和理论的创造性于一体，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人物，则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凭借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领导数亿人民群众，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同时也建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大厦。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科学价值，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振兴中华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实践特色

任何理论思维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背后，都有与之相联系的深刻的时代背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下，到了兴亡继绝的危险关头。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包括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探索，但最终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面临着新的抉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中坚。然而，旧中国积重难返。面对反动势力极为集中和强大，革命力量比较分散和弱小，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局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完成民族

和阶级解放的神圣使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大课题。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奠基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问题作了可贵的最初探索。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创建人民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率先成功地探索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规律和指导规律。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若干著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方针原则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根本性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初时期急待解决的一些特殊而又复杂困难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时期，这主要体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反抗日本侵略者并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于长征结束后，开始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理论，包括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持久战的理论，人民军队建设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理论，等等，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等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武装和指引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忱，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才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惊天动地的伟业，成为决定日本法西斯失败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三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阶段，这主要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军事艺术和军事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撰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大量指导战争的文件、电报中，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独特的战略进攻包括战略决战的理论，制定了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指导原则，解决了最后夺取国家政权重大历史关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对一系列战役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重大决定性战役挥洒自如的作战运筹，以及前无古人的战略魄力和用兵如神的组织指挥，表明他的军事实践更加丰富和全面，理论更臻科学和成熟，军事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四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丰富的升华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国防和巩固国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入国家建设，毛泽东难以再写更多系统的军事论著，然而在他领导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及指导作战的大量文电、指示和训词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他提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和抵御外敌入侵的

历史任务，根据国际形势的突变，果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并及时总结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与高度现代化敌人作战的一系列新的军事原则。之后，又领导制定了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以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一些基本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其鲜明的气派和特色。主要表现在：

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国情相当特殊。没有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要创造出满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需求的军事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是最早注重国情研究并最早认清国情的党的领导人。为了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前，即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倾注了大量心血。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深入社会最底层，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研究中国社会的论著，对旧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其中的两篇杰作。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也丝毫没有忽视对国情的研究，无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国情方面的论著在他的著述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正因为毛泽东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了中国国情，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牢固的社会认识根基。

以丰富的直接实践为主要源泉。自古以来，许多兵学大师包括最负盛名的孙武和克劳塞维茨，由于经历和实践范围的局限，所创造的军事思想体系，大都来自对间接战争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兵圣孙武主要总结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推出了不朽的名著《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主要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推出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经典《战争论》。他们都是以间接战争经验为主来构筑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战争经验之精华，但与众不同的是，它主要是来自中国革命战争的直接经验，来自毛泽东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的亲身实践。从 1927 年秋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长时期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于遵义会议后实际位居最高统帅达 40 多年之久。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最有条件把军事实践斗争和军事理论创造结合起来，并从全局上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往复与升华。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的近半个世纪中，经历了多种作战对象、多种作战样式和不同战争规模的实践，经历了创建和发展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进行国防建设的实践。丰富多采、蔚为壮观而又艰苦卓绝的军事实践活动，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创造提供了动力、源泉和检验的标准。所以与古今中外其他军事思想相比，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更深刻、更科学，体系更完整，更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人类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瑰宝。

以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为活的灵魂。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开拓意识和首创精神，他不迷信本本，也不囿于已有的科学模式。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非凡的理论上的勇气和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进行大胆创造。毛泽东军事思想诞生之前，各式各样的军事思想早已存在。在中国有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思想，也有以“曾胡左李”和

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军事思想；在外国，有各领风骚的法、德、日、美、俄等国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尤其是马克思、列宁的军事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并不照搬硬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以自己所特有的胆略和才识，具体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博采众长，致力于创造性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把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集个人能动作用与集体智慧结合之大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造就了千百万群众英雄和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包含了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和首创精神，凝聚着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们的心血和智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群众的实践。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区武装割据，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战略区，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分割状态。独当一面的各地区、各战略方向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军事斗争策略和手段；在中央工作的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通过参与重大决策、起草军事文电、撰写军事著作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活动。兼有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军事家的韬略、哲学家的思辩与诗人的想象力的毛泽东，相信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吸收和集中来自领袖群体和广大群众的真知灼见。他在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军事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集个人能动作用与集体智慧结合之大成，完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工程。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论及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认识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理论体系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生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指导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和建设与保卫国防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认识与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军事斗争主要包括力量的建设和力量的运用两个方面。纵观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著述，通常放在第一位的是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力量的建设。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革命真谛，从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放在首位。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中，看到农民固有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创建一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伟大任务。毛泽东紧紧抓住军队的性质、宗旨及任务等关键性问题，创造了一整套崭新的建军理论和原则。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将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注入军队，使其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领导权重蹈落入个人或狭隘集团手里的历史覆辙。同时，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军的唯一宗旨，使军队的行动与党的政治任务相统一，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

系，明确军队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目的。并且规定了以战斗队为主，同时兼顾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制度；贯彻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定了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的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纪律；重视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等等，从而保证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

（二）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虽发生过一些具有人民战争性质或特征的战争，但受其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更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及其理论的创造，才开创了真正的全面人民战争的先河，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人民战争理论。毛泽东基于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认识，提出并实践了充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问题。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提出：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不断积蓄、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行以主力兵团为骨干，与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使人民武装力量有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可靠的组织保障；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进行战争的意义和目的，从而调动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组织千百万民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共同对敌，从而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分化瓦解孤立敌人；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如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形式相配合，形成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多条战线的、各个方面的波澜壮阔的对敌斗争局面，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争的一般规律是强胜弱败，但力量的强与弱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创造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整套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揭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争指导规律，解决了复杂艰巨的“以弱胜强”的作战指导及其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在对敌斗争态度上，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并据此确立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即在总体上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在一个一个的局部上，采取慎重态度，讲究作战艺术。在战略方针上，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即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以使战略全局上的劣势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力求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作战形式上，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形式相互配合，并根据不同战争时期、不同战略阶段的敌我力量对比和我军作战能力、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其主辅地位，适时进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在战役和战斗的方针上，基本的是歼灭战，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但不反对一定条件下的击溃战、消耗战，从而积小胜为大胜，达到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的目的。

在作战方法上，基本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挥近战、夜战特长，以保证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在作战指导基本要求上，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通过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争取作战的主动权，将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在对敌斗争手段上，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举，加速敌军的瓦解和我军的胜利。

（四）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武装夺取政权到掌握和巩固全国政权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在领导和筹划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国防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统筹安排。经济建设要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要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国家经济建设，使军费保持适当比例。这对减轻国家负担，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毛泽东提出了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以及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要求，领导我军由单一军种建设成为包括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使我军力量结构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毛泽东倡导建立起我国独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国防工业体系，而且在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候，果断作出了发展尖端技术，研制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重大决策，有效地打破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促成了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质的飞跃。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毛泽东注重现代化军队与强大的民兵有机配合，领导建立起民兵与预备役合一的国防后备力量体制，满足未来人民战争的需要，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用兵的矛盾。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申明中国决不称霸，不侵略别人，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是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也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在军事战略上实行后发制人。正是根据这一原则立场，我军赢得了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而且还应邀援助友好邻邦抗击外来侵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军事辩证法学说。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概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最高层次。它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精髓，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是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争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学说指出：

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社会本质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它的军事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敌对双方诸因素的相互对立、依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构成战争矛盾运动的内容和过程，推动战局的发展，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对立、依存和转化，在战争过程中表现为双方客观物质基础与自觉能动性的综合竞赛，表现为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物质基础薄弱的一方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能够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力量对比可以发生由弱到强的转化。战争指导者不能超越客观物质基础的许可范围去期求胜利，但应当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能动地夺取胜利。战争的形态是在不断否定旧的作战方式中发展的。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适时实行以转换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战争形式符合战争特点和作战任务的变化。战争虽然较之其它社会活动形态更带所谓“盖然性”，但同

样是有规律可循并可以掌握和运用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指导战争的根本要求。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所从事的战争的特殊规律。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认识战争规律和将这些规律应用于战争，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在战争指导中具体表现为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军事活动中的诸多矛盾双方是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要用辩证的观点而不一定是径情直遂的方式，处理战争指导上的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战争与和平、物质与精神、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等等矛盾关系。可以说，从军事辩证法概念的提出，到这一学说的完整建立，都是毛泽东的首创。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以其特有的完整性，出色地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军事力量建设与军事力量运用的高度统一，战争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高度统一，在如何认识战争、依靠谁来进行战争和怎样进行战争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独到性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类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军事思想全面通向真理开辟了发展道路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继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之后，又一次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理论，闪耀着普遍的真理光芒。古代中国孙子兵学的产生，标志人们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由悟性阶段进入了理性阶段，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等人军事思想为代表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近代欧洲。它冲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开始用科学手段探讨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不过，欧洲近代军事科学相当程度上是借助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唯心论精神建立起来的，难免鱼龙混杂，真理与偏见并蓄。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为启始的第三次飞跃，为真正科学地考察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则代表了这次飞跃的最高成就。

（一）创造了高超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艺术。古今中外的战争各不相同，但战争指导艺术的高低具有可比性。一般说来，在力量上拥有一定优势，或势均力敌的条件下赢得的胜利，虽然也来之不易；但战争艺术的最高荣誉，从来属于那些以弱胜强的统帅。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拿破仑等人，都因此而摘取并获得了“战略之父”、“战争巨人”等桂冠和殊荣。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战争艺术更为高明。第一，世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将帅，大都是能赢得若干战役战斗，能赢得整个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却为数不多。而毛泽东一生不仅创造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役战斗范例，而且指挥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以往世界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基本上是总兵力对比上的以少胜多，武器装备上则相差无几。毛泽东的战争艺术，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以少胜多，而且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其中包括先后打败两支拥有当时世界一流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军。第三，毛泽东不但擅长运用战争指导艺术，而且善于从战争指导艺术的运用

中提炼和升华出理论。毛泽东军事论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影响之广，在中外军事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之相比拟。近几十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际上广为传播，毛泽东军事著作成为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军政要人的案头读物，被许多国家列为军事院校的研修课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世界地位。

（二）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毛泽东以前，中外众多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在探索军事规律上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但是，在世界军事史上，还难以找到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对军事领域的种种问题既进行过长期而广泛的实践探索，又亲自从事勤奋而深入理论研究的人物。从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到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从建军路线到作战方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和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指挥百万大军的战略战役运筹，从持久胜敌的全面战争到速战速决的边界自卫还击作战，从“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建军、作战到建设国防现代化，从如何赢得战争到如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里面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和国防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又包含军事领域的大量一般规律问题；既广泛涉及到军事科学的应用理论，又深刻地触及到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可以说覆盖了军事理论的各个重要层次和各个基本方面。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直接经验和前人进行战争的间接经验，作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和精辟的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不是一座内容博大精深、结构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大厦。毛泽东对军事规律的理论揭示，就其丰富性、系统性和真理性而言，都达到了前人未能达到的程度。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不只是比较于其它各家军事理论而言的，其中也包括它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基础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是：对以前尚未遇到的新课题，第一次提供了科学答案。如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新道路。在前人未曾开垦的理论领域，首创了全新的学说。如军事辩证法。把过去已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如人民战争。把以往的一些理论预见，变成了完整而成功的现实。如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应有自己的表现的预言，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先哲们没能完全解决或解决得不理想的问题上，作出了迄今最成功的回答。如怎样建设一支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当代丰碑，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

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国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国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基本规律，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指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中，邓小平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创建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各项内容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根据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制定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相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论断。毛泽东晚年，基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虽然对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较重，但他关于中美、中日建交等发展大三角关系的战略决策，以及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都包含着争取和平、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深谋远虑。80年代初，邓小平洞察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很迫近的看法，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大发展，而且蕴含着对冷战体制难以维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这一理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促进发展是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既为我们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毛泽东在著名《论十大关系》中，就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发

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实力的思想。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落到了实处并作了重要发展。他基于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战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不断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他提出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发展道路，既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又不断提高整个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指出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认为高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同时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他确定我国武装力量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建设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并要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使民兵、预备役部队切实达到快速动员的要求。

（三）关于以现代化为中心，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精兵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我军必须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军建设偏离了这一正确轨道。邓小平主管军队工作后，根据现代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战争日益高技术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毅然决然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重新确立为我军建设的总任务，并进一步为我军指出了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发展道路。他强调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部队经常性工作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力改进和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技术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强调健全、完善法规，严格遵守纪律，加强科学管理，依照条令条例从严治军；强调适应新形势和现代战争的需要，加强后勤建设；强调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强调我军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政治上合格，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四）关于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实行的战略指导方针，并根据不同的战略形势和任务，确定不同的具体内容，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强调继续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战略问题的总原则，坚持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的统一，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系统阐明了制止战争的思想，提出争取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要求做好制止和避免战争的工作；倡导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做好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保持战略指导的灵活性；提出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增强立足现有装备练兵打仗的信心，积极探索克敌制胜的新的作战思想、战略战术及作战指导方针。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和进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而且是和平时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胜利指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军事工作上，正沿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的道路，贯彻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提出的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总方针、总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和重要部署。他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使我军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他强调把发展高科技、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放在突出的地位，指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他号召全军高中级干部要认真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其作战方法，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他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搞好后勤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军队素质等等一系列指示，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创造性贯彻。我们坚信，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一定能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毛泽东军事思想将继续大放异彩，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

邢世忠

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奋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

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

二、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

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

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

三、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科学处理战争中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关系错综复杂。就作战行动而言，就有走与打、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歼敌与保地、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等等。作为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矛盾法则，揭示了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天地。

把矛盾对立双方放在统一体中进行考察，防止和克服战争指导上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对于战争中诸对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的军事家大多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往往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矛盾进行了透彻精辟的分析，辩证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指导战争。如在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认为进退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以必须的打为条件的。走是手段，打是目的。在实践中，他创造了许多用走调动敌人、用打歼灭敌人的范例。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三出陇海线，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都正确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时而大踏步的前进，时而大踏步的后退，时而与敌周旋，时而“声东击西”，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逐一就歼。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走出来的，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寻求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

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对战争中矛盾复杂关系的处理，毛泽东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时当地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如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我军处于内线，要变被动为主动，我军必须在战役战斗中变内线为外线，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变为我对敌之小围剿；把敌对我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在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把敌在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抗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内线，但他把内线与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挺进敌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在外线主动打击侵华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式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能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适时地转换，而且在战役战斗中也注意使其相互配合，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把处理复杂关系的着眼点，放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上。毛泽东在处理战争复杂关系时，始终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怕丢掉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使作战形式服从作战目的。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把歼敌放在第一位，把保地放在第二位，使保地从属于歼敌。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西北战场我军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强大攻势，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创造了“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山东战场，我军主动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非主力的分散是为了主力的集中，次要方向上的分散是为了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当前的分散是为了下一步的集中。在战争指导实践中，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观毛泽东对战争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艺术，他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始终作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方法，使战争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

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仅有物质条件，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要把战争的诸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与发挥整体威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关键在于指挥员的主观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两军指挥员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用进步的思想灌注部队，用先进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方针指导战争，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使我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把主观认识与战争实际相统一，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

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主观同客观相统一，战争指导同战争实际相符合。只有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认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成是胜兵先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情况想得更复杂些，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把决心建立在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从而使我党我军在许多复杂险恶的情况下，都能从容应付，稳操胜券。比如，渡江战役，就做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抗美援朝，也做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国内的周密考虑。毛泽东还力主慎重初战，把它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首要环节。认为第一仗的胜败关系极大，影响于全局，甚至影响到最后一个战斗。他总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实施作战，否则宁可推迟也不仓猝应战。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由于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终于抓住了敌人脱离阵地的机会，首战富田，再战白沙，继而转中村、临广昌、出建宁，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而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我军实现力量转化的主要目标，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反对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我军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把战略上的以弱对强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以强击弱；把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消耗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由量的积累逐步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敌拥有总兵力430万，我仅有120万。毛泽东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1948年6月，使敌总兵力下降到365万，我军发展到280万。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把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切行动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但计划又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改。战争情况的瞬息万变，使战争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体察端倪，见微知著，适时修订原有的计划，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渡湘江后，敌人在湘西设置口袋，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极力主张改变方向，进军贵州，使我军摆脱了危险的境地。在许多大的战役战斗中，他都能依据敌情变化，采纳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修改完善计划。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的计划指导下，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极大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灵活性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突出特点。“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灵活性的生动写照。他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围歼敌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把灵活性贯穿在战争指导的全过程。拿“围城打援”来讲，宜川战役运用的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则采取“攻城打援”，平津战役还采取了“围”，“隔”并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弄得敌人扑朔迷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计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我军在复杂情况下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巧妙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战法。毛泽东实事求是，胆略非凡，敢于冲破陈旧观念，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模式和经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军事理论总结和概括，创造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非常善于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从各种战争因素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无穷变化中，创造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战法。四渡赤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战法上一反常规，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待敌重摆阵势与我决战，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不知所措，处处挨打，而我却长追稳打，游刃有余，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奇正变化源于古代，但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像毛泽东这样得心应手，用兵如神。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以独具特色的时代风格屹立于世界军事科学之林。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出神入化，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特别是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难以企及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战争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唯物辩证法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立足于国情和军情，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以现有装备打败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科学分析高技术战争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着眼战争全局和发挥整体优长，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要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充分考虑人的能动因素，研究创造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要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探索高技术战争的运筹和指导问题，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争指导艺术，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1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9页，第492页。

光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及其运用与发展

王厚卿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收古今中外战争经验的精粹，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在这一光辉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战略思想又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巩固国防的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成为党和国家谋划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认真学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受教育和启发。我们要把这份珍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在新的斗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是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从军事思想史上看，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历来是军事指导上的一个通则。毛泽东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超越以往军事家们的视野和局限，对传统的积极防御思想进行了质的改造和全面的发展，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丰富的科学内涵、全新的实践形式，并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这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飞跃，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一项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积极防御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使之能动地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纲领。

在毛泽东之前，人们论述积极防御，大都囿于单纯的攻防作战角度，其视野基本上没有超出一般的作战行动范围。毛泽东则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指导路线的角度研究积极防御问题，把积极防御提到战略思想的地位，并进而把这一战略思想与革命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直接联系起来，使其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为推翻反动统治、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本质上都具有自卫的、防御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坚决的、积极的革命政治目的。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军事和政治的结合上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他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防御与战争的正义性质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称之为“正义战争中的防御战”，他说：“后起而且发展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因为它们“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他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途径，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军力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促使战争力量对比和战

略形势逐步地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从而最终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样，毛泽东就把积极防御由一种作战原则，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政策和军事纲领，亦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决议中所说的党的“战略路线”。纵观古今，横察中外，像毛泽东这样把“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思想同党与阶级的政治要求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是以前的军事理论家们从未做过的事情。

二是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牢固地植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人民战争基础之上，成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主体和核心。

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讲的积极防御，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积极防御；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对积极防御的理论阐发，与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可以使我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坚持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灵活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断地减煞敌人的优势，进而挫败敌人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充分利用人民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充分发挥广大军民在战争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便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常常退却到根据地内作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而“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我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考虑就包含着深入发动群众和使我军的战略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两个主要问题。抗日战争中我军的积极防御，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下，以规模空前的人民游击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争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作为通过自卫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政治前提，在全面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的同时，全面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在公布我军十大军事原则时深刻地指出，敌人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办法，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提出种种对付我们的建议，但这些都不能挽救敌人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始终凭借着人民战争发挥作用，从人民战争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又始终贯穿着积极防御这条基本主线，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框架内展开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持久战思想，歼灭战思想，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并包含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之中的。它们各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并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构成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完整体系。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二者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是毛泽东在战略理论上的一大创造。

三是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反映了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规律。

攻防结合、寓攻于防，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内核。毛泽东把攻防之间的辩

证统一，放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中加以全面的发挥，表现出一种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其基本内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战役战斗上的攻势作战作为达成战略防御目的的主要手段；二是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地解决战争问题。这样，体现积极防御实质的攻防辩证关系，就在他手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的展现，使积极防御既在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起根本的指导作用，又合乎逻辑地延展到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阶段。正如叶剑英后来所概括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是贯彻战争全过程的彻底歼灭敌人的战略。革命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国防的斗争，进一步使其由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政策，从而大大拓展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内涵和指导范围，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首尾一贯的战略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研究积极防御问题的，因而它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包含了那些反映攻防关系一般规律的原则，而且增添了许多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新的理论内容。他提出的一系列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原则，基本点都是放在能动地实现以弱胜强上面的，同样充满了革命的创造性。他认为，人民力量在战争开始阶段的相对弱小，决定了其在战略上的防御地位；而战略上的防御，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来实现。只有辩证地解决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才能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地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成功地创造敌我强弱转化的条件，使敌人由强变弱，而使我军由弱变强，进而实现战争全局上的攻防易位，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一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与之相伴而生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不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独创的形式，从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上，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其深刻性是以前的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又运用于这一伟大的战争实践，指导着战争的胜利进程。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成果之辉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得以充分展示的大舞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战争时期，而在各个战争时期，又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各个战争时期和战争阶段上的运用，是贯彻始终而又高度灵活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曲威武雄壮、惊天动地的凯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继续运用于我国巩固国防的新的斗争实践之中，在战略指导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生动地展示了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辩证过程。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准确地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存在着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战争和战争规律又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战争现实，活用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经历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从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上，提出了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指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四个相互矛盾着的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并据此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确立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使积极防御战略与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这种对战争特点及规律的分析 and 把握是贯彻始终的。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的每个时期和每个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总能为积极防御战略找到最能适应当时战争特点的生动的实践形式，驾驭战争航船朝着正确的航道驶向胜利的彼岸。

其二，精心地确立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中心环节。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行动纲领，是统一思想、部署行动的基本依据。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现实斗争成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作战，红军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强大敌人的连续“围剿”，红军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而王明等人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结果导致了红军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国民党实行消极、死板的战略方针，非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反倒使自己陷入处处被动，在正面战场上屡战屡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最直接地同各个时期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总是能抓住形势发展的本质方面和推动形势发展的关键问题，确立符合当前斗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解放区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全面内战爆发后，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使我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地改变我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又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指导我军适时地转入战略进攻，进而以战略决战求歼国民党军主力集团，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在战争第一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战争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的作战行动，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这些生动的战略实践表明，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具

体化形式，也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的基本保证。

其三，灵活地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发挥指导作用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称战争是敌我双方“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对力量较弱的一方来说，要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要靠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战略指导的中心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防御本来是容易陷于被动的，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总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创造出主动的内容，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其原因就在于战略谋划和指导上的正确与灵活。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之高超、精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概括地讲，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照顾好全局的各个方面，把握战略枢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推动全局的发展；随机应变，因情措法，不拘一格，不守陈规，灵活地运用兵力与战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些战略指导要则，是我党我军执行积极防御战略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其四，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又一重要形式。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我军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转变。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曾实行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后期的运动战的转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过从战争前期的运动战向后期的阵地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我军也进行了几次战略重点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些战略转变，有从这一战争时期到另一战争时期、从这一战争阶段到另一战争阶段的转变，也有从战时到平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转变。在这些战略转变中，具体的战略方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总体上讲，我军历史上的这些战略调整和转变，都是在积极防御这个总的战略框架内进行的，但在调整与转变之前、之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着重点及其具体做法则有明显的不同，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容。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调整和转变，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不断跃升到新的阶段。实践证明，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适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推动军事斗争全局的发展和争取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战略调整和转变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为了顺利地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必须全面地把握影响形势变化的种种复杂条件，深刻理解这种变化的战略含义，并据此变更自己的方针、策略，正确地规定战略转轨后的目标和方向，克服战略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把军事斗争引向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学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打胜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继承它、发展它，坚持它在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坚持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去进攻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的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我国军事战略与霸权主义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本质区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防御性和积极性，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也就仍将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仍将是我国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予以发扬光大，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新时期的战略指导问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包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今后的国防建设，为提高新时期军事斗争艺术指明了方向。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防御性质，确立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把这一战略思想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新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功能，为这一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首先，正确地把握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走向，系统提出了遏制战争的战略主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包含着“制战”内容的。1956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制定的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提出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加重，毛泽东从应付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考虑，较多地强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一面。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他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总根源，由于霸权主义的争夺，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一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一个整套系统的战略思想。他一方面指出世界性战争可以推迟或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和平要靠争取才能赢得，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

只有积极开展反霸斗争，才能真正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就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积极防御中的“制战”思想在新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遏制战争是平时时期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积极防御的防御性和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出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战争发生后如何以积极的攻防行动，能动地夺取战争胜利的问题，而且要注重在战争发生前开展各种积极有效的斗争，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有力地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遏制不安全因素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即使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乱，也要尽量遏制小的冲突升级扩大为大的战争。当然，遏制战争要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作物质基础，赢得战争的能力越强，军事威慑效益越大，也就越能对战争起到遏制作用。充分发挥军事斗争遏制战争的职能，是新时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发展。

其次，全面地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正确规定了新时期军事斗争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国抵御侵略、巩固国防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始终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谋划战略全局。邓小平针对新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从党和国家的大战略的高度，把新时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同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联结起来，提出了军事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宏观定向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在新时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其基本着眼点来说，是要为这一利益的实现提供军事上的保障。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将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行，还存在着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需求，尽量限制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努力争取和维护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明确新时期军事斗争目标指向的基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断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就为我军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作了质的规定，并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与新时期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谋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需求，从争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纳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轨道上去，并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形式和方向，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具体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能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三，明确地提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实行由侧重准备对付大战到侧重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毛泽东对积极防御战略思

想的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全面战争展开的。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实践活动中，也包含着对局部战争的指导，如抗美援朝战争及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但他对战略问题考虑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可能发生上的。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冷静分析，得出了大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同时，他又提醒我们，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1985年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由过去的立足于大战转到重点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这是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基本的战略原则，但又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新作法。比如，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引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缩短战争进程；全面战争需要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局部战事对国家建设大局的影响，等等。总之，军事斗争准备上由过去的侧重对付大战到侧重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密切地注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战争和战略的深刻影响，突出强调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问题的新课题。毛泽东创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时，我军技术装备状况还十分低下，后来逐渐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透过朝鲜战场的炮火硝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化战争与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战争的巨大差别，深刻地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以便迅速地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¹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重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论述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强调要研究现代化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问题。他把现代技术条件与我军的战略传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命题。他指出，在现代化战争中，积极防御仍然要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¹²⁾同时又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¹³⁾，要注重研究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他强调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¹⁴⁾，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都要学会对付；无论陆海空战，都要重视争取制空权问题，“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¹⁵⁾。他还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和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认为“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¹⁶⁾，并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高度上，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当前，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海湾战争和其他几场带有高技术性质的局部战争看，这种战争越来越具有突然性、立体性、快速性、机动性和纵深性的特点。大量、密集地使用高技术打击兵器，可以不需要通过一系列战役战斗行动即能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使过去战争中的某些传统战法受到严重挑战。探讨对付高技术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课题。对未来高技术战争对策和战法的探讨，仍然要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指导，但在作战思想、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手段、作战指挥和作战保障等方面必须进行大胆

的创新。当前，全军正遵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认真分析高技术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里运用所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作战条件，创造符合未来战争需要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战理论。完全可以预料，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9页，第199页，第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6页，第490页，第491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8页。

(12)(13)(14)(15)(16)《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44页，第16页，第52、第53页，第49页，第46页，第114页，第57页，第46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360页。

毛泽东的国防观及其现实意义

方敏 杨放 王银泉 邱世昌

毛泽东的国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防问题的理论基础，紧密结合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防实际，运用我国军事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入侵和颠覆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体系。它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为依据，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指导，成功地制定和解决了国家的防务政策、国防力量建设、民防和国防设施、国防科技发展和国防教育等一系列有关国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国防观，产生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我国的国防实际和优秀华夏传统文化之中，有独特的国情与革命战争经验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的背景。毛泽东又是一位极富革命胆略和创造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独特的条件，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防观。研究毛泽东的国防观，无论是对于全面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或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均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一、充满辩证思维的国防观

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不同性质、不同处境国家里的国防实践，所形成的国防观是不尽相同的。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正视中国国情，洞察世界发展的大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示和阐发国防的真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观。

（一）毛泽东国防观既重视军事防卫，也重视全民防卫，强调军民的结合。建设强大的国防，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国防，国家安全就无从维护，而国家的安全须臾离不开军队，军队是国防的支柱，这是古今中外国防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对此，毛泽东是始终强调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有一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没有强大的军队，新中国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同时他还指出，国家的安全既要靠军队，还要靠人民。1956年毛泽东在概括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60年代初，毛泽东又深刻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他主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以民兵组织的形式，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为实现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定了一系列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原则。例如在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有保卫祖国的义务。1958年又号召全国“大办民兵师”。对民兵组织这种形式，毛泽东十分赞赏。他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教育、体育组织，这种形式很好，应当推广，各级党委要抓，特别是省委书记要亲自抓，对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还具体要求：小县一个营，中县二个营，大县一个团。在毛泽东的国防观里，既强调军队对国家安全的重大作用，也重视全民防卫的基础作用，这种立足于人民战争，强调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

思想，是毛泽东国防观的主要内容。

（二）毛泽东国防观既把国防看作一种军事行为，又把国防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强调军事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结合。由于毛泽东把国防的基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强调全民国防的战略思想，因此他认为，国防事业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动员起全社会各界参与国际活动，并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时，国防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国防才能真正巩固，国家安全才有最可靠的保障。毛泽东多次讲，国防事业是军队的事业，也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因此，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是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近代中国有国无防，屡遭外来入侵的悲惨历史，毛泽东提出，要在全民中树立国防意识，社会各界要充分认识国防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均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还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国防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把发展生产与增强国防力量统筹起来考虑，保证在企业、交通、民航、通讯领域中，积蓄国防力量；甚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亦要为战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武装力量组织上，毛泽东主张建立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平战结合的防卫体制。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国家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是党、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这就使上述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条文，从而更具有权威性。此后，我国的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其中关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依靠全国人民保卫国防，依靠社会各界建设国防的思想和原则始终未变。

（三）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国力的增强，又重视军力的提高，强调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富国与强兵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关注的战略性课题，处理得当与否，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的提高，均会产生重大影响。正确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也是毛泽东国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富国强兵”。在这二者关系上他认为先富国才能强兵，国富才能强兵，从而为国家安全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明确指出，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及时加强我国的国防，特别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强兵的基础在于国富，离开国富，强兵就是一句空话。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明确讲，要加强国防建设，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8月。毛泽东还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并指出，“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可见，毛泽东所讲的加强国防，前提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把国防的强大放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之上来考虑的。这种对富国强兵的辩证认识以及富国与强兵结合的思想，是构成毛泽东国防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四）毛泽东国防观强调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既重视国防的硬件建设，又重视国防的软件建设。国防的建设与巩固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先进的武器装备，足够的兵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规军、地方部队、民兵

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保证。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的硬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国防的物质力量确实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由于有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对维护我国的安全，慑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上仍很落后的大国而言，却能在世界舞台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防物质力量的总体提高，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安全有了这一点基本的物质力量，是否就意味着国家安全有了可靠的屏障呢？毛泽东认为，还远远不够。他指出，国防力量的真正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的能动作用及其凝聚力，在于自觉的组织纪律，在于军内外的紧密团结，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筑起精神的长城。他强调要加强全民族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提高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内，鉴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毛泽东一再提醒和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可能导致的突然事变。这种准备既要有物质上的，也要有精神上的，“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在军队建设上，他也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水平。他一再要求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如果只抓“国防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毛泽东历来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规律，认为只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力量。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在毛泽东国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依靠本国力量，还善于利用国际力量，强调内外结合的国家防务的安全效应。鉴于我国近代历史上受帝国主义列强随意摆布欺凌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提出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反对依附于某个大国，反对把提高国防力量的基点放在外部支援上。他坚定地认为，国防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应依靠本国的力量，本国实力地位的增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但是，毛泽东从来不反对、不排除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兴国安邦所不可缺少的。只有把国内国际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积极的和平外交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一切侵略扩张的政策和行径；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等等。尽管由于受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制约，在一段时期内，我国曾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做法，但这并未影响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采取积极、慎重的策略，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5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拉各国在保卫世界和平中作用的发挥，毛泽东认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方面更加注重同广大亚非拉各

国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发生分化，西欧、日本等各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趋发展，毛泽东洞察这一形势，提出要争取他们，团结更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思想发展到 60 年代，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70 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打破了原有两大阵营的思维定势，着眼于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综合考察，正确地揭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的国防战略确立新的原则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对保证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安全与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毛泽东国防观的成因

毛泽东国防观产生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国的国情，以及民族文化传统。

（一）国家面临的威胁和我国国防的实际，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客观基础。中国曾经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明大国、强国，五千年文明对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可是，到了近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政府的腐败，国防有名无实，帝国主义肆意入侵，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灾难史、血泪史、也是一部斗争史。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优秀的中华儿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长期遭受国际列强侮辱、侵略和欺负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的重新崛起。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时刻没有忘记阻挠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他们一直威胁着我国的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刚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竭力颠覆、封锁和包围，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到 50 年代后期，在实施硬的一手不能得逞之后，又采用软的一手，妄图“和平演变”、“不战而胜”。6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国际上反华浪潮一浪甚于一浪。60 年代中期后，国际上由于霸权主义的激烈争夺，世界局势严重恶化，中国周边也再次出现严峻、紧张的局面。70 年代初，美苏两霸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尽管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都想打“中国牌”，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得不使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保持警惕。毛泽东多次讲，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他针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局势，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加紧国防体系的布局和建设，要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

历史告诉人们，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明的古国，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曾经被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有着沉痛教训的大国，一个在现实中又面临帝国主义及其它扩张势力封锁和威胁尚处于弱势的穷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建设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强大国防，是历史赋予“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是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严峻现实带来的紧迫感，强化了毛泽东对建设

强大国防的决心。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国防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中国的国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要实现国防的现代化，既要考虑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到确保新中国安全的需要。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国情一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二是一穷二白，工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中国的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面对这种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新的国家建设刚起步的弱国、穷国，且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中的复杂情况，建设什么样的国防？怎样建设国防？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十分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矛盾中，以他坚定的革命胆略和超常的智慧，着力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思想。

新中国的国情是：在国民经济中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80%以上，经济十分落后，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又受人封锁的国家里，要建设现代化的御外安内的国防力量，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以他的雄才大略构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思路。

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确保国家的安全、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永远不受外敌的欺负，必须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当然在短期内要想建成一支能与世界列强相匹敌的军事力量，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上所述，把人民群众保卫国防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定能弥补军力的不足；在国防建设中动员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部门都行动起来，国防效益将明显增强；国防建设中物质保证是必要的，但振奋民族精神更为重要，精神力量的发扬也可弥补物质力量的差距；国防主要靠自身的力量，但要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争得有利于我的地位，在世界和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建立起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纵联横合的安全效应。总之，国家的安全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体，综合发挥各种因素的作用，就能产生综合的安全效应。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坚持综合防卫的战略不仅有可能，而且也是必须。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独具特色的国防观充分反映他避我之短、扬我所长、化被动为主动、灵活应变、综合防卫的国家安全防卫的思想。他独特的国防观思想确立了他在现代国防建设上的重要地位。难怪英国学者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不无赞叹地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没有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分析认识和谋划我国的国防问题，在国际上树起了泱泱大国——中国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敬佩和尊重。

（三）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形成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防观，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遗产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优秀思想成果，闪烁着璀璨的智慧光芒。毛泽东深谙民族传统文化真谛，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等著作，这对于他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帮助。如传统文化中“重民”、“君

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思想；“兴国安邦”、“围垦屯兵”、“以小制大”、“以弱胜强”、“后发制人”、“纵联横合”的韬略思想，等等，无不深受毛泽东推崇，并被其应用得挥洒自如，淋漓尽致。毛泽东充满辩证思维的国防观中，不难看出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

不能不提到的是毛泽东是一位性格坚强、意志坚定的人。向不合理的旧秩序挑战，是他人生主题之一。他从来不迷信、不听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奴颜媚骨。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他豪迈他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60年代初，针对内外重重压力，他响亮地号召：“中国人民要有骨气”，“有志气”！并说，“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他越要压，我越要顶。”“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铮铮铁骨和英勇胆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胆略和气概，当国家面临威胁之时，他果断决策，坚决予以反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安全。建国之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印边境反击”寸土不让；“援越抗法、抗美援朝”抑制侵略，安定周边；保卫珍宝岛、打击霸权主义……这一系列英勇壮举表现了毛泽东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在强暴面前不屈不挠的坚强决心，谱写了社会主义国防事业的一曲曲胜利凯歌。

三、毛泽东国防观的时代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的国防观，对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对我国构成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加强国防建设仍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兴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当前，我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但国际风云仍动荡不安，天下并不太平。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被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形势虽有所缓和，然而横行于世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至今仍很猖獗。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尤其不会容忍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将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干扰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威胁并未消失。同时，由于国际间南北差距的扩大，国家利益的冲突，民族乃至宗教矛盾的上升和激化，由此而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持续不断。我国周边环境近十年来虽有较大改善，但还存在着不少现实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虽不致影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如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对当今世界各种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正确地回答了如何认识新时期国防建设乃至整个国家建设外部条件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然而，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所讲的战争可以避免是指世界大战，至于一些偶然的、局部的的情况是难以预料的，因此要求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由此

可见，准确地判断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安全环境，是确立和筹划国家防务的主要依据。只有着眼于世界风云，认清威胁的性质和来自何方，才能使国防建设做到有的放矢，筹措得当。

（二）在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仍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就国防建设来说，首先是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这不仅因为经济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条件，国防建设不能超越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而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大局，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所以，经济建设这个关系全局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他要求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国富才有兵强。其次是求得协调发展。说“服从”，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要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快国防现代化。邓小平在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新时期的国防建设，正进入以现代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我们不可能企求普遍急剧地扩大国防实力，当然也不能在低水平上长期徘徊，而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战略需要，有重点地逐步提高国防现代化的水平。从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事实看，国防实力依然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关于增强综合国力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防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没有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坚实的国家综合国力，要想长久和稳固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

（三）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现代化，决定现代化国防的主导因素是现代高科技，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防仍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领域，高科技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谁在这方面落后，谁就要吃亏，就要挨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战争是高科技的战争，现代国防是高科技的国防。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国防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防投入的增加，但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国防力量的增强，都离不开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防科技在国家的整个科技领域从来就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许多新的科技成果是在军事领域应用后才转到民用领域，如今的科技成果不仅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的周期缩短，且出现了不同领域同时共享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使国防科技在提高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我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所取得的传统经验及产生的指导原则，仍应继续发扬光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仍然是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使我国“四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赋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新的内涵，要求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他为使我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适应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强调国防建设要以常备军为主体，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

常备军作为国防实力的主要标志，无论是遏制全面战争，还是打赢局部战争，其主体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但在和平时期，其规模又不宜过大，关键是要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跃上新的台阶。邓小平还着眼现代化国防的整体性，十分重视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使之成为常备军的后盾和助手。他要求“重视现代化条件下的民兵工作”，实行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体制，建立预备役部队，为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快出兵、出精兵奠定了基础。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0页，第271页，第385页，第357页。

转引自《解放军报》第1967年8月6日社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第651页。

论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

李鼎文

海军发展战略是策划和指导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方略。它从属并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规定了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是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依据。

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创了中国人民海军事业。他在以后的 26 年中，一直关心海军事业的发展，推动着海军建设的前进。毛泽东在指导海军创立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海军的作用、地位、性质、目标、任务、道路等完整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海军的运用与发展。其基本点是：为了巩固国防，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战略军种；它的基本使命是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抵御和慑止来自海上的侵略；这支海军是防御性的，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成。在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今天已经成为一支各兵种齐全、人员素质较好、组织体制较为合理的近海防御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与研究并创造性的运用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对于加强海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形成的背景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诞生、形成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中国这个特定的时期与国度绝非偶然。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在总结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海防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及 30 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着久远的历史背景。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它们凭借着大舰巨炮，从海上方向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驱直入，迫使清廷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略者们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从海上方向入侵我国。无数事实说明，海防的强盛与空虚，影响着国家的安危。而海军则是海防斗争的基本力量。因此，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就极力主张建立水师，加强海防，但由于清廷腐败而成泡影。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由于敌强我弱，海洋总是在敌人控制之下，为敌所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从海上运送部队在我国的沿海地区登陆，配合地面进攻，后又经由海道把我国资源劫运本土。解放战争前夕，美蒋军队通过海运向东北增兵，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战争后期，又通过海运撤退部队，踞守台湾。毛泽东在对历史沉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海防与海军的重要。解放战争后期与建国初期，他多次提到中国近代海防，用血与泪、仇与恨的史实教育干部、战士、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以免屈辱黑暗的历史重演。他以史为鉴，继承了前人的先进的海防思想，形成新的海防观，为其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产生于共和国诞生前夕，与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紧密相联，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1949 年 1 月，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胜利结束，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军面临着实施战略追击、向全国进军的任务。当时国民党军队为形势所迫，实行战略大撤退，倚仗海

空优势，退守台湾及沿海岛屿。企图以台湾为基地，以金马等岛为前哨，封锁航道，袭扰窜犯，伺机反攻。同时，新生的的人民共和国又面临着帝国主义来自海上方向的武装干涉的威胁。这说明，夺取全国胜利，必须跨越海洋；防止外来威胁，必须面向海洋。我军所面临的海洋战略形势正呼唤着一个能在海上执行作战任务和保障任务的军种的产生，因而也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导海军的创建，使之能担负起统一祖国，保卫海防，维护祖国海洋权益的神圣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实现了建立海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组建了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又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建设时期、我军由单一步兵向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党中央着力干建设陆、海、空诸军兵种齐全的合成军队，标志着我军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毛泽东一贯重视技术军兵种的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边打边建，逐步建立起炮兵、工兵、通信兵、装甲兵、航空兵等部队。由于海军的组建受制于海岸、港口的获得和装备的来源。至1949年初，鉴于组建海军的条件逐渐具备，同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一决定是创立人民海军事业的开端，表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已经关注到海上武装力量的筹划。海军是合成军队不可缺少的军种，有独特的活动空间和不可取代的功能，在新的建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从单一步兵发展到诸兵种合成的陆军，再从单一陆军发展到陆海空三军合成军队，是我军进入新的建设时期为了提高综合作战能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作为我军新的建设阶段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建设合成军队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人民海军建设事业。他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反映在他所起草的决议、批示、谈话、题词等活动中，也反映在海军建设实践活动中。其主要内容有：

1. 科学地确定海军的作用地位，规定海军的编制等级为战略军种

海军的作用地位是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中的首要问题。只有科学地确定海军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在军队编成中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军的使命、规模、能力、投入、建设速度、组织体制、指挥关系、兵力结构等重大问题。毛泽东抓住这个关键，首先予以解决。1949年10月他指出：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上述谈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海军作用地位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海上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需要海军的维护与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海上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海军的组建关系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危，是海上安全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认为，我军只有一个强大的陆军不是真正的强大，必须三军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他从国家军事战略的高度明确了海军的作用地位。

海军组建之初，急迫地需要回答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一个军种指挥机关、一个战略决策机构？还是一个兵种业务部门、总参谋

部的一个业务机构？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确定：“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使海军的编制体制与所担负的使命任务相适应，既可在海上方向配合陆、空军遂行战役战斗任务，也可独立地开辟海战场，与陆战场进行战略配合，或在海上独立地进行局部战争，完成战略任务。这对海军的发展不仅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海军发展目标

海军建设目标是海军建设的基本依据。正确地确定建设目标，可以指明奋斗方向，鼓舞斗志，是海军建设宏观控制的首要要素。

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目标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有先进的目标、长远的目标，以长远的目标激励几代人去为之奋斗。他多次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早在1949年8月28日，他在接见华东军区海军同志时就指出：新老海军要团结，互相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庄严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五次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可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毛泽东为海军制定的长远奋斗目标。所谓“强大”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指具有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保卫海防、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海洋的需要，是国际斗争形势的要求，是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航行至南京。航行中，他一再谆谆教导海军指战员说，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需要强大的海军；现在太平洋不太平，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目标的指导思想之二是，长远目标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毛泽东估计到，建设强大海军非一日之功，要经过长期奋斗方能达到。而长远目标，必须通过现实的、短期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地才能实现。长远和现实互相衔接，密不可分。长远目标指明未来，现实目标指导当前，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力的指导。

3. 在海军的功能上创立了威慑的概念

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人民军队的功能有三，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对不同时期、不同部队，可能有所侧重，但就总体来说，战斗功能是基本的，工作功能是普遍的，生产功能是重要的，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为海军规定了三条使命，即肃清海匪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统一全部国土；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这三条使命体现了海军在相当时期内的战斗功能。同时，海军还一直发挥着工作队、生产队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为海军规定了新的功能。1975年5月3日，他在接见海军主要负责同志时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从而开创了使用我国海军进行威慑的概念。

“使敌人怕”就是现代威慑思想在海军的运用。对我军来说，这种威慑是防御性的，就是使敌人不敢对我轻易发动战争，不敢轻易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海军威慑而达到预期目的方式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战略选择。

毛泽东运用海军进行威慑的思想是以海军的综合实力作基础。“使敌人怕”前提条件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海军建设，把海军搞好。没有坚强的实力，敌人无惧于我，要想威慑遏止敌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毛泽东运用海军进行威慑的思想与他一贯主张的建设强大海军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只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具有有效的威慑能力。海军要具有威慑的功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基础之上。

毛泽东高瞻远瞩，他致力加强海军建设，提高海军威慑能力的思想是根据海军作为战略军种的特点提出来的。海军具有高度的机动力、续航力、现代武器运载力和探测手段，拥有在海面、水下、空中和陆上战场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装备了战略核武器以后，海军的威慑能力和威慑效应，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为国家核威慑的主要支柱之一。

时至今日，威慑的思想对海军来说更加重要。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抓紧机遇发展经济，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不想打仗。为维护国家的利益，避免战争爆发，发挥军事威慑的作用乃是最理想的选择。这是毛泽东早在 20 年前就倡导的，今天我们仍应遵循这一正确的战略指导原则。

4. 在海军的性质上主张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一贯认为，我国的海军性质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卫海防、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而建设海军，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而建设海军。我国海军不谋求海外的军事基地，不在海外驻屯舰队，不搞如同霸权主义的全球型的进攻活动。这是基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没有侵略别国的意图。这一思想贯彻于海军建设的始终，规定着海军建设的目标、规模、兵力构成、活动范围、作战思想。

防御性的海军要有效地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必须具有现代作战能力和有效作战手段。人民海军是防御性海军与强大海军两者的统一体。“防御”表明海军的性质，“强大”表明海军的力量。为了赢得未来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胜利，在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加强海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建设，提高我国海军的作战能力，绝不影响我国海军的防御性质。

最近一个时期内，国外一些舆论大肆渲染中国海军的扩张和威胁。他们声称原苏联和美国的海军力量正在撤出南中国海，放弃使用菲律宾和越南的海军基地；中国海军正在扩充实力，要填补由于美、俄收缩撤离而出现的真空。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真实目的无非是企图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形象。事实上，中国从不牟取霸权，在处理海上争端中的态度人所共知。中国政府坚持主权的原则，为了维护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一再重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海军始终遵循毛泽东规定的防御性质建设海军。

5. 在建设海军的道路上强调依据国力，有计划地逐步发展

海军是一个技术密集的军种，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缩影。现代海军装备的建造周期长，经费投入大，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海军装备的使用管理、维护修理复杂，有赖于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掌握操纵。海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决定着海军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正是基于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出：“必须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

强大的海军”。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考虑到我国经济技术不发达，财政不富裕，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按照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中国海军建设应该走自己的路，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海军的方针、原则与步骤。

海军建设应该实行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方针。在科学确定海军的作用地位、长远目标、性质之后，首先应该从国际国内情况出发，从我军全局出发，规划海军的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规模、构成等问题，使海军建设纳入宏观正确的轨道。其次是处理好海军各兵种之间、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部队与机关院校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处理好各兵种内部各舰种、艇种、机种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均衡，使它们共居一体，协调发展，取得整体效益和综合作战能力。当然，均衡不是平均，均衡是以能否完成国家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为标准。均衡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不能照搬照抄外国，不能按照某一国家的均衡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海军。只能根据本国海军的战略任务以及各种条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均衡道路。

为了贯彻执行海军建设方针，还需制定一系列原则，以进一步支持方针的顺利运行。海军建设在实践中贯彻了下述原则：一是继承传统的原则。就是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我军的优良作风。二是量力而行、积极行动的原则。就是既要考虑海军建设的需要，也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把计划建筑在稳妥的基础上，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最佳结果。三是自力更生、适当引进的原则。武器装备的来源以自研、自造、自修为主，不断提高研制水平与能力，促进造船工业及其它配套工业的发展。为了解决急需，迅速提高战斗力，以及为了借鉴吸收外国的技术，可以适当引进。四是保障重点的原则。就是突出解决能够增强现代战斗能力的那部分兵力，在资金、技术、人力上给以倾斜。

海军建设既然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工程，就要有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达到的宏伟事业。实践证明，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海军，每一步的时间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大约以一代装备的全程发展时间为尺度。

6. 高度重视海军建设事业，把海军建设提到党和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矢志不移

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后，始终居于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日理万机。海军问题只不过是诸多国家大事中的一桩，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关心着海军建设，为海军建设运筹帷幄，呕心沥血。

毛泽东对海军事业坚定不移。他在题词和谈话中多次使用了“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的词。“一定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决心、毅力和希望，代表了中国人民在获得解放以后走向海洋的意志。核潜艇是当代高新技术的缩影，是舰艇推进动力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大国地位的象征。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三十年前决心建造核潜艇谈何容易。毛泽东以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毅力，庄严地宣告：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他的倡导和决心下，全国各省市、各部门通力合作，我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终于在1974年下水，实现了他的夙愿。最为难得的是，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仍关怀着海军建设事业，为海军的发展鞠躬尽瘁。1975年5月，他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听取了海军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在海军发展规划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一年后，他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一贯关心的海

军事事业，上述批示成了他对全党、全国、全军关于海军建设的最后嘱托。

由以上几个主要方面所构成的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密不可分，科学地揭示出人民海军发展应遵循的规律。只有全面地、透彻地理解它，才能增强贯彻的自觉性。

三、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与指导作用

1.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

从形成的大环境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观察问题站得比一般人更高，视野更广阔。建设海军问题，不仅是国内斗争的需要，也是国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一贯认为，当代影响世界事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存在。帝国主义者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全球到处插手，干涉别国事务，企图奴役与掠夺第三世界各国，消灭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从 50 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国的近邻打了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无情的战争事实向我们宣告：帝国主义国家是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帝国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反对帝国主义是时代的使命。帝国主义者拥有现代化的、强大的海军，以此控制海洋，投送兵力，实施军事干涉和侵略。正如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100 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我国没有海军将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极大困难。不仅百年耻辱不得昭雪，新的威胁也无力消除。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它反映了毛泽东把海军的建设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得何等紧密，思考是何等深远。而今，两极体制的国际战略格局已经结束，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帝国主义变本加厉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国来自海上方向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这一严酷事实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关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海军的论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从思想体系来说，具有扩展和延伸的特征。新组建的人民海军从开始就忠实地贯彻和落实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以毛泽东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作指导。海军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军政双首长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从而保证了把海军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的海上长城。不仅如此，在海军建设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经验和理论。在海上军事斗争中，海军也坚持了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一系列行之效的作战原则。针对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进行了新的实践。通过这一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对两个突出的重要的战略问题，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及时的回答：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海上安全问题应该摆在什么地位，采取什么对策；二是在我军处于新的建设时期，海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建设什么样的海军，怎样建设这支海军。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新领域。因此，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显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展和延伸。

从工作指导来看，具有很强的现实特征。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指

导海军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着重于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我军共性与海军个性的关系。人民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海军全体官兵的天职。然而海军有自己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和武器装备，必须将我军的共性与海军的个性统一起来。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所确定的海军组织体制、编制装备、后勤供应、工作方法，既充分反映了我军的共性，又反映了海军的特殊性。二是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海军建设的远期目标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但远期目标是逐步达成的，是近期建设目标不断升级的结果。近期目标正是为实现远期目标所确定的现实步骤。三是国家发展水平与海军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海军建设是一项耗资大、技术高、周期长、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状况、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外汇盈余。国家的强大是海军建设事业的后盾和物质基础，只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才能支撑建设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始终紧密联系这个现实。四是引进外国先进经验、技术装备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毛泽东一贯主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倡导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经验，反映在海军建设上也是如此。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缺乏建设海军的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同时，认真汲取了原苏联以及其他国家海军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我国造船工业基础薄弱，为了迅速形成战斗力，在 50 年代曾引进了一批海军装备，从而促进了海军的发展。

2.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也催动着新的海洋观、海防观的诞生。毛泽东以他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开创了新的海洋观和新的海防事业。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把海军事业视为关系到民族荣辱兴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海洋意识，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海防观念，突破了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的思想。他把海军建设与我军的历史使命甚至国家的根本职能联系起来，表明没有强大海军的军队不是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没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今天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海洋和海军与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更加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毛泽东关心海军建设的伟大思想和实践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代代吸取，永世铭记。

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把海军建设视为建立陆、海、空三军成合军队的大事，把我军的建设推向高级阶段，突破了单一陆军的思想。我军诞生于战争年代，边打边建。先从发展简单的步兵开始，以后随着斗争的需要和条件的改善，逐步建立起陆军诸兵种，形成了强大的陆军。全国胜利后，有了国家的统一政权，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建军任务。单一陆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求把建军事业推向高级阶段，建设陆、海、空齐全的合成军队。1949 年 3 月 24 日，他在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正是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将我军的建设目标从一个强大，发展到三个强大。使我军增添了一个执行着其他军种所不能替代的任务的新生军种，从而使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三军协调发展的总意图下，重视、合理安排海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又一份宝贵思想财富，他启示我们：“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强大国防的支柱之一，而今，海上仍是一个多事的方向，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突出，祖国统一，领土主权、海洋权益都面临新的挑战。在积极推进国防建设，实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事业中，海军必须继续得到应有的发展。

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为海军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海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40多年来，海军建设一直在毛泽东开创的航道上前进，贯彻了他所制定的建设目标、任务、步骤、方针、原则，使海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支诸兵种齐全配套、具有一定现代战斗能力的近海防御的轻型海上力量已经初步建设起来。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执行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肃清海匪骚扰，打击入侵之敌任务，以及护航护渔、侦察巡逻、科学实验、海洋考察、抢险救灾、支援邻国等任务。使我国的国防事业有海有防，并为以后的海军建设事业创造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在指导全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关心海军建设，在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艰难时期，他对海军发展建设工作，作了数次重要指示，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海军建设的总方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邓小平重申了建设强大海军的思想，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要求。1979年8月2日，邓小平为海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一题词继承了毛泽东建设强大海军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强大，他曾几次作过解释。所谓强大就是要有现代战斗能力，要顶用，要精。也就是人员要精干，装备要精良，要真正现代化的东西。组织编制要合理科学。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他的一系列指示，继往开来，把毛泽东关于建立强大海军的思想加以深化。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他在几次谈话中都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20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因为即使在我国实现了现代化，物质基础相当雄厚，国力有了根本的提高，发展海军的条件根本改观，防御的性质也不会改变。邓小平关于防御性海军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强调得更加突出。

邓小平还多次指示海军：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的海军是近海作战。这一海军作战范围的划定适应了目前我国面临的态势，适合我国海军的现状和海防的需要。近海海域掩护着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工农业集中的黄金海岸，也掩护着港口、基地和岛屿的安全。近海是我国近岸航线的集中区，也是远洋航线的起止点。近海海域分布着我国的管辖海域。近海是我国国土防御的前哨，对保卫大陆安全、保卫海洋权益有重要战略意义。

五、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

毛泽东为海军建设制定了系统的指导思想，是海军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44年来，海军党委和海军首长在建设海军的实践活动中贯彻落实这些指

示。以后并贯彻落实邓小平对海军的指示，使新时期的海军建设不断前进。

在海军初建的艰难年代，建设工作白手起家，艰苦创业。1950年8月，海军召开了建设史上第一个重要的会议——建军会议。会议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方针，这就是：“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这个方针以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为远景目标，以国家的财政、科技、工业现状为现实依据，以海军的现状为起点，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海军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规模不断发展，结构日趋合理，装备逐步完善，人才大量涌现。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的转变以后，海军党委对邓小平的新时期建军思想、特别是“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思想在海军建设上和作战指导上全力予以贯彻落实。在海军建设目标上提出：到本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建设一支精干顶用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即达到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的要求。与些同时提出了海军建设方针是：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地发展。在作战指导上、教育训练上、编制体制上，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的军队建设思想，使海军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军的建设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导。当前，人民海军已经进入加强质量建设的重要时期，海军广大指战员决心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加强对海上方向安全环境的研究，把握海军建设方向，搞好海军的全面建设，沿着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注释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0页。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第38页，第709页，第41页。

《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1页。

论毛泽东创建中国特色空军的理论和实践

杨振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深谋远虑，精心运筹，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制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空军的孕育、创建和成长壮大起了决定性作用。组建刚刚一年的人民空军，就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手并取得伟大胜利；在长期的国土防空作战中，不仅战绩辉煌，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而且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空军在改革中不断前进。今天，人民空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一定现代化程度、多兵种合成的坚强空中力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邓小平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人民空军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认真学习和实践这些理论是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人民空军的根本保证。

一、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需要出发，作出了“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的战略决策

根据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确立军事发展战略，制定我军建设的方针、原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人民空军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一特色的生动体现。

1. 高度重视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建立人民空军的极端重要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飞机广泛用于军事斗争，使战争由陆上、海上扩展到空中。战争由平面转向立体的大变革，引起了作战样式、军事思想的深刻变化，而作战样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军队组成的变化，由于空中力量具有机动速度快、打击距离远、杀伤面积大、破坏能力强和能有效地进行信息斗争等主要特性，在战斗、战役和战略上都显示了重要作用，对战争进程与结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军事强国无不把建立一支空军作为军事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毛泽东对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极大的关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尽管我军在不拥有飞机，不具备以空中力量与敌人争夺制空权的条件下，创造了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飞机加大炮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些经验并不否定空军的作用。由于没有空军的配合，我军在作战中遇到许多困难，遭到严重损失。如果在英勇的陆军基础上再加上空军，那么敌人必将遭到更大的歼灭和更快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指导我军实行积极的防空方针，击破来自敌人空中进攻的同时，根据空军建设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把培养航空人才作为建立人民空军的起点，抓住一切时机和可以利用的条件，千方百计地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创建人民空军进行艰苦的准备，表现了一个战略家非凡的远见卓识。早在 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就多次选调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航校和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抗日战争时期，又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选调一批红军干部到新疆航空队学习，并在延安成立第 18 集团军工程学校和航空组，专门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充分利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外有利形势，决定在东北建立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为航校选派领导干部。在短短的 3 年零 9 个月里，航校在训练和生活条件十分

艰苦的情况下，培养了 100 多名飞行人员、400 多名航空技术干部和各类管理干部。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军的任务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立即提出了建立人民空军的任务。1949 年 1 月，在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提出，1949 年及 1950 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不久，毛泽东又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海、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勇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突出强调了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阐明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对于加速革命战争胜利进程，防止和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国防和保卫人民胜利成果的极端重要性，为空军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把握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集中力量实现快速创建人民空军的战略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美国不甘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实现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为此，美国在军事上建立了从日本、台湾、菲律宾到巴基斯坦的半月形军事包围圈，把颠覆中国作为它整个侵略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称霸，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成为新中国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我军面临着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艰巨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尽快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自卫作战能力，已成为迫切任务。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根据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客观实际和战争的需要，作出了快速创造人民空军的战略决策。1949 年 7 月，毛泽东、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要加速空军的建立，为掩护渡海、夺取台湾作准备。并指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首要任务，准备一年左右可用于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过问和解决空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49 年到 1953 年，毛泽东批阅空军请示报告达 124 件；在国家百事待举，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为空军购买飞机、修建机场。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内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把握，根据客观需要与可能，精心运筹，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才使空军得以迅速建立起来，实现了用一年左右时间用于作战的目标，成为一支能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空军相抗衡的为世人所瞩目的空中力量，在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祖国领空安全和解放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立足我国国情、军情，确立了走中国式建设空军道路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不仅明确了建设空军的目标和任务，而且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军情，对怎样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原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空军指明了方向。

1. 确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

在提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任务之后，怎样建设空军，或者说在什么基础上建设空军，是强调空军的特殊性另起炉灶，还是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

鲜明地提出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这是走中国式建设空军道路最具特色的体现，为人民空军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政治、组织和思想作风保证。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不怕任何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高度自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所有这些体现人民军队性质的建军基本思想和原则，也就是人民空军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在这里，任何强调空军特殊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为贯彻这些建军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人民解放军陆军建立和健全了包括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组织工作制度、政治教育制度，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实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开展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这是我军的真正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以陆军的这些制度、方法、经验为基础建设具有空军特点的政治工作，就能使人民空军的建设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空军部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人民解放军陆军，具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工作锻炼的组织机构，有大批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以陆军建制部队为基础，不仅能使空军部队从组建开始就具备正常运转的领导机构，拥有一支能团结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一道前进的骨干队伍，而且从陆军来的大批指战员，带来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来了经过实战检验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经验；这些都是形成人民空军的思想作风和空战战术的良好基础。总之，只要把陆军的机构和人员、传统和经验，结合空军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加以正确运用，就能很快把人民空军建设起来，并形成战斗力。

人民解放军空军就是在陆军上述政治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军委决定以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机构为基础建立空军领导机关，从陆军调来一批军、师、团建制单位组建第一批空军部队，选调了大批有作战和工作经验的干部担负空军各级领导工作，空军建设很快初具规模，刚刚组建一年的人民空军，就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在技术战术和装备数量等方面都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人民空军能给予美空军以沉重打击，关键就在于我空军指战员大都来自陆军，指挥员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飞行人员具有根高的政治觉悟、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空地勤人员团结一致，密切协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战术技术和装备的不足。

2. 指明了空军要走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道路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空军初建，就面临着紧迫的战斗任务，除国土防空作战任务外，还有支援进军西藏，配合陆、海军解放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和配合陆军部队剿匪等作战任务，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作战提到重要日程。在这种情况下，是等建好了

再参战，还是边建设边参战，通过实战锻炼部队？毛泽东以非凡的胆略，毅然作出组织志愿军空军迅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决策，为人民空军选择了战斗力迅速成长的最佳途径。他反复强调实战锻炼对空军建设的重大意义，提出人民空军应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并多次指出：“要争取时间锻炼部队”、“应设法使更多的部队参加实战锻炼”，“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那怕求得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要“多多培养有一定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和保存战斗英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空军领导机关迅速组织部队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有10个歼击师和2个轰炸师经受了实战锻炼，还组织大批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到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见学。事实说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对年轻的人民空军来说，即是严峻的考验也是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极好机遇。通过实战锻炼，空军部队实现了由不会空战到学会空战，由打几架飞机的小仗到打上百架飞机的大仗，由1个机种作战发展到多机种协同作战，由只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到能在昼间较为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转变，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425架的辉煌战果，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年轻的人民空军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问题。

国土防空作战是人民空军主要而经常的任务。这种作战虽然规模较小，但牵动着国家防空体系的全局，作战的胜败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安全和主权尊严，并且政治上的影响比军事上的影响更为深远。有鉴于此，毛泽东把平时时期的对空防御提到战略高度认识，作出了空、防合并，加强防空的决策，提出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这一决策，克服了原来空军和防空军两个军种任务相近，而机构重叠，指挥不便的弊病，对于统一防空作战指挥，增强整体防空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空军在毛泽东提出的边作战、边建设的方针指引下，逐步完善了防空体系，同来自空中的敌人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反侦察、反袭扰，在大陆纵深打击夜间低空窜扰的敌机，以及打敌高空侦察机和入侵美机的作战中，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坚持常备不懈，保持良好的战略状态，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现敌机入侵即能做出快速反应。地空导弹部队以“海底捞针”的精神，机动设伏，不仅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而且连续击落了美国入侵我国领空的5架U—2高空侦察机。人民空军以令世人震惊的战果，弘扬了国威、军威，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人民空军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战斗力不断提高。

3. 提出了积极稳妥地使用空军的作战方针和在实践中形成、发展人民空军作战理论的思想

人民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成员具有丰富的陆军作战经验，但空军所担负的任务、所处的战斗环境毕竟与陆军不同。应该采取什么作战方针，如何使用兵力等等，对于人民空军指战员来说都是全新课题。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敌我空中力量的对比和空中作战的特点，提出了积极稳妥地使用空军的方针。志愿军空军参战前夕，空军领导同志根据毛泽东关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一贯思想，提出不应过早地零星地使用兵力，而应积蓄力量，达到一定数量时，选择适当时机，集中力量，机动地给敌人以最大杀伤的兵力使用设想。毛泽东对此立即予以充分肯定，指出“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他还明确

指示志愿军空军要避免与敌人进行拼消耗的空战，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志愿军空军形成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正确作战方针。

毛泽东历来强调，学习前人总结的军事理论，一定要“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对于年轻的人民空军来说，学习别国空军的军事理论，特别是学习我陆军的作战理论和战术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空军的任务之一就是与陆军密切协同，配合陆军共同取得作战的胜利。但是，这种学习，一定要立足于空军实际，与空军的作战特点结合起来，并通过实战的检验，形成自己的作战理论和战役战术原则。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创造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就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把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等原则成功地运用于空战的范例，它标志着人民空军空战战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对人民空军战役战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人民空军同敌机在各种气象、高空低空、快速慢速，以及有电子干扰等情况下进行斗争，在实战中又总结出了常备不懈，积极作战；统一指挥，分区负责；精兵对敌、快速反应和机动设伏等一套特定条件下防空作战的原则、方法。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有选择地借鉴别国空军作战理论，逐步提出了把夺取制空权作为空军的首要任务；在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中，坚持以合同作战的胜利为胜利，重点用于纵深作战；在防御作战中，坚持“整体抗击、积极反击、严密防护”；以及强调集中使用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等主要作战使用思想，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空军战役战术理论。

4. 确立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空军武器装备的原则

航空、防空武器装备是空军建设的物质基础，航空工业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空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关系空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对空军武器装备建设非常重视。建国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足于国内研制和生产，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同时，也不排斥争取外国的帮助和支援。周恩来也指出，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国制造飞机是50年代从仿制起步的。先生产教练机，尔后生产歼击机、轰炸机。1954年我国仿制苏联教练机成功，毛泽东立即致电祝贺，指出“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历史证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60年代初，我们顶住了当时苏联的巨大压力，从1962年开始，陆续研制生产了各型教练机、强击机、歼击机、轰炸机和防空武器装备空军部队，从而结束了空军武器装备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掌握了发展人民空军的主动权。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性能比较先进的多种型别的飞机和防空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尽管现在空军的武器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我们毕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支可观的航空技术队伍，能够不断地研制新型装备和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邓小平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人民空军现代化

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始人之一，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作出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邓小平对于空军的建设和改革十分关注，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期空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1. 根据现代战争规律，把重点建设空军作为新时期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今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一大批新科技成果运用于军事领域特别是航空、航天领域，使现代战争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战场空间空前扩大，其分布从太空、高空、中低空、超低空、地（海）面直到地（海）下。现代空中力量往往由发动战争的一方首先使用，进行独立、大规模、长时间的战略空袭作战。因此，防空作战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更加重要、更加激烈。空中力量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标志着空军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近几年来，某些军事强国采取空袭手段频频得手。显然，未来敌方对我国很可能首先进行空中的突然袭击，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威胁。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我国的安全环境，邓小平特别强调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加强空军建设作为重点。他深刻地指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的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为了夺取制空权，他明确提出：“今后重点放在发展空军”，“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¹¹⁾邓小平关于重点建设空军、夺取制空权的思想，高屋建瓴，揭示了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规律，突出了空军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指明了空军建设的目标和衡量战斗力的标准，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期空军建设和根本指导方针。

2. 注重质量建设，造就有中国特色的空中精兵。邓小平多次强调，精简军队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并明确提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的方针。邓小平特别指出，军兵种也要“消肿”，要通过编制体制改革来解决“肿”的问题。他十分重视空军的质量建设。对于空军应建立什么样的体制问题，他指出，在考虑空军的体制时，要以是否有利于空军建设为原则，怎么有利怎么干。对武器装备的质量问题，他指出：武器装备的质量如何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要坚持质量第一，特别是空军的东西。这些重要指示，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为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指引了方向。

3.坚持系统配套的原则，大力提高空军武器装备的整体作战效能。邓小平从我军实际和现代战争对我军的要求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告诫我们：“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¹²⁾现代化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多次指出，要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既要有近期要求，也要有长远目标。邓小平对改善空军的武器装备尤为重视，他说：“装备也有个轻重缓急。搞什么，在我脑子里，恐怕还是空军。”⁽¹³⁾邓小平不仅强调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改善武器装备，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他指出，要立足自己搞科学研究；科研要走在前面，我们能够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要提出对飞机的战略要求，研究和生产要服从这个战略要求。同时指出，要承认自己的技术水平不够，应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新起点；发展武器装备，包括自己研制和引进，都要配套、搞全、顶用。这些重要指示，为空军改善和发展武器装备，逐步实现软硬件并重、高低档搭配、作战武器与保障装备配套、主战飞机与配套系统同步发展的目标，指明了正确道路。

4.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注重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在现代化战争中，人仍然是最活跃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物质基础，提高军人素质是实现人和武器结合的智能要素和精神动力。邓小平针对我军人数虽然多但是军事和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差的状况，反复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从教育训练着手，全面提高官兵的军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提高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要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空军是一个技术密集、装备复杂的军种，搞好教育训练尤为重要。为此，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飞行人员、指挥人员素质下降的情况。指示空军要增加训练时间，使飞行人员、指挥人员的素质与武器装备同步发展，成为一支空中精兵。

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十多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建设和改革，空军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教育训练、作风纪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理顺了编制体制，院校建设走上正规，教育训练质量明显提高，新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引进、消化进展顺利，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有所提高，并重点建设了一支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拳头力量，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显著增强。勿庸讳言，目前人民空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任重道远。但是可以确信，我们有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有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一定能够把人民空军建设成为一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精兵，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注释

⁽¹¹⁾转引自《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6页，第48页，第206页，第129页，第304页，第55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693页。

转引自《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9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00 页。

(12)(13)《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83 页，第 89 页，第 89—90 页，第 151 页。

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关于毛泽东国防科技工业思想的探讨

怀国模 石世印

早在 1950 年 9 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国防科技工业，多次听取军工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的汇报，直接到军工企事业单位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会议对发展规划、战略布局、长远目标和重点等，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并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毛泽东是我国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伟大奠基人，他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理论、决策和指示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国防科技工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防科技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力可能的基础上加速发展

加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首先要认清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摆正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奠定了指导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巩固国防、防止外敌侵略的迫切需要

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有着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也留下屡遭外敌入侵和欺辱的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必须准备可能的突然事件；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显然，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

毛泽东、党中央一直把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援建的 156 个大型骨干项目中，航空、兵器、电子、造船等国防工业项目就占 41 个；“二五”计划期间，国家相继安排大型国防工业建设项目 44 个；“三五”计划期间，在辽阔的三线地区建立了一大批国防科研、生产基地。这些项目，在国内具有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力量。随着国防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不仅能独立自主地研制生产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加快了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的发展。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把加强国防建设，研究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看作关系国家安危和国际地位的大事。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化。还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发展军事工业，但受当时条件所限，根据地的军事工业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我军武器装备主要靠取之于敌。1953年1月，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明确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显然，我军要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武器装备由主要取之于敌向自行研制生产转变，唯一出路在于建立现代化的国防科技工业。

为了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毛泽东对国防科研、生产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关怀，并及时提出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40年来，我们不仅研制生产了大量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在研制发展战略核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保证了我军由单一陆军发展为包括空军、海军、第二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的需要。现在，常规武器已从仿制为主发展到自行研制为主，战略武器正进一步改进提高，高技术研究工作逐步展开，技术基础不断加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自50年代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许多深刻论述。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些重要论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经济资源的实际可能为基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资金不足，既要加强国防，又要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长期以来，研制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经费短缺，这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超越国力的可能，对国防工业投入过多，就会影响基础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的建设，最终必然制约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一再指示，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这也说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同国力相适应，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

办事，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四）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同年4月，他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又强调，要学习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生产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生产的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较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的思想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的思想，从方向、道路和体制的高度，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16字方针。十几年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面贯彻军民结合16字方针，在优先保证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发展民品生产，扩大军工技术转民用，民品产值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92年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70%，已经并正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实行军民结合，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1984年11月，邓小平曾肯定地说：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1991年初，他在上海视察时又强调指出：“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由此可见，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军民结合思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走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争夺技术优势的竞争空前激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兵之道。在当今世界上，谁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谁就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军事上被动挨打，甚至成为强权政治的附庸。

毛泽东高瞻远瞩，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同时谋划着我国的对策和部署。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还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在1963年曾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并且必须打好；不打科学技术这一仗，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还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决策和理论阐述，为我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和我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变革作用，把加强科研放在首位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进而引发军事的重大变革。毛泽东历来极为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1952年，他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¹¹⁾次年，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¹²⁾1956年，他在谈到国防建设时指出：“现在装备，是很大的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力量了。但从现代化水准上要求，拿最新的原子、电子水准来要求，那还是很差的，还需要把国防力量大大加强。”⁽¹³⁾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面貌，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在于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科研是生产的先导，国防科技工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加强科研，先后建立了一大批科研院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科研体系。这些科研单位，无论在预先研究和高技术跟踪方面，还是在武器装备型号研制和技术基础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为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或改进现有武器装备，增加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储备，成为促进武器装备变革的强大动力。

（二）以发展尖端技术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作为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国防科技战略，才更有利于赢得时间和速度，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直接进入前沿呢？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党中央果断地决定，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当时，所谓尖端技术，主要是指原子弹、导弹技术。确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这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为使我国尽快拥有核反击力量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同时也是洞察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为带动和促进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为了加快尖端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强调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重点突破，由全局劣势变为局部优势。由于力量集中，措施有力，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事实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今年10月，用自己研制的多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各类型卫星（包括外星）40颗，其中返回式卫星15颗。现在，“两弹一星”已成为我国尖端技术成就的象征，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能力，也是我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各个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和新的飞跃，产生并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高技术群，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高科技的较量。为此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把保持和争夺技术优势看成比直接使用武力更有效的威慑力量，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威慑手段和军事潜力。面对世界高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1988年10月，邓小平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¹⁴⁾为了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高科技意识，更加自觉地把研制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作为重点，这不仅是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要对策，而且是力争掌握战略主动的关键措施。

（三）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抓住机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军武器装备必须立足国内研制和生产。即使在50年代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也一再指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因为我们始终把依靠自己的力量作为基点，60年代初，在苏联毁约停援、搞突然袭击时，才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变，灵活处置，及时调整部署，迅速攻克难关，在“两弹一星”方面取得突破。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些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冷战的结束不可能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垄断和把持高新技术的实质，这已成为他们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手段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还是80年代末美国对我实行制裁，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会转让给我们的，只能靠自己去攻关，去拼搏，去创造。这样，才能经得起国际风浪的冲击，防止受制于人，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自力更生，决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¹⁵⁾他还形象地说过：要“先写正楷，后写草书”。事实证明，50年代，我国抓住中苏友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智力，对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对外开放已成为基本国策，我们更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四）坚持全国“一盘棋”搞好大力协同

1962年10月，罗瑞卿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那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必须得到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几十年来，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不仅是核武器研制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已成为整个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反映了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特点和要求，同时也是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生产中的应用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武器装备既是现代科技、工业的产物，又是现代科技、工业的缩影，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以卫星通信工程为例，它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网和通信地面站等五大系统，每个大系统包括若干分系统，每个分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

由众多的仪器、部件、零件组成。再如，核潜艇的研制，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几千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如此庞大的工程，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群策群力，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各个环节协调发展，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0年代，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都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正是由于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才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使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障，大批原料、材料及配套产品立足国内，众多的科技难关得以攻克。可以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伟大变革中，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一方面要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功能，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一定要进一步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增强全局观念，发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依靠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争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

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力量非常薄弱，国防科技人才更为缺乏。毛泽东十分重视科技人才，认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他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¹⁶⁾1956年1月，他又强调说；要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¹⁷⁾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多次邀请科学家讲授有关科技发展的知识，亲自与科技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了解他们生活学习的情况。总的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贯思想。

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比如：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等等。由于国防尖端技术保密性强，许多专家和科技人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离开大中城市，离开亲属朋友，奔赴戈壁荒原，深山峡谷，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赞扬。去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¹⁸⁾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老一代科学家的无比尊重和对他们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极大关心和鼓舞。

当今世界经济以至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核心是人才竞争。在人才竞争中、国防科技人才的竞争最为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普遍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国防科技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

何吸引、保留和造就关键技术人才、人才资源是未来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中最宝贵的资源。面对人才竞争的大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重大问题由党和国家高层决策

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定它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这样才能根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家经济、科学条件的实际可能，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当断则断，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和部署。

（一）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机构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适时地加以调整和加强。早在 1950 年 10 月，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1951 年 4 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先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以罗瑞卿为主任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962 年 12 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更大的成果，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后改称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自成立到 1974 年 4 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 60 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混乱，领导多头、管理分散、机构重迭现象非常突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改革，加强了对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发展方向、重大项目和军民结合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践证明，要实现党和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建立具有高度权威和效能的领导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做到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保证和鲜明特征。

（二）在重大决策上必须提高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立足比较落后的经济、科技基础，要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作出决策，既需要极大的勇气，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气魄与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对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随着这些决策的胜利实现及其巨大影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是极其英明的。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积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的决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1953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中央随即指示地质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铀矿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有关情况，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决定。当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¹⁹⁾再如，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策也是根据专家的建议作出的。1956年2月，从美国归来仅4个月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了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建议。随后，中央军委组织有关专家对发展航空火箭技术和制造导弹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同年5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以上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决策，是科学化、民主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现在，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现代武器装备不仅日趋高技术化，而且耗资成倍增加，加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凡事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目标、重点的重大决策，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要立足国力的可能；既要注重我军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科研、生产的需求牵引，又要注重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推动，只有经过战略、战术、经济、技术的全面论证和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有效执行。如果单凭老经验、想当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决策，甚至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失误，在决策中要注重严格决策程序，完善决策制度，注意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尤其要十分注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说：“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²⁰⁾最近，江泽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基本信念应该是相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要以这个作为决策的哲学基础和科学基础。这说明，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遵循科学规律的重大原则问题。

（三）在宏观调控上必须有统一规划和明确的战略目标

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主要是为了搞好宏观调控，而调控的方式、手段除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外，最重要的就是统一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1953年1月，当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落后面貌的目标，还就企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及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和制造，规定了明确目标。1956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国防急需专业的技术

作为国家重点，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事实证明，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有利于保证国防科技工业稳定协调、高速高效地发展，也有利于激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围绕共同目标团结奋进。而且，目标一经确定，即使发生暂时困难和挫折，也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就以原子弹研制来说，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1961年10月，又决定争取用3年时间爆炸原子弹。为了实现预定目标，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一定要抓紧进行，不能放松。1962年12月，中央专委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了两年规划；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胜利实现了原定目标。

几十年来，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管理的重要经验。事实证明，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更需要加强计划性。世界各国对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也都是由国家高层决策，实行统一规划和严格调控的。1988年10月，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²¹⁾，1992年初，他在南巡中谈到科学技术发展时说：“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²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开拓奋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实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上新台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作者单位：国防科工委）

注释

⁽¹⁵⁾《毛泽东选集》第5卷，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

第1版，第31页，第271页，第144页，第285、第286页。

⁽¹⁴⁾⁽¹⁸⁾⁽²¹⁾⁽²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第99页，第367页，第279页，第378页，第279页，第378页。

⁽¹⁹⁾《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页，第27页。

⁽¹¹⁾⁽¹²⁾⁽¹⁶⁾⁽¹⁷⁾《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61页，第358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¹³⁾引自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²⁰⁾《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97页。

伟大的创造科学的理论——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何理 岳忠强 王长存

毛泽东创立的、并在长期革命和建军实践中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永远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性质，是我军完成作战、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强大动力，是人民军队政治优势、革命本色和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反映人民军队本质和政治工作规律的科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军宗旨的思想；关于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方向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思想；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中心环节的思想；关于发扬三大民主，加强革命纪律的思想；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政治工作作风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要从中国革命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想，等等，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一代宗师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当前我军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所担负的任务，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证的主要内容。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 and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首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必须创立并拥有一支能够完全适应伟大革命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正是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应运而生、丰富发展的。

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根本性质，归根到底是关于它的阶级属性问题，即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切反动的旧式军队尽管服装不同，旗帜各异，具体的阶级归属和服务对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都隶属于剥削

阶级的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一派别，都是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我军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军队。这是毛泽东给人民军队本质作出的科学规定，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

（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在军阀分裂割据的旧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军多则权大。旧军阀统治的特点就是军事支配政治，武力控制政权。但人民军队不能走旧的军阀主义的老路。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战斗。因此，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同党闹独立性，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夺兵权。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因此，军队政治工作应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建立健全党委制、政治机关制、政治委员制和连队党支部制，并不断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努力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上，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之，全军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克服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与党和人民争夺兵权。从建军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必须反对和抛弃各种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单纯军事观点，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必须坚持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思想，规定红军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在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红军的斗争中，他进一步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著名论断。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在红军改编后曾一度出现的某些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的新军阀主义倾向，拒绝了国民党向我军派遣军事指挥人员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挫败了国民党妄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罪恶企图，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强调了坚持和健全党委制，反对党和军队内部存在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倾向。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指出，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允许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分裂军队，篡夺党权军权的阴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军发展的历史表明，坚持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二）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保证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我军的性质不但决定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取决于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军队的宗旨是关于这个军队是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在

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军队的服务方向，并通过对广大官兵进行新旧军队性质对比和政治教育，批评当时存在的那种“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雇佣观念，在官兵中树立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为工农阶级而作战的思想；要求军队同时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全面审视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指出，这个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根据这一思想确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教育全军官兵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我军的宗旨，真正做到一切言论行动都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人民子弟兵，我军战士从入伍的那一天起就接受为人民当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正确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观。通过这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教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能把自身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党的事业、军队的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为之英勇奋斗。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关系我军建设方向的重要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它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我军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之中，也体现在我军每个成员的一言一行上。我军官兵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高度政治觉悟；为人民革命事业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革命利益、人民安危为生命的自我牺牲、英勇献身精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自觉的群众纪律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军队政治工作认真地坚持和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使我军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一支举世无双、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人民子弟兵队伍。

（三）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保证了我军良好的内外关系

古往今来，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都是与军队及其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直接相联系的。毛泽东从揭示和批判旧军队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反动本质出发，把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的本质规定，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官兵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我军所有官兵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格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关心，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军队中官长压迫士兵，官兵严重对立以及当时我军内部存在的旧的军阀主义作风，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他明确规定军队内部严格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后来我军坚持实行的尊干爱兵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本着这个原

则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能形成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互相友爱的新型内部关系，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军民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对人民群众和政府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军队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无敌于天下。他明确提出，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即学会消灭敌人和唤起民众两套本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充分发挥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伟大作用，开展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组织和帮助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拥护政府、热爱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使我军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要军民团结一致，那就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瓦解敌军的原则，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依靠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本质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¹¹⁾。瓦解敌军工作的政治基础是我军所从事的战争之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战争之正义和自卫防御的性质，揭露敌方战争的反动性、侵略性，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明其必然失败的趋势，以动摇敌军官兵的信心和意志。大量事实表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多数敌军士兵，包括一些下级军官都是被反动统治者欺骗和强迫驱赶到战场上卖命的，因此，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和革命政治工作的感召下觉醒。即使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对来自异国的敌军士兵也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宽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政策，也是人民军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有力地揭露敌军的反动宣传，争取广大被蒙骗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阐明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是人民军队本质属性的规定，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保持其性质的三块主要基石。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性质的决定性保证，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全部工作的归宿。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乃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¹²⁾。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我军长期面对着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战胜敌人，完成我军肩负的伟

大历史使命的可靠保证，这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毛泽东以伟大哲人的眼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上各种形式战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揭示出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于人民军队及其所从事的革命战争之正义的、进步的性质，它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军内和军外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一切优势装备都无与伦比的强大战斗力。列宁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¹³⁾。世界战争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革命威力，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战胜的。政治工作作为党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它是党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把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中介和重要激发机制，是发挥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十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注重发挥先进思想对群众行动的先导作用和动力作用；注重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以此形成自己区别于其它各种军队的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的明显特点。

（一）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¹⁴⁾由战争性质而造成的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只有革命军队所进行的进步正义战争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因其脱离人民，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军所从事的人民革命战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目标，战争的胜负直接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拥护。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¹⁵⁾。“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¹⁶⁾因此，我军政治工作的头等重大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正是在广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敌强我弱，物资条件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个政治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¹⁷⁾。

（二）掌握思想教育，培养官兵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¹⁸⁾同样，思想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¹⁹⁾，军队中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

掌握思想教育，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毛泽东强调，“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²⁰⁾我军官兵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自觉的战士。党的纲领、路线是革命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全党全军的行动准则，没有对党的纲领、路线的正确理解，就没有正确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用党的纲领和政策统一全党全军的行动。他昭告全军

将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²¹⁾。

掌握思想教育，必须坚持对官兵进行革命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²²⁾。没有革命的政治精神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甚至是腐败的军队。但是这种革命精神不是自发、自然产生的，它要依靠革命的政治工作向广大官兵进行贯注。教育部队树立明确的革命目标，提高思想觉悟，激发广大官兵为人民而战的积极性。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战斗意志。教育部队自觉服从革命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树立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奉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教育部队苦练杀敌本领，提高官兵的练兵热情，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威力，实现武器与人的最佳结合。

（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以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集团，因此，必须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党的组织原则把全体官兵组织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与其它军队不同，我军官兵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者。所以，我军战斗力主要来自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全军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不是任何个人或其他宗派，而只能是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发挥党组织在部队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建军之初，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红四军中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²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注意常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并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军队建设和组织官兵完成各项任务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党组织必须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广大官兵了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掌握开展军事、政治斗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提高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二是党组织必须宣传和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组织广大官兵进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与演练，提高打赢人民战争的本领。三是党组织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决干部战士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协调关系，化解矛盾，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四是党组织必须大力做好作战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进行战场宣传鼓动、开展军事民主、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发扬我军群威群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决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并根据作战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组织，配备干部。

发挥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中骨干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²⁴⁾党组织必须认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旗帜鲜明地清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对于部工作的影响；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

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反对任人唯亲。同时要在作战、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骨干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指引下，我军政治工作紧紧抓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不放，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思想觉悟高，联系群众好，能征善战的各级军政后干部。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²⁵⁾。他们无论在强敌压境、艰难困苦的反围剿、反“扫荡”斗争中，还是在胜利进军的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是部队工作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模范行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官兵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和指挥威信，教育、团结和带领部队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和其他各项艰巨任务。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一个党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体系。如上所述，他不但提出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而且还形成了自己优良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²⁶⁾。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最根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我军的具体情况出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²⁷⁾。可以说，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和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基本的“实际”和最大的国情、军情。它一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无可比拟的先进的革命性质，同时也说明了，我军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将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它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不解决在部队中存在的这些十分错误的倾向，就不可能把这支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可能重蹈黄巢、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的覆辙，使革命归于失败。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部队，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保守意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错误的不良倾向。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各个时期具体任务的变化，确立正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经历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以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在这些斗争中，军队政治工作都能根据革命形势的重大转变和军队任务的发展变化，创造和确定自己新的具体工作方针、内容和方法。从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固定

模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²⁸⁾，就无法完成政治工作担负的艰巨任务。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广大官兵的思想实际出发，加强针对性，提高实际效果。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具体了解干部战士在想什么、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情绪、愿望、困难、问题，分清哪些是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哪些是消极的、甚至错误的东西。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发扬积极的、正确的思想，批评和克服消极的、错误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是具体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才能避免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毛病，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思想教育中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他曾形象地说，对敌人是打击、消灭，是用“霸道”；对同志、士兵、人民、朋友则要用“王道”。对思想方面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和压服的办法，只能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启发自觉，以逐步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观点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展开，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认为，政治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因而必须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在军队中首先是依靠、尊重广大的士兵群众，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创造精神。

军队政治工作要把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整个工作过程的起点和归宿，并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搞好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政治工作决不单是少数政治工作干部的事，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去做。可以说，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所以，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不能只有领导和少数骨干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充分发挥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但又不能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犯强迫命令的错误；也不能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放弃正确的思想原则，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在工作指导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普遍号召与广泛动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更要对所属部队加强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号召，“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²⁹⁾。军队政治工作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把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对各个时期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情况，官兵的思想状况等方面进行周密的具体的调查研究。领导者必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放下架子，虚心向战士学习，向下级学习。这种认真的而不是表面的，实在的而不虚假的调查研究，即是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³⁰⁾。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三）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发展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适应了人民军队的创建而创立，并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完善发展，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我军创建初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的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适应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从事军事运动和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首先和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建设军队的伟大思想，并于1929年12月主持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建军两年多来我军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军队与人民军队的界限，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建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也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我军政治工作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也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194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的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则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更加系统地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方向任务和工作方法；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孤立主义等不良作风；提出了必须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变更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恢复了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并在总结一些部队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全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新式整军和在军队内部普遍开展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是我军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创造，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战斗热情，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毛泽东根据我军所担负的任务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与这种新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必须统一政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和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政治工作的条例、法规，加强探讨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的政治工作等。不容否认，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也曾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本质的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我军建设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却是青春永驻，永远不会过时的。

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全面发展，是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党我军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的主持和倡导下，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同样，我军也进入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研究和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探讨现代战争中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已经成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据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³¹⁾。在新形

势下，我们仍然必须继承和坚持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但是，现在“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³²⁾。因此，政治工作没有新的内容不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遵循这一基本思路，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思想工作这一重大课题，把毛泽东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坚持和继承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优良传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78年邓小平在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³³⁾。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³⁴⁾。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我军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在他的指导下，科学地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正确地确立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既否定了林彪、“四人帮”“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的谬论，也纠正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忽视和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他特别指出，军队政治工作要加强，要从战士入伍的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强调一定要把军队教育好，使军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抓好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³⁵⁾。从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一手抓革命精神教育，一手抓群众的实际利益，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思想。

(二) 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自60年代以来，我军政治工作曾一度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其主要表现是理论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谬种流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时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因而，我军政治工作必须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否则，我们就只能说空话，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他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决不当“收发室”。他严厉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现象。他说：“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³⁶⁾。“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³⁷⁾。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³⁸⁾。邓小平的以上论述，无疑对转变和改善政

治工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发扬老红军的革命传统，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将受到多种复杂的政治环境的考验。能否使我军在政治上合格，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这是邓小平给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重要任务。1989年在接见参加首都戒严部队领导干部时，他高兴地说：军队经过这次风波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³⁹⁾。同年10月，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时又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⁴⁰⁾。

“政治合格”从根本上说，就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能改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我国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不同。我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理所当然地也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党领导军队非但不会改变军队的国家政权属性，恰恰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同时对于军队自身来说，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就必须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自觉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部队高度的团结一致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必须坚决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小集团、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如果一旦脱离了党的领导，背离了红军的革命传统，人民军队的性质就必然会改变。

（四）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服务，保证提高部队战斗力

邓小平认为，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装备的真正现代化，只有国家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军队政治工作既要保证国防建设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又要保证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为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在当前国家不可能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国防建设的情况下，要教育部队正确对待国家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积极参加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自觉地服从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保卫者、建设者。

同时，军队政治工作还必须保证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提高我军战斗力。邓小平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的地位上来，加强合成训练和军队的质量建设，不断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切实保证军队现代化的实现。要通过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官兵政治觉悟，造就“四有”革命军人；调动官兵练兵习武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训练水平和作战本领；发动和组织部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科技文化知识，全面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技术装备虽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认为什么都是技术决定的，“不要完全迷信这个”⁽⁴¹⁾。

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还是要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用劣势装备打败装备优势的敌人。“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⁴²⁾。因此，军队政治工作还要积极研究和探讨未来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代表了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提高我军战斗力，以及适应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等问题。他提出和倡导的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关于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关于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关于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理服人，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关于军队要整顿，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行动等，都是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丰富。但就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言，两者则是完全一致，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光辉永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注释

《列宁选集》第3卷，第669页。

⁽¹¹⁾⁽¹⁴⁾⁽¹⁵⁾⁽¹⁷⁾⁽²²⁾⁽²⁴⁾⁽²⁷⁾《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3页，第547页，第379页，第469页，第509页，第480页，第511页，第526页，第609页。

⁽¹⁸⁾⁽²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4页，第1039页，第1094页，第791页。

⁽¹⁶⁾⁽²³⁾⁽²⁵⁾⁽³⁰⁾《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第88页，第87页，第65页，第65页，第136页，第88页，第277页，第110页。

⁽¹²⁾⁽¹⁹⁾⁽²⁶⁾⁽²⁸⁾《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8月第1版，第54页，第41页，第64页，第63—64页。

⁽¹³⁾《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17页。

⁽²⁰⁾⁽²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第1239页。

⁽³¹⁾⁽³²⁾⁽³³⁾⁽³⁴⁾⁽³⁵⁾⁽³⁶⁾⁽⁴¹⁾⁽⁴²⁾《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114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13页，第136页，第335页，第74页，第74—75页。

⁽³⁷⁾⁽³⁸⁾⁽³⁹⁾⁽⁴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第381—382页，第304页，第334页。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军民一致的思想

殷宝洪

毛泽东军民一致的思想，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我党开展武装斗争、夺取和巩固革命政权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1937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军民一致，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内涵是：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军队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尊重地方政府，遵守群众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政府和人民要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拥军优属，成为军队的坚强后盾。军政军民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紧密团结，鱼水相依，共同奋斗。这些基本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疑都是规范和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根本原则。过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特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职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人对坚持军民一致原则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甚至出现某种背离这一原则的情况，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邓小平就告诫我们：“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思路，寻求坚持和发展军民一致原则的新思路、新办法，巩固和发展新型军政军民关系，为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顺利实现党的新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军民携手，共同奋斗。

—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并引导广大军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清坚持军民一致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上打牢巩固和发展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的思想基础，使军民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一）军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一宗旨，集中地体现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我军的性质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人民军队的职能没有变。除了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外，军队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之外的利益。军队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总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利益一致体现于实现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这个革命目标上。军队既打仗消灭敌人，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群众拥护军队，支援前线，争取自身的解放，军民

之间坚强团结、密切合作，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我军在履行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和平生活和劳动环境职能的同时，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通过多种形式支援国家建设，为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作出贡献。在这方面，军队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利益就是军队的利益；同样，军队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军民利益又统一于国家利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军民的共同利益。军民之间在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这种根本上的一致性，是军民一致的前提和依据，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根本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国防现代化是四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忽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它们是互为条件，密切相关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经济建设是军队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军队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军队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军队建设搞好了，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保障。我军从创建之日起，一刻也离不开地方提供物质支援。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省吃俭用，尽其所能，保证了部队打仗的需要。解放后，地方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从多方面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使我军的生活和装备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保证了作战、训练、战备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军队不仅是保卫祖国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军队建设搞好了，对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一种促进力量。部队一方面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一方面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近年来，军队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实行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在保持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同时，向地方转让科技成果，生产部分民用产品；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的正常运行；在确保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的前提下，腾让一些机场、港口和码头等军事设施和场地，实行军民两用或对外开放，并且集中参加了一批大型的工程建设，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有这些充分说明，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互相依存、互为保证、互相促进。扩大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同样离不开地方与军队共同努力，离不开经济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协调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毛泽东军民一致的原则来统一广大军民的思想，做到在实际工作中胸怀全局，相互配合、相互支援，使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地方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增强国防观念，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条件；军队在完成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发展生产力多做贡献，使军民一致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

（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思想

毛泽东曾提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著名论断。军

民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平建设时期，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没有稳定的政局，什么也搞不成。而军民一致、军民团结是实现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近年来，由于进一步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针对新形势提出了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和要求。为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全国、全军普遍开展了军民共建活动，开辟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新途径。为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引向深入，近年来邓小平亲自倡导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的活动，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军政军民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军政军民团结”。这些方针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民一致的思想。通过贯彻这些方针要求，使军政军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达到新的团结，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与军队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仍会从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必须依靠坚强的军政军民团结，充分发挥军队在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中的柱石作用，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四）抵御外敌入侵，实行打现代人民战争的战略，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之所以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能以弱小的军力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相信和依靠人民，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由于各武装力量与群众团结一心，紧密配合，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无难不克，无坚不摧的强大优势，最终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虽然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我国依然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不排除发生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尽管其具体形式和手段随着武器装备和战争样式的变化而变化，但都将是现代条件下全国人民参加和支援的人民战争。正如邓小平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就特别需要广大军民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要用人民战争的根本思想和原则作指导，坚持军民团结，努力形成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强大优势。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对人民战争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要具有新的表现形式，敌我双方的正规交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手段，我军在战争初期的任务和驾驭大量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武器装备的特点，决定了军队在人民战争中的骨干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现代战争的总体性质仍然要求广大民兵相配合，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以形成整体合力。由于现代战争的战场范围广阔，作战形式多样，物资器材补给量大，武器装备破坏率高，交通运输保障任务繁重，人员伤亡率空前增大，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给予军队以人力、物力的保障，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形式和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很显然，要适应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归根到底需要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离开了广大军民的紧密团结和配合，实行人民战争战略，赢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给我们处理和发展新时期的军政军民关系，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新的机遇。同时，由于军民之间的社会分工、生活环境、职业特点的不同，加之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军政军民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军地双方应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到服从大局，相互支援

随着我国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进而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和地方能否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适应这种转变，摆正所处的地位，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影响军政军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主战场”是军事斗争，军队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组织群众等各项任务。那时地方的干部大多是由部队选派，军队同政府和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政府和人民群众时时处处给部队以支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军队必然要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主战场”是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军队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同时，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地方的协作支援，部队的许多事情，需要地方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对军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把军队服从经济建设视为其地位的削弱，因而往往只关注发展经济，对国防和部队建设不够关心，对军人不够理解和尊重，甚至军人的一些正当权益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有些军人认为，和平时期军队的职能和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对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和密切军民关系态度不够积极。有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过于苛求地方，地方帮助解决得少一点，慢一点，就认为部队的地位低了，产生埋怨情绪。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军民一致的原则，军地双方都要认识到，军队和地方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不同群体，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战时一切服从战争需要，现阶段服从经济建设需要，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都是军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军队和地方虽然职能分工不同，担负的具体任务有侧重，但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高谁低。当前，军地处理相互关系，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互相尊重，互相支援，携手前进。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都在一条航船上，这是一条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驶进的航船，我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同志，不管你在这条航船上所处的位置如何，都要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作为军队，贯彻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必须克服用战争年代军队地位的尺子来衡量现实的习惯心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在当前国家经济不宽裕，军费有限的情况下，要坚持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对地方决不提过高要求；另一方面，“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对地方的工作，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就要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和支持，要在搞好部队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同时，主动投入人力物力，积极承担地方的建设项目。作为地方，要看到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保障社会稳定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支援军队建设同样是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大局。各级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建设，支持军队完成各项任务。”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兼顾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积极提供财力、物力，帮助改善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各单位、各行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做到像战争年代那样关心军队，爱护军队，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多办好事，多办实事，积极主动地帮助部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促进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军队建设能够协调发展。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基层的自主权增强，政府的调控功能发生变化，必须在密切军政关系的同时，把军民一致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主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基层部门、企业单位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使其对军政军民关系的调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过去那种政府通过行政控制或直接干预来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的做法将会减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有权决定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使用，加上个体或集体经营成分逐步扩大，一些过去由军政之间协调解决的问题，如军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就业安置、住房分配、子女入学入托及其它优抚政策的落实等，现在则需要由军民之间、军队和基层单位之间来协调解决。过去只要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指令就可落实，现在找到基层单位还往往解决不了。针对这种变化，协调处理军政军民关系，必须强调上下并重的原则。首先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把支持部队建设纳入地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对涉及军队具体利益的问题，要考虑到部队的特殊性，从政策上给予保证，在军地关系上，要加强对基层的监督指导，对部队需要地方办的事主动出面协调，对必须基层解决而不兑现的，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强制兑现，真正强化政府在协调军地关系上的权威。同时，要把密切军地关系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切实把加强军民关系的工作纳入基层工作的轨道，注意从工厂、学校、街道、商店、乡村和连队抓起，从平时抓起，从解决实际问题抓起。按照“组织健全，政策落实，活动经常，关系融洽”的要求，规范基层单位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基层单位都要建立健全双拥协调组织和群众性服务网络，负责组织协商经常性双拥活动。做到每年有计划安排，节日有联谊走访，平时有互帮互学，切实通过军民共建、双向服务等多种形式，加强相互了解，增进思想感情，把实事办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做到党政军机关、各社会团体和广大军民共同努力，促进双拥工作社会化。（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地之间物质利益关系和矛盾日益增多，

必须注意保持军政军民关系的纯洁性

地方和军队在任何时候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军队作为特殊的群体，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增强保障能力，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同样需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一些生产经营，从而使军地双方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出现了军地物质利益矛盾问题，影响着军政军民关系。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变化，有些人甚至把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套用到军民交往中。如：军地双方打交道，有的片面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军队在与地方的交往中，有的嫌贫爱富，对群众的态度也因贫富而异。这就容易使军民关系变为狭隘的功利关系，使纯洁的军政军民关系染上“铜臭”气，打上庸俗的拜金主义的烙印，军民之间的感情因而受到影响。我们既要充分看到市场经济对军民关

系的促进作用，也要防止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玷污纯洁的军政军民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军政军民关系，要注重政治原则和社会效益，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套到军民一切交往活动之中。当然，军地双方在经济交往中，也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遵循互利的原则和按劳取酬的原则，对涉及生产经营、交换分配等经济利益的问题，要遵循价值规律。军队参加经济建设也可适当体现有偿原则，按规定收取报酬，军民互利。但是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军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要考虑到群众的经济利益，防止与民争利，必要时让利于民；要坚决克服和纠正军队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损害地方和群众利益，损害军政军民关系的现象。参加经济建设，可根据不同项目及地方的补偿能力适当进行有偿服务；而一旦当人民群众遭灾遇险时，就不能讲条件、讲价钱，要挺身而出，救援人民群众，随时准备做出流血牺牲，以实际行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地方，要看到军队是国家、人民的军队，是“吃皇粮”的特殊群众。当军队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同样需要给予无私援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得到纯洁和巩固。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区之间、军地之间的经济反差拉大，坚持军民一致应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很不平衡。在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的状况差别较大，比如沿海和内地呈现出很大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仍有逐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经济上的反差，给部队带来一定的影响。驻在富裕地区的部队官兵与驻地群众相比，房子旧、票子少、生活条件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而贫困地区的部队又往往感到支援地方不实惠。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距，如不加以引导。很容易使军民之间产生感情上的隔阂。面对这种实际，要协调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必须首先通过思想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正确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军地关系方面，富裕地区在带动贫困地区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同时，应主动地为部队的发展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援。这一点，有许多富裕地区已经树立了样板，通过支援部队建设，帮助部队办工厂、上经营项目、给优惠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特别东南一些沿海市（县），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在进行城市建设时，也拨出资金对部队营区进行改造，帮助部队办家属工厂、按装闭路电视等，这些生动的事例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官兵，促进了部队思想的稳定，坚定了部队官兵保卫国防的决心。就军队方面，应充分看到地方支援部队的成果，多体谅地方的难处，不能对地方提过高的要求。同时，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也要注意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对贫困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不仅要主动支援，而且提倡以无偿支援为主，帮助驻地脱贫致富，使战争年代形成的鱼水相依的军政军民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军民之间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就能防止和消除因经济反差而形成的感情隔阂，军民一致的原则就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断得到新的体现和发展。

（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完善和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军民双方的合法权益

对比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地之间的经济、民事纠纷明显增多。市场经济呼唤法制，用法制手段规范和调节军政军民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素。军队搞生产经营，难免要和其他经营集团发生竞争。部队在房地产开发，合办企业、有偿承包地方工程等各种生产经营活动中，需与地方单位和工人、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侨商、还有个体户、专业户，建立大量的经济协作和竞争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中，军地双方或因竞争发生利益冲突，或因不善经营造成经济损失，或因一方不履行合同等酿成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需要通过有关经济法规来仲裁解决。同时，由于平时时期国防观念容易淡薄，军队的利益和军人权益、政治地位有时受到侵害。如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困难，少数群众无视军事禁区，有的甚至侵占破坏军事设施；一些地方把驻军视为额外负担，粮、煤、油价格放开，需增加地方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在供应上不能保质保量，等等。上述问题，有时仅靠感情和协商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运用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军民共同利益的法律手段强制执行才能解决。否则，军地双方的权益就难以保障，从而影响军民关系。因此，要注意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切实使军民交往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现在，法律日渐完备，有关规范市场经济的法规正陆续出台，国防法正在制定，军人地位权益保护法、军官转业安置法也在呼吁中。同时，我们还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对军地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搞好调查预测，及时作出政策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军地掌握协调军民关系、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在军地经济交往中，军队要带头遵纪守法，严格用军纪法规规范各种交往行为，做到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尽量避免或减少军地利益冲突。一旦发生协商解决不了的纠纷和案件，要通过仲裁机关或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给予公平合理的解决。

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军民关系上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军政军民团结就一定能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第51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5页，第74—7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1页。

庆祝建军63周年《江泽民发表电视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对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思考

左全颠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经历战争实践之长，指挥战争、战役次数之多，取得胜利之巨大，都是前无古人的。他以其光辉的战争和战役指挥实践、高超的指挥艺术、富有无产阶级哲学特征的作战指挥理论而著称于世。对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思考，对我们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和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看，作战指挥所要认识和解决的，诸如敌与我、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以及最终的得与失、胜与败等等矛盾的范畴，实际上是认识和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任何指挥员在实施作战指挥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哲学观念的制约和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战指挥理论无不浸透着哲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仅是作战指挥的要诀，而且是朴素唯物主义关于对战争和作战行动本质的认识。近代西方的作战指挥理论，也明显地表现出机械唯物论、唯心辩证法和唯意志论等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战争、研究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考察了战争和暴力、战争和经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并分析预测了一些战争；列宁为发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政治角度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领导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和苏联获胜的原因。毛泽东是战争史上，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战争和作战指挥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伟人，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和作战指挥中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融战争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于一体，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核心，以主观符合客观为主线，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对战争认识之深刻，对作战指挥规律探索之深邃，是举世公认的。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他的整个军事理论，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度，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本文试图就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如下若干哲学思考。

思考之一：战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而有规律的事物。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作战指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驾驭战争，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透过现象抓住其运动过程中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找出它的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才能做到能动地指挥作战，并夺取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正确理解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哲学意义，应着重把握两个方面：其一，战争规律是客观的。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战争是物质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战争，其形态可能改变，但它的规律却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当资产阶级军事家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阶段，不承认战争有规律时，马克思主义就揭示出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它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即有其规律性。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存在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二，战争规律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在是可以认识、可以反映的对象。战争现象虽然较之于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什么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包括未来的高技术战争，其规律都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们认识了战争规律，就能用以指导战争，并从中把握实施这种指导的规律。据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

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呢？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法则。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这种方法是从敌我实际情况入手，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找出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在为认识战争规律而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是从熟识敌我实际情况着手，一贯强调“知彼知己”，分析战争特点，并从中引出规律，然后据以确定战略战术，因此，他的决策就符合历次革命战争的实际，指挥我军作战总是取得胜利。

第二，把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接触现象，尔后透过现象了解事物的本质，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有一著名论断：“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从现象到本质认识规律的方法。其中，“情形”是事物的形象，属现象范畴；“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规律存在的条件；“性质”则是人们通过抽象思考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一般事物的规律是这样，认识战争规律也是这样。

第三，把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与其他事物一样，战争规律也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敌与我、人与物、主观与客观、攻与防等等，既互相联结又互相排斥的矛盾现象，这是战争的一般规律。然而，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有其特殊规律。因此，要正确地认识战争规律，就必须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第四，坚持发展的观点。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也是战争的根本属性。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一切战争指导规律，必然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各个不同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要不断地研究战争中出现的

新情况，从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等情况出发，把握战争和战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探求战争指导规律。

第五，坚持实践的原则。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来源，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认识战争指导规律。同时，也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检验对战争指导规律认识和运用的正确与否。因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指挥员认识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的根本方法。通过战争实践，“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这里所说有战争实践，有直接战争实践和间接战争实践之分。在相对平时时期，指挥员很难有机会人人进行战争实践，主要的办法是积极参加平时的军事实践，并认真、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间接的（前人的和他人的）战争实践经验。

今天，战争已步入高技术阶段，战争的形态、特点和规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正确认识与把握这种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仍然要像毛泽东那样，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认识战争。既要看到战争的高技术要素，又要看到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既要看到战争的不利条件，又要看到战争的有利条件；既要看到战争的当前情势，又要看到战争的尔后发展。从而揭示高技术战争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

思考之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作战指挥过程中最根本的矛盾。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关键所在

从战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挥作战，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仅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精髓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基础。

（一）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是作战指挥的根本问题

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是贯穿于作战指挥认识和实践活动全过程的一对基本矛盾。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作战指挥问题的解决。客观实际是独立存在于指挥员意识之外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东西。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实际，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基础。意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主观指导依赖于客观实际，有什么样的客观实际条件，就应有怎样的作战指挥。指挥员只能在充分认识战争规律和全面了解战场实际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而不能违背战争规律和无视敌我实际，一厢情愿地企求作战的胜利。

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如同工作一样，多打胜仗的关键，就在于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败者主要是因为战争、战役或战斗的指挥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说没有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

战争实际，是分析认识战争、制定作战决策的出发点。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认识战争实际，既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也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根本途径。没有对战争实际的正确认识，就不可

能有正确的作战指挥。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把主观当作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只知根据理论原则、文件指示，主观地来分析解决作战问题；一种是把战争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对于战争实际的研究，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是后一种态度。

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一要尊重战争实际的客观性。对它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而是如实地反映其本来面目。否则，只能导致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作战指挥的失误。二要全面地分析战争情况。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战场兵力、战场态势、各战场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后方条件和支援作战的能力、天候地形情况等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军心士气、内部关系、战斗力水平、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等。要把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前方与后方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连贯起来分析，而不是片面地观察个别现象。三要注重战争实际的实质。要注意研究战争实际的总体，深入研究其内部联系，抓住实质，防止表面地看问题。四要辩证地看待战争实际。对强与弱、大与小、优与劣、主动与被动等形势，要辩证地看，要看到它们双方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联结又互相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五要着眼于发展变化，要用发展的观点去认识战争情势，科学预测其发展。

（三）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由浅入深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主观符合客观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较好地解决认识情况中本质与现象、真相与假相、全局与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诸矛盾，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奠定基础。在如何实现主观符合客观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表明，实现主客观一致的认识过程的主要要求是：坚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的标准，即摸熟自己部队的脾气，摸熟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掌握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程序和方法。这就是“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把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坚持作战指挥认识的两个过程的思想。第一个过程，是作战计划确立之前，侦察敌情、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作战计划付诸作战实践，并在作战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在作战过程中，逐渐实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上述要求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敌对双方战争认识优劣的比较，就在于哪一方比较地更接近于实际，以及哪一方更善于及时地发觉已有认识中不符合于实际的部分，并迅速地作出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指挥员认识过程的长短，作战决策和指挥过程中对重大问题处置的正确与否，同指挥员对战争情况的反应能力，同作战指挥的灵活性是完全一致和密不可分的。

思考之三：人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战争就是作战双方以军力财力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在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是作战指挥的本质要求

主观能动性，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和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物质为基础，以遵循战争规律为前提，同时也受主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人们不能脱离客观物质条件企图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但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的胜负可以起决定作用。就作战指挥来说，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为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物质条件的优劣以外，胜者多由于作战指挥的正确。败者多因为作战指挥的错误。这一点，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尽管战争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有增大的趋势，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从作战指挥来说，指挥员在既定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可概括为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两个环节。

在制定计划的环节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地进行作战决策，实现由物质变精神的第一个飞跃。作战决策，是作战指挥的重要一环。正确的作战决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战场情况假相的大量存在，偶然因素的作用，使得战场情况呈现出不确实的特征；加之人们受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和客观事物本质暴露程度的影响，给周密计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这并不否定制定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¹¹⁾战争没有绝对的确确实性，但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方是比较确实的。敌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使战争的计划性有了客观基础。指挥员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作战计划，能动地去争取胜利。为此，指挥员必须清醒地估量、对比敌我情势，从战场上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审时度势，区分轻重缓急，精心筹划作战。这一点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突然性增大，交战时间缩短，战争进程加快，战役往往具有战略决战的性质。作战决策是否快速、及时，作战计划是否符合实际，对战争胜败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强调，战争、战役和战斗计划，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如果把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种计划肯定会遭到失败的。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进行作战决策，而导致打败仗的例子是不不少的。我军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博古、李德等无视敌之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摒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红军战略退却，主观地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推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当不能打破敌之“围剿”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时，又推行逃跑主义，结果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现代战争中也不乏其例，如英阿马岛战争，阿

根廷当局主观地作出“英国不会劳师远征”的错误判断，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收复马岛，结果被英国所战败。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失败是他们主观主义战争指挥的必然结果。

在实施计划的环节上，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实现由精神变物质的第二个飞跃。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体现在制定计划的环节，更体现在实施计划，即实施作战指挥的环节。前一个环节的核心是“计划性”问题，后一个环节的核心是“灵活性”问题，或者说是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的问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认识反映作战情况及其规律，是有效的但又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应当而且能够制定作战计划，而又不能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作战过程是急剧变化、错综复杂的，确实性与随机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同时存在。指挥员只有将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随时掌握、准确预测并临机处置作战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才能夺取作战的胜利。灵活的作战指挥，是指挥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展现，是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体体现，是其“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12）}实现作战指挥的灵活性，主要靠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日积月累，这就需要极大的主观努力。

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灵活，是举世罕见的。其奥妙集中体现在一个“活”字上。在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法典”里，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说过，共产党打仗，是没有什么老样的，要根据对象、战场等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战法。“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3）}对于毛泽东这种唯物主义的用兵艺术，朱德作了科学的概括。这就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4）}兵无定势，谋贵从时；战无常规，战胜不复。仗要打得巧，打得好，关键就是一个“活”字。

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看，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称它“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15）}，“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16）}其主要做法是因时、因地、因情集中、分散和转移兵力，并辩证地处理好集中、分散和转移的关系。二是灵活地运用和变换作战形式。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灵活选用，紧密配合。这种配合不是三者之间平分秋色，而是依照战争情况和战争进程，有主有次，互相结合，互相变换。三是恰当地运用和灵活地变换战法。把时机、地点、部队作为灵活运用和变换战法的三个环节，根据不同情况，不拘一格。

思考之四：战争领域充满着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把握这些规律并从中寻求制胜之策，促使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向着我优敌劣的方向转化，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

战争是一个多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统一体，是敌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整体对抗。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互争优势和主动。斗争的结果，使取得主动、优势的可能变为现实，或使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发生转化。主动权即军队的行动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可

能被打败或被消灭。然而，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是，它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现实的主动与被动还和作战指挥的正确与错误密切相关。作战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

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就是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转化的条件。战争双方的客观条件是优势与劣势、有利与不利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优势一方优中有劣，劣势一方劣在有优；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存在。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就是要辩证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把握诸客观条件对敌我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和利弊得失，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破坏敌人的有利条件和抑制敌人优势的发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趋利避害，促成战局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第一，在战役、战斗中对敌形成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作战力量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作战指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无非是将这种变化导向己长彼消、己强彼弱的方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战役、战斗中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尤其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只有在关键时机和重要地点集中力量，形成优势，才能变不利态势为有利态势，脱出被动地位而取得主动权。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深刻地揭示了集中力量与夺取战场主动权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¹⁷⁾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他在集中力量问题上，不仅有“量”和“度”的规定，而且在力量集中使用的方式上更具特色。这主要是：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战场或一个主要作战方向；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力量；集结和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等，以形成局部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

第二，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战术上量的积累而最终达到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战略上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毛泽东关于弱军战胜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他指出：“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¹⁸⁾按照这一思想，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内线的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在具体战役、战斗上，实行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即：当处于战略防御的被动状态时，通过战役、战斗的进攻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内线的被动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持久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争取主动。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敌主动我被动的形势，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面临的将是武器装备上相对的敌优我劣的形势。要战胜敌人，从作战指挥来说，仍然需要像毛泽东那样，切实把握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中寻求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制胜之策。

思考之五：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全局与局部密切相关。关照

全局，掌握关节，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是作战指挥的主要问题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¹⁹⁾战争的全局决定局部，局部要服从全局。关照战争全局，反映了抓住战争这个事物中的主要矛盾。作战指挥中，能否关照好战争全局，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决定战争和作战胜败的主要问题。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从全局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统筹兼顾，妥善照顾战争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才能自如地驾驭战争。因此，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其一，要注意把握构成战争全局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战争如同一盘棋，盘中诸子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作战指挥就是要从战争全局的利益出发，巧用诸子，把各个战场、各个战役和战斗及其各个作战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发挥各个局部的作用。为此，作战指挥应通盘筹划、全面安排，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二，要抓住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因此，作战中对局部问题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全局。有的时候，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斗或战役失败或胜利了，却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此，毛泽东强调，指挥员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什么是关键，什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抓关键环节，实际上是抓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它可以是主要战场、主要方向，也可以是主要的战役、战斗。

其三，要善于照顾战争、作战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战争的发展具有连贯性，作战指挥要通观战争全过程，既要看到各个阶段的相对独立性，又要认清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一场战争是这样，一次战役和战斗也是这样。为此，毛泽东强调，在打第一仗之先，就要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同时，注意搞好各个阶段的相互衔接，做到上一阶段为下一阶段进行必要的准备，创造有利条件；下一阶段又能及时、充分地利用上一阶段的作战成果，使战争和作战一环扣一环、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四，要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关照全局，必须用全局统帅局部，使局部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全局。毛泽东认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此，他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都应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将自己所指挥的局部与战争或作战全局联系起来，把局部置于全局中的正确位置上，并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²⁰⁾。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受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制约更强，局部服从全局尤为重要。指挥员不仅要站在战争的全局上，而且要站在国家全局的需要上考虑问题，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局部情况的处置，都应符合和服从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决

策。

此外，关照全局，还要认识全局与局部的相对性，防止把全局与局部的区分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全局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则可能只是一个局部。据此，指挥员要随着战争全局的变化，把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变化后的中心环节，将战争和作战从一个阶段推向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的科学性已为战争实践所证明。它虽然没有穷尽真理，其中的某些东西也许需要补充，更需要发展，但融汇于这一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诸如认识、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客观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从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中寻求制胜之策，以及关照全局和掌握关节，等等，仍是我们揭示未来战争作战指挥规律和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指南。随着历史的前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使战争情况，特别是武器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情况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未来战争的作战指挥特点和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作战指挥。这正是融汇于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注释

(13)(17)(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第178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89页，第284页，

第17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187页，第223页，第175页。

(11)(12)(15)(16)(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0页，第495页，第494页，第493页，第412页，第410页。

(14)《朱德选集》，第168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70页。

论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的普遍价值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无不受一定思想方法的制约。而任何一种理论，也只有被用作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改造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强调贯穿于自己全部理论中的方法论的功能。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实际时，它便成了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党先后两次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共同的根本经验，都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去回答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需要大力加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建设。思想方法素养提高了，可以从根本上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能力。邓小平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南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其精神显然都是要求我们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所谓“换脑筋”，说到底是个端正思想方法的问题。而结合工作实际，学习和应用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即毛泽东当年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思想方法，正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同志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提高思想方法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所谓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并不是指军事上的具体原则和具体作法，而是指贯穿于毛泽东军事理论中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直接相连的。因而具有共性的意义。人们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和主要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主要是与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战争历时之长，规模之大，矛盾之错综复杂，历程之艰难曲折，特别是力量对比之悬殊，又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非有超乎寻常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无法驾驭到胜利彼岸。因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而展开；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创造和丰富经验，不能不在战争指导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体现。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堪称一部用军事语言写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活教材，是毛泽东用以成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的集中表现。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位兼军事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兼有哲学上的高度成就，因而也就尤其具有长期而普遍的学习与应用价值。事实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从来都有触类旁通的共性意义，各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方法论价值往往都能超越它们最初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领域，广泛地向外辐射；所提供的方法层次越高，可应用的历史跨度就越大，领域范围就越广。孙子兵学是这样，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更是这样。

毛泽东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法，内容丰富多采，可供我们

学习和应用的东西很多。当前尤其需要着力掌握的，我们感到主要有这样一些：

一、研究和指导战争，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矛盾问题的精髓在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这一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基本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他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仅要研究一般的革命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不仅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今天，而且要研究它的昨天和明天。而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要求，在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运用的就是这一方法。后来，他也是从分析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的根本特点及其演化趋势入手，深刻揭示并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先后三场不同战争的规律、进程和结局。综观他研究、指导上述各场战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方法包含四条主要原则：一是充分承认国情的特殊性，不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二是不把对国情特点的了解本身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国情特点的深入研究，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定的客观规律性，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构成用以克敌制胜的指导规律。三是不搞“坐井观天”，眼光囿限一域，而是放眼中外对照，进行特点比较，从比较中求得对本国国情和本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真知深识。单纯就本国国情谈论国情，是难以吃透国情特点、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性的。四是重视国情的流动性，从国情特点的发展变化中引出动态的规律性认识，反对一劳永逸，不使认识停留在旧阶段，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必要借鉴毛泽东的上述方法论原则，用以深入研究我国国情的特点，不断加深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定规律性的认识。例如，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究竟怎样适应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在探索有关规律的宏观思路，就特别需要把中外比较搞深搞透，切实吃透我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既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决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就拒不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充分考虑国情的差异，包括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人口负担沉重，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比较浓重等特点，据以筹划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特别要防止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种种痼弊，当作市场经济的一般通律，盲目地照搬过来。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地区、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来说，也必须从自己的特殊情况出发，正确地学习外地外单位的经验。不能凡是上面点了头的、报上出了名的做法，都一阵风地简单效仿。再如，对国情特点的认识怎样随时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我们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为克服我国经济体制上长期存在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我们多年来的改革路子，基本上是上面对下头放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当中央的政令贯彻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屡禁不止时，我们就必须把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纳入深化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范围。总之，国情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规律既有相

对稳定的一面，同时又有不断变化的一面。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又会出现。我们的认识和改革的举措一定要相应地同步演化，力避落后于变化着的实际。

二、从战争学习战争

战争从来不是预演室内的活动，中国革命战争更不是事先学成、有了现成答案之后才进行的，毛泽东的名言“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全党全军的座右铭。正是靠着这一条，我们党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到战争的制胜法则；我们军队从“土包子”中涌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帅才、将才，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的范例或模式，同样要靠“从战争学习战争”，即从建设中学习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机遇难得，时不我待。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必须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带头实行并激励人们鼓勇气，树信心，敢于中流击水，勇当弄潮儿，比干不比看。坚持实践标准，不搞空洞的理论争论，摈弃过多的评头品足，在积极探索中开拓成功之路。

规律之为物，有个独特的品性：当顺应规律办事、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往往不大会感到它的存在；相反，常常是在违背了规律、受到惩罚时，才能对它产生感触尤深的认识。毛泽东所说的“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包括从正面经验中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还尤其包括总结反面的教训，从教训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他本人就十分善于做到这一点。正是从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严重受挫的现实中，他开始深切地懂得了中国革命战争不能搬用俄国革命城市起义的搞法，毅然率部转向井冈山进军，从此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道路。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就如何正确指导我国革命战争所阐明的种种规律性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几次“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失败教训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出的。今天，我们要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同样需要发扬毛泽东的这种科学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新鲜经验。对此，我们必须百倍珍视，充分总结。同时，对某些工作中的失误之处，也必须高度重视，从中汲取教益。以求在“从建设中学习建设”的过程中，做到“打一仗，进一步”，避免在一种事情上反复多次地“交学费”。也就是说，我们要过“河”，经验和教训这两种“石头”都要摸，而且都要“摸”透。切不可把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藉以总结教训，视为“给大好形势抹黑”，看成是“否定”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开放的成就。须知对于我们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其危险的。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战争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作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著名论断。这既是他的人民战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观点，同时也是

他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之一。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他始终把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主要立足点，放在相信和依靠广大兵民群众战争伟力的基点上。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在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赢得胜利，靠的就是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广大兵民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要把各项建设事业搞上去，归根到底要靠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借鸡下蛋”是完全正确的，开放的步子今后还应更大；上头给一些优惠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能由此目光一味向外、向上。领导的主要精力，无疑应始终用在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智上。

毛泽东认为，调动千百万群众的战争伟力，归根到底要靠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战争条件下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是：既谋求政治利益，同时也谋求物质利益。对广大农民群众，一方面在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劳动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最大物质利益要求——土地问题。把谋求长远利益与照顾眼前利益统一起来。在优先满足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尽最大努力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兼顾各部分群众的利益，以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兼顾中有重点，重点增进广大农民的利益。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力量是广大农民，农民在战争中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负担和牺牲也最重。今天，我们要调动广大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在改革开放中正确地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为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原则。一是兼顾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类似打白条等损害群众现实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作法，今后务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禁令，再也不能重复了。二是统筹各个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利益。既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同时以更大的努力促进共同富裕。避免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距过大，以便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三是以得力的措施，解决好各类劳动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财富创造劳动与财富流通劳动之间收入比例合理化的问题，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尤其是要遏制非正当收入。把社会分配的重点，进一步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发挥了支柱性作用的那些劳动者阶层和劳动者群体倾斜。

四、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

如何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集中与分散、作战方向的流动性与固定性、连续作战与休整部队等军事活动领域的种种矛盾，历来是战争指导上最感吃力的难题。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统帅，往往由于用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招致失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点和中华民族历代兵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运用于战争指导实践，一贯强调处理军事上的各种矛盾时，不要企求以径情直遂的方式去实现目的，而应注重把握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结与转化，通过“相反”达到“相成”。例如，以消

灭敌人作为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以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达成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通过无数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逐步改变战争全局上的劣势和被动；通过巧妙的必要分散去调动和扯散敌人，以便使己方在决战时节和决战地点达成集中优势兵力；通过必要的“走”，为有把握地“打”创造条件，等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过程看，这种相反相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之中，构成了他用兵艺术的一大特色。

构成矛盾的不同事物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情况同样也普遍存在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学习、掌握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当今改革开放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用这种思想方法看问题，就易于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导向和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我国新旧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必要的宏观调控显得尤为重要。舍此，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育，把国民经济进一步搞活。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不是排斥必要的指导性计划。我们所应致力的，只能是探求市场导向和计划指导两种手段的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用其中任何一者否定另一者。否则，就有可能误入“按下葫芦浮起瓢”、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多年来改革的实践表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大敌。学习和应用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相反相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防止这样那样的片面性，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五、关于认识战争情况两个过程的原则

毛泽东历来强调，正确的战争指导，归根结蒂就是做到主观指导合于战争实际。为此，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好认识战争情况的两个过程。他指出，战争中对情况的认识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制定军事计划时，要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必要而周密的侦察和了解，对所得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据以定下合理的决心，作出恰当的部署。军事计划确立并付诸实行之后，认识开始转入第二个过程。这时，指挥员必须继续不间断地跟踪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对原来的计划适时作出部分的乃至全部的修正，以实现不间断的正确指挥。原定决心和部署不需要作任何调整修改的情况，在战争中是极少有的。毛泽东还强调，在上述两个过程的每一过程中，指挥员都应当把个人才智与集体智慧结合起来，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战争年代，他本人就堪称发扬决策民主、善于择善而从的模范。如解放战争中期，原定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远出江南，继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作我军的第二次战略性跃进。当粟裕对该项设想电告了不同考虑时，毛泽东把陈毅和粟裕两位华野主要领导人专门请到中央开会面商，最终采纳了华野主力全部留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结果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

毛泽东的上述原则，为战争中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情况、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军事决策，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规律性认识程序和方法，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精神。他一生身经百战，所以能够每每料事如神，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此。这对我们今天在各项工作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抓好正确决策的落实，很有现实意义。掌握了上述原则，除了有助于增强决策前坚持充分调查论证、坚持集思广益的自觉性外，还特别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重视决策付诸实施后的情况追踪和信息反馈。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经验表明，只有同样重视决策后的第二个认识过程，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本身的不完善乃至失当之处，也才能随时了解和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障碍，把正确的决策落到实处。否则，政策上或工作中的问题就难以及时发现；待到矛盾严重暴露出来、决心加以解决时，问题已经相当积重，解决起来势必耗时费力了。

六、抓住枢纽，统筹全局

局部与全局，是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关系。毛泽东作为大军统帅，历来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关照好全局，不能顾此失彼。但是，他所说的关照全局，不是半斤八两式地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围绕枢纽去统一筹划全局。“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是他的名言。所谓枢纽，就是那些对全局具有关键意义的局部。先敌一步抓住枢纽，就能夺得全局上的主动地位，整个战局就活了。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淮海战役中攻取宿县，平津战争中控制张家口和塘沽两点，即是抓枢纽的范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至国家，小至单位，都可以是一个全局，领导者也都应具有善于捕捉各个阶段和各项工作枢纽的本领。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分析当前全国经济形势时指出的几项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农业，加强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基本平衡，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力整顿好金融秩序，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所必须抓好的枢纽。总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掌握了抓枢纽、带全盘的艺术，有助于在各项工作中变被动为主动，变疲于应付为高屋建瓴。

毛泽东所讲的“抓住枢纽，统筹全局”，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懂得：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来说，本战区、本部队的全局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枢纽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各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及其枢纽，来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确定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也就是说，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有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观念，尤其要有全党、全军的全局观念。战争年代，我军所以能以弱胜强，屡屡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国内外敌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各战区、各部队的领导人高度自觉地坚持以革命战争的整体利益为重，自觉以局部服从全局，紧紧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各项部署，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抓住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和协调一致。只要是大局需要，再艰巨的任务也争着上，再大的局部利益也肯于牺牲，从不计较谁啃“骨头”谁吃“肉”。今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需要以同样的态度，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当前，尤其应强调局部服从全局，而防止和克服各种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哪个地区、哪个部门或哪个单位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有意无意地损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最终也会受到损害。

七、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

毛泽东用兵打仗，之所以能每每在危险和困难时刻应付裕如，不失胜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这一原则。他强调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中的情况较之其他领域更带有所谓“盖然性”。因此，指挥员在制定军事计划，定下作战决心时，应考虑多种可能性，把计划的立足点放到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基础上，以便争取最好的结果。当年，他在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署济南、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时，都很强调这一点。指挥打仗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需要这样。大量事实表明，从“最坏情况”出发去争取最好结果，意味着充分预测论证，预有多种方案，把敢想敢干的建设热情同冷静的科学态度融合一体，一般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否则，如果一切从最好的可能性出发，往往会导致考虑不周，疏于准备，匆匆上马，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便束手无策。非但不能取得最好结果，还难免受到最坏情况的惩罚。

八、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并重

毛泽东认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既取决于武器装备等物的因素，更取决于人的因素，是“人”与“物”两种因素的结合。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坚持两种因素的建设齐抓并进。对于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来说，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良精神品质是较之旧军队的一大优势。要使我军在革命战争中越战越强，必须在重视不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水平的同时，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为此，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坚持用革命的政治和先进的思想教育人、武装人。在他们的长期培育下，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与旧军队、旧世界的崭新精神风貌。解放区军民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上却充实富有。人民普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亲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崇高理想，有献身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价值追求，有同心同德、甘苦与共的整齐步伐，有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大家以艰苦奋斗为本。以忠诚奉献为自豪，以奋勇当先、前仆后继为荣。旧世界比比皆是各种丑陋现象，如弄权营私、倾轧内耗、投机钻营等等，在那里几乎没有公开市场。唯其如此，军队和解放区成为一切追求光明与美好的中华儿女心驰神往的一方净土。多少人辞别家庭，脱下长衫，跋山涉水甚至远渡重洋地争相奔往，心甘情愿地去住土窑洞，啃山药蛋，穿“土八路”军装。我党我军所以能赢得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拥护，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在物质条件微薄的情况下夺得胜利，与这一切是休戚相关的。邓小平将我军的这些精神风貌概括为“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强调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这“五种革命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恢复到战争年代军队和解放区人民的那种生活条件中去。但是，毛泽东当年关于人民军队必须“人”

的因素建设与“物”的因素建设一起抓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长期稳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的。我们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建设一起抓，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特别是要用好的党风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尤其要坚决批判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毫不手软地惩治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力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须知在贫瘠芜杂的精神土壤上，是筑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的。

以上几条，远不是毛泽东军事问题方法论的全部内容。其总的精神，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切合客观实际。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秘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搞好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和弘扬的。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谈到，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个到两百个真正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加快。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广大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切实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再加上全党同志自觉地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的各项工作肯定会做得更有成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沿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以更坚实的步伐高歌迈进。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第13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与实践

杨小池 王乃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与实践，就是其中精采的一幕。

一、关于敌后抗战战略支点构想的形成及其实践的成果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战略支点，就是战争中的中心根据地，也就是像下围棋做的“活眼”。这个中心根据地，既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保存和发展自己，阻击或消灭敌人的战略堡垒；又是向四周辐射，发展和壮大更广泛范围的武装根据地的后方基地。毛泽东关于战略支点的构想，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点到面，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持久战争；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游击战争，它由辅助地位逐步上升为主体地位，进而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以建立敌后根据地条件，而根据地又必须以一个或数个中心为依托，向四周辐射；敌后根据地必须以党为领导核心，以武装为后盾，抗日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群众运动全面发展，从而使武装力量 and 人民抗日力量成倍、成十倍地发展，然后集聚力量向周边扩展，变游击区、敌占区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有一个提出——实践——再提出——再实践——直到完全成功的发展过程。

1935年冬，长征后的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把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陕北是小红军的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华和蒋介石继续“围剿”红军的严峻形势，红军必须立足陕北向外发展，这是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但如何向外发展？中共高层却存在向东（山西）、向南（陕南）、向西（宁夏、甘肃）、向北（绥远、内蒙古、察哈尔）四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毛泽东力主向东发展，打通直接抗日的路线。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战略的报告，强调：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还详细阐明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战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明确提出红军必须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山西吕梁山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入晋，开辟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战略支点的最初的构想与实践。红军东征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也使毛泽东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自

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抗日要求，更增加了新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全民族抗战的路线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37 的 8 月 22 日到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当前日本进攻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其进攻的辅助方面；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其基本任务是：1. 创建根据地；2. 箝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最后决定，将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线。1937 年 9 月 1 个月内，毛泽东几乎连日致电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或北方局，反复重申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适时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预见“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1938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在 1938 年 4 月、12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巩固山西四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八路军大部主力先后开赴绥蒙、山东、河北，创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至此，毛泽东在实践中，完成了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对于赢得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华北敌后扩展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 4 大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彼此相连、互为依托的华北敌后战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铁路，形成东西 1100 公里，南北 900 公里，总面积近 100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5000 余万人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抗日军民顽强地抗击日军，不仅打破了日军占领山西、占领华北的美梦，而且陷敌于四面包围之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使党组织与人民武装力量在华北地区获得空前广泛的发展。以山西为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山西全省党员由抗战前夕的数百人发展到 15 万人，在各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 20 个地委，111 个县委。山西全省青壮年累计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达 60 余万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造就出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人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领袖人物。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牺盟会、山西新军、战动总会和其它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随后，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参议会既是临时政权机关，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在其中都是平等的一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涌现出范筑先、续范亭、刘少白、牛友兰、王玉堂等一大批与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合作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还推动了全

国敌后战场的猛烈发展。从 1938 年起，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四面开花，日军重兵被拖在华北，使华中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得以迅速发展。1940 年 8 月至 12 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更打乱了日军南进的计划，挫败了日本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阴谋。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陆续派出部分主力到华中敌后战场，和新四军一道，创造了苏北、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抗日根据地。1944 年，太行、太岳两个军区先后派出部分部队挺进豫西，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至此，从华北到华中、华东、华南，构成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战 8 年，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军作战共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 52.7 万余人，歼灭伪军 118.6 万余人，解放国土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2 亿人。

二、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客观依据

抗战初期，战争局势千变万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基于下述 4 个相辅相成的条件。

第一，基于日军侵华的部署和进攻的态势。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1937 年 8 月，日本参谋本部又从国内抽调第十四、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开赴华北战场，侵驻华北的日军达 30 余万人。从 1937 年 9 月起，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10 月上旬，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驱兵南下，进逼太原。

在此期间，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共 70 余万人，虽曾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执行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 30 万人的锐利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局。

正是依据上述战争态势，毛泽东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把数量极为有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山西这个战争热点地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阻击敌人。随着战局的急剧变化，山西日益成为类似围棋棋盘上的一个“活眼”。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胆略和谋略，带领全党全军全力以赴做好这个“活眼”，使它带动华北抗战这盘棋。

第二，基于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政治态度。

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他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 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以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他对日本既勾结，又防范。阎锡山自喻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处在平衡于降日抗日、拥蒋防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之中。在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蒋介石军队赖在山西不撤，日军日益危及山西之时，他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只有借助共产党才能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在红军 1936 年东征期间，毛泽东摸透了阎锡山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政治秉性。同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亲笔致阎锡山，提出了为抗日，红军“甚愿于晋军立于统一战线。”从此，毛

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推进共产党与阎锡山的抗日合作。在一年之内取得超常的进展。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委托朱蕴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面晤阎锡山，一再转达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先后派南汉袁、彭雪枫、周小舟同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7年7月下旬，阎锡山还向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彭雪枫透露南京方面企图借日军之手歼击红军的计划，并建议红军在五台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答应红军入晋后补充枪支弹药和其他供给。实际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中共与阎锡山已经立于抗日的共同战线。八路军3个师入晋得到阎锡山的多方合作与支持，而这一点，实在是创建战略支点绝对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

第三，基于山西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恒山、太岳山横亘其间，山区占全省总面积80%以上。1937年9月，周恩来由山西抗日前线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弛聘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中、华南连结，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山西群众基础好，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红军主力，阎与我合作抗日，将可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周恩来从山西地势论及山西将“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毛泽东把山西创建为战略支点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雄据群山，辐射平原，是创建战略支点绝不可少的条件；山西失之于敌，则华北不保；山西据之于我，则华北复得。

第四，基于党在山西的工作基础。

山西党组织虽然建立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屡遭破坏和损失，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反动当局的屠刀之下。但党的红旗不倒，革命火种不灭。山西党组织在腥风血雨中苦斗。从1936年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把党的工作重点逐步放在山西，先后派张友清、赵仲池、赵振声加强中共山西工委工作，派薄一波等组建专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党组织逐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创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党组织自身也得到扩大和发展。截止1937年5月，全省有党员365人。抗战爆发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出大批干部到山西，在各县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1937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按山西四区分别组建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和原有的中共山西省委，各省委下属特委、县委。山西党组织逐步成为创建战略支点的领导核心和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

三、关于在山西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实施过程

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需要诸多因素的组合与力量的配置。为了这一目的，毛泽东把握华北战局的瞬息变化，不断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如果从八路军开进山西为起点，在大约一年时间内，毛泽东把构

想化成了现实，进而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第一，把党与军队的主要力量放在山西，形成创建战略支点领导核心和后盾。

1937年7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杨尚昆为宣传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驻太原，领导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北方局从北平、天津、河北等地选调大批骨干到山西工作，充实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和各战略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周恩来于9月5日到达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的各事，直到1937年11月25日赴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工作122天之久。同年9月上旬到中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以及下辖3个师的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肖克、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分别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主力相继开进山西，分别布置于恒山山脉和正太路沿线。此时，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首的党与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云集山西，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以山西为中心，配合国民党军队部署华北的对日作战，同时，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第二，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在山西由一区集中变为四区展开，形成四面包围敌军的态势。

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同朱德等人谈话时提出：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地区。9月上旬，毛泽东部署入晋的八路军集结恒山一线，阻击日军入侵晋绥地区。数日后，得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大迂回态势，企图夺取太原，进而夺取黄河以北。鉴于敌情的变化，9月17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之侧翼，钳制日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阎锡山的晋绥军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造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毛泽东适时变更原定部署，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八路军三个师很快改变原定计划，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在山西分四区展开，向着敌占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摆脱了敌军的迂回包围，在开展山地游击战中，着手开创山西4块敌后根据地。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告捷；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敌军，切断敌张家口至代县的交通线；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此阶段，华北战场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因国民党政府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又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结果连连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大部地区为日军所占领。面对上述变化，毛泽东于太原失守的次日指示八路军：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派；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內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¹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具体部署是：一一五师一部与中共晋察冀省委相配合，依托恒山山脉，继续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以及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部分人员与中共山西省委相配合，依托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与中共晋西北省委相配合，依托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与中共冀豫晋省委相配合，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山西战场这盘围棋上，布下了四个“活眼”。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在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上，这是决定性的一着。

第三，全面创建山西4个抗日根据地，把“活眼”做好。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前述山西4区进入全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连续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要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到1938年5月，山西4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八路军主力向周边省区迅速扩展，充分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

1938年春，毛泽东等多次电示八路军，要以山西敌后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同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论持久战》的讲演。截至1938年12月，八路军调集主力，从山西出发，开赴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冀东、大青山、山东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敌人，共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余人，创建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初步经验，完成了以山西为支点向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

第五，依托由战略支点辐射布形成的华北敌后战场，实行战役攻势，继而举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就华北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致电彭德怀：“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¹²⁾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一指示，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连续挫败了敌人的5次“强化治安运动”。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组织积极执行这一战略任务。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1945年的对日全面反攻，彻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党在华北的组织有北方局和4个中央分局（晋绥、晋察冀、平原、山东），17个区党委（省委），74个地委，6个市委，577个县委。与此相对应，有大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山东省政府和16个行政公署（省级），74个专员公署，6个市政府，577个县政府。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执政地位，积累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丰富经验。

四、关于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创建中心根据地的实践，源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井冈山斗争。他的名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总结了创建井冈山中心根据地的经验。由“星火”而“燎原”，便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思路。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毛泽东提出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并在实践中获得完全的成功，更把由“星火”而“燎原”的基本思路推向新高峰。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由亲自部署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亲自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更把他的基本思路升华为高超的领导哲学和战争指导艺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我们探讨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和实践，可以上升到领导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566页，第599页，第599页。

⁽¹¹⁾⁽¹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5页，第35页，第48—49页，第35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83—84 页，第 87 页，第 83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160 页。
《周恩来传》，第 372 页。

毛泽东思想与琼崖革命

徐冰 钱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坚持 23 年孤岛奋战的琼崖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始终高举革命红旗，最终取得了琼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琼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既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琼崖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探索、创造了不少经验，他们的实践活动丰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的指导

琼崖革命在其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和重视琼崖孤岛的革命斗争，一方面通过广东党组织转达指示，另一方面与琼崖特委建立电台联系（1939 年建立，其间曾中断 5 年多），及时地直接指导琼崖革命。

1. 政治路线的指导，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为琼崖革命指明了航向

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在政治路线上进行指导表现为：在琼崖革命紧要关头和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及时指明全国及琼崖的形势特点和党的任务。

1930 年，周恩来在上海听取冯白驹关于琼崖革命情况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琼崖党抓住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并指出琼崖今后必须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这实际上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5 年，琼崖特委接到党中央、毛泽东有关抗日讨蒋的指示。193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南委向琼崖特委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琼崖特委遵循这一指示，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独立队，实现了琼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日趋成熟，因而对琼崖革命的指导更加有力、更加全面；在琼崖，孤岛抗战极为艰苦，问题错综复杂，也迫切需要党中央的支持和指导。毛泽东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抗战的最基本的条件，不仅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要联合部分大资产阶级进行抗日，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坚持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关键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40 年 1 月，党中央指示琼崖：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琼崖特委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其一，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团结，共同抗日；其二，“对琼崖要放手的干”，“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应比广东其他地区更放开手脚；其三，“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争取侨胞的支持是琼崖革命的一大特点；其四，对琼崖反区逆流“须随时警惕”，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琼崖：中国当前形势是国民党的继续反动与反民主，但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新民主主义力量的不断发展，已成为中国命运的决定者，因此“琼崖党在最短期间内，须集中力量扫荡一切反民主势力，加紧扩军建军，以达到迅速控制全琼，迎接盟军登陆作战的任务。”琼崖党政军民未雨绸缪，以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琼崖革命彻底胜利的前奏。

1946年8月，琼崖特委接到上级关于南撤越南的指示后，立即请示党中央，要求继续坚持琼岛斗争。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拟稿回示琼崖：你们意见很对，应当坚持斗争，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这一指示在关键时刻指明了琼崖革命的方向，增强了琼崖军民团结制胜的信心和决心，被琼崖特委奉为“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1949年初，针对琼崖区党委提出力争琼崖先广东大陆而解放的问题，中央指示琼崖：这种可能性不大，琼崖军民应脚踏实地，勿操之过急，要保持清醒头脑，有计划地歼灭敌人，壮大自己。12月，华南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指示四野“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同时命令琼崖区党委和琼纵负责接应野战军渡海作战。1950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琼崖具体情况后要求“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这一决策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变海南岛为第二个台湾的梦想，其正确性及及时性为随后的历史充分证明。

2. 军事路线的指导，从根本上保证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璀璨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进行革命，如果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做保证，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党中央、毛泽东一直关心琼崖的军事斗争，从多方面给予悉心指导。

第一，放手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曾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一向凭借其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如果我们不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就无法进行革命。琼崖抗战不久党中央就指出：冯（白驹）部还只有千人，太少了，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大一万人枪。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又要求琼崖进一步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

党中央、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琼崖军队的正规化建设。1944年秋，中央指示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独立纵队；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极大地鼓舞了琼崖军民，也标志着琼纵在向正规化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战略战术的指导。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战略战术和经验传到琼崖，对琼崖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抗战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多次指示琼崖“采取灵活游击战术，打击敌伪力量”⁽¹¹⁾，毛泽东还指示冯白驹，待顽军进攻时，应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¹²⁾。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示琼纵学会打大仗，“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¹³⁾。琼崖纵队遵循这些指示，有步骤地壮大自己，伺机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并逐渐转入战略反攻。党中央指示琼崖在反攻中适当集中主力，先歼弱敌，务求全部、干脆、彻底消灭敌人，不打消耗战、

击溃战，在发展上仍应本乡村包围城市之方针，逐步扩大我区⁽¹⁴⁾。这些指示把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运用到琼崖斗争中，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¹⁵⁾毛泽东在总结金门岛战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指出了海南战役的特点和有利条件，指示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十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¹⁶⁾随后，毛泽东又批准了广州作战会议提出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从战略战术上保证了海南战役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三，根据地的建设。

根据地是我党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坚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根据地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曾经反复论证：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及其残酷性，使得游击战争具有了战略地位，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黄巢、李闯王式的农民战争无一不是因其流寇主义而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琼崖革命根据地有过较大发展，但也遭受过挫折，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琼崖抗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就指示琼崖特委要把琼岛创建为党在南方扩大影响、培养干部的根据地。1940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庄田和李明时代表中央指出：敌人在琼崖驻扎着大量装备优良的部队，你们的斗争，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好，这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的，没有根据地，琼崖革命斗争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¹⁷⁾。同年11月，中央再次指示琼崖特委要认识黎苗群众所在地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¹⁸⁾，只有有了这一巩固的后方，琼崖才能坚持长期抗战。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创建五指山根据地的工作没有能很快地进行。1943年黎苗族人民举行白沙起义，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并在起义受挫后主动寻找共产党。琼崖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挺进白沙，逐步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对琼崖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

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关心琼崖根据地的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抗战时期，毛泽东找琼崖负责人谈话时说：琼崖有党有军队，但缺少政权，游击根据地要有民主政权才是，政权要做到三三制⁽¹⁹⁾。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琼崖特委加快政权建设步伐，至抗战胜利时，全琼除保亭、乐东两县外，各县均有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至1948年夏，琼崖临时人民政府控制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已占全岛总面积的五分之四，人口约占全岛的五分之三。

关于琼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0年1月，中央指示琼崖特委丝毫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一切自力更生⁽²⁰⁾。随后又指示琼崖特委从收救国公粮、收各种捐税及发展人民生产中去解决长期给养问题⁽²¹⁾。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直接指导了琼崖土地改革，还指示琼崖：财政经济政策应从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而着重于发展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小工业生产，再配以整理税收及建立运输业，才能立于长久不竭⁽²²⁾。遵照这些指示，琼崖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积极开展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建设，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3. 组织路线的指导，对琼崖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和健全起了关键作用

正确的组织战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琼崖孤岛斗争，远离中央，需要一批熟知该地区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琼崖具体实际相结合，远见卓识，坚韧不拔的领导核心。从1929年冬起，冯白驹肩负起琼崖革命的领导责任，琼崖革命的曲折过程逐渐锻炼出以冯白驹为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保证了琼崖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这个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发挥了指导作用。

1940年，毛泽东接见琼崖负责人时谈到：冯白驹同志在琼崖搞得那么久，情况熟悉，和群众关系密切，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的队长，还是由冯白驹同志担任好⁽²³⁾。他还谈了对冯白驹的希望：（1）要多帮助同志；（2）多抽时间看书学习；（3）军事委员会由冯白驹负责好否？如好就这样⁽²⁴⁾。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庄田和李明时再次谈到“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的意见还是要他当特委书记，兼抗日游击队的总队长和政治委员，对琼崖的革命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你们要支持冯白驹的工作，在琼崖特委的集体领导下，共同把革命工作搞好。”⁽²⁵⁾

为支持琼崖革命，党中央还陆续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琼崖特委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庄田、李振亚、覃威等被派干部后来都成为琼崖领导中的骨干，他们既热爱琼崖的革命事业，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斗争经验，大大加强了琼崖革命的领导力量。

党中央、毛泽东还根据琼崖党的队伍状况，指示琼崖认真在学生、青年等进步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并在军队中公开建立党的政治领导，发挥党员模范作用。1947年，党中央决定将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直属中央领导。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推进了琼崖党的组织工作，至1949年8月，琼崖党员已有1万名左右，占全广东党员的1/3。

徐向前在总结琼崖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和华侨的支持，一支按毛泽东建军思想组织起来的人民军队，是琼崖革命坚持到胜利的主要原因⁽²⁶⁾。这个分析是很精辟的。琼崖革命虽然在远离中央的孤岛上进行，但就23年斗争的全过程而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琼崖始终起主导作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琼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的指导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这一指导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站在全国革命的高度，又十分照顾和尊重琼崖革命的特殊性（尤其考虑到琼崖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要求琼崖更加放手地进行革命）；其二，这一指导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转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给琼崖的贯彻和发挥留有充分的余地；其三，这一指导坚持了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的原则，既突出了一时期的工作中心，又照顾到琼崖革命斗争的方方面面。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琼崖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二、琼崖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

琼崖的孤岛革命遇到了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琼崖军民勇于实践，在斗争中坚定而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其革命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1. “二十二年红旗不倒”丰富了党的武装斗争理论

1927年琼崖“四·二二”政变后，琼崖党组织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建立根据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艰苦卓绝斗争中，琼崖革命武装——琼崖纵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的两起两落，日寇的“蚕食”、“扫荡”和国民党四十六军的“清剿”等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最后迎来了琼崖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奇迹，他们以自己的光辉实践丰富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科学论断。

琼崖在开展长期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根据孤岛斗争的特点，十分注意总结作战经验，加强战略战术思想研究，不断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1956年陈毅就曾肯定琼崖革命“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游击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页”⁽²⁷⁾。

抗战时期，琼崖军民坚持持久的抗日游击战，成功地运用了伏击与奇袭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达到了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目的。尤其是在反日寇“蚕食”、“扫荡”的斗争中，在未与中央接上电讯联络的情况下，琼崖特委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分散了敌人的力量，既保存了老根据地，又发展扩大了新根据地，把抗日战争推向全岛，粉碎了日军强化海南占领区的阴谋。很显然，这一正确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主要采用伏击、运动相结合的战术，作战形式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甚至攻坚战发展。他们在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时提出：“集中优势力量，特别是绝对优势，是确保战役及战斗的主动权，干脆彻底地包围歼灭敌人的有力保证”⁽²⁸⁾，道出了我军最重要的战争秘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战役。战役前夕，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琼纵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向野战大军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乘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第二、若是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军械技术人员，偷运一批枪支、弹药，充实琼纵战斗力。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为广州作战会议确定为对琼的作战方针。当时，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要对付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确实是一个难题。琼崖纵队建议解放大军抓住战机，偷渡兵力充实琼纵部队，增强岛上接应力量，里应外合，为大规模渡海作战创造条件，无疑是明智之举，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的成功战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2. 琼崖土地革命的创举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政策性相当强。琼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开展土地革命比较早、也比较突出的地区。1928年初，琼崖特委和各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各地开展土地革命，最有成绩的乐四苏区通过了一个《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规定：“一、土地权归农会，耕种权归农民。二、所有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如祖赏田等），除酌给其家属耕种外，余者收归农会。三、尚未切实查户口重新划分土地经界以前，所有自耕农原耕之田地，仍暂由耕者耕管，但须向农会领取耕田证。四、所有贫农未得田耕或耕而不够食者，可切实向农会报告发给。……”⁽²⁹⁾从时间上看，它早于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

从政策水平上比较：首先，琼崖没有提“没收一切土地”，而是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的政策，这就抓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矛盾，反映了贫雇农的要求。当时广东省多次指示琼崖“由县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³⁰⁾，“六大”之前中央也出现过“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主张，与之相比，琼崖的土地政策水平明显高出一筹。

其次，琼崖规定给地主家属耕种的土地，给其出路。我们实行土地革命主要是针对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给予地主生活出路显然是错误的。广东省委当时指示琼崖“现在一定要坚决地喊出‘消灭一切地主阶级’的口号，根本不容许不耕田而收租的人有生活的权利。”⁽³¹⁾中央也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主张曾一度被讥为“富农路线”，我们党直接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才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同样分配土地，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琼崖土地革命经验的重大意义。

再次，琼崖较早地认识和照顾到自耕农的土地利益。侵犯中农利益是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一种典型表现，琼崖能有如此的政策水平，实属不易。

最后，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和质量标准问题，琼崖最早提出以乡为单位，以肥瘦为标准，抽多补少，抽肥被瘦，远远早于全国其他地区。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在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赢得农民群众，谁就赢得了中国。土地革命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琼崖的土地革命开展时间早，政策水平高，充分显示了琼崖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其实践活动实际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注入了重要的内容。

3. 琼崖革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问题，是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指导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

琼崖革命在远离中央的孤岛上进行，斗争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有时在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只能独立自主地解决棘手的问题。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琼崖党组织逐步懂得了一切从琼岛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分析形势确定任务时，较好地掌握了创造性地灵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中央指示与琼崖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

正确对待“北撤”、“南撤”，是琼崖革命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1946年2月，中央指示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琼崖特委接到指示后分析琼岛特殊地理条件和敌我斗争状况后认为，一方面要执行中央从全局出发的指示，着手北撤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琼崖的内战已经爆发，必须做好自卫反击、坚持斗争的准备。“北撤”指示不慎泄漏后，在部队和地方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为此，琼崖特委发出了《执行上级指示继续坚持自卫斗争的决议》，提出继续坚持自卫斗争的措施，及时扭转了我军的被动局面。

1946年8月，广东区党委指示琼崖：全国内战爆发后，广东将出现十年黑暗的局面，琼崖斗争将更加困难，因此，琼崖纵队主力须撤往越南。琼崖特委认真研究分析琼崖的实际：国民党军队正严密控制沿海渡口和船只，以围剿我军，强行南撤，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又怎么打回来？

据此，琼崖特委一致决定暂不执行“南撤”指示，并请示中央，说明如执行此指示，那琼崖整个工作就要跨台。党中央非常重视此事，毛泽东亲自拟稿回示：你们的意见很对，应坚决坚持斗争。

早在1930年，毛泽东痛陈本本主义的危害时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³²⁾琼崖特委和琼纵没有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从琼崖的具体斗争实际出发，分析客观形势，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勇于把中央的指示与琼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琼崖军民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理论素质和探索勇气，这也是他们最终坚持到胜利的最重要的武器。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琼崖革命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4. “山不藏人人藏人”对群众路线的丰富

琼崖能坚持孤岛奋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琼崖和军队能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支持革命，把党的纲领化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琼崖特委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革命受挫后，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冯白驹等人意识到：长期在山上，由于同人民隔绝，无法发动群众，使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被动，必须突围下山，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东山再起。下山后，在群众的掩护下，党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实践中冯白驹深刻地认识到：“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就寸步难行，人民群众才是革命者真正的靠山。

抗战时期，琼崖党组织在敌伪顽军的夹攻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斗争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群众观点，琼崖特委总结为：（1）采取正确的民众观点，群众是党生存的基础，是党力量的源泉，党失掉了群众就等于失掉了生命。（2）尊重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同时要善于创造群众利益，帮助他们生产，改善其生活。（3）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知识，彻底纠正轻视群众的观点。（4）凡是共产党员都应该承担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³³⁾。对照一下党的七大总结的群众路线，我们不难发现琼崖党和军队对群众路线理解的深刻程度。

群众路线不仅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只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以冯白驹为杰出代表的琼崖革命者在斗争中较早地悟出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道理，他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坚信群众的力量，总是紧紧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自觉地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而建立起与琼崖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成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山不藏人人藏人”是群众路线较早的、朴实而又准确的实质性概括。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群众不支持革命，不仅革命不可能成功，而且革命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琼崖革命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

冯白驹在总结海南岛的斗争时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与琼崖革命的关系：“海南党的组织二十多年来，远离中央，在摸索中创造了一些成绩，但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全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我们海南是不可能单独得到胜利的。在全部的过

程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但就在那些时候我们从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初步地体会了毛泽东思想的要点，而这就是我们海南岛的斗争能够坚持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³⁴⁾。琼崖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艰苦曲折、可歌可泣的实践活动也从多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以及琼崖革命者的探索精神，至今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

(18)《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

(11)(12)(19)(20)(21)(24)(33)《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307页，第14页，第23页，第131页，第5页，第20页，第130页，第301页。

(13)(22)(28)《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上）第98页，第476页，第98页，第98页，第17页，第228页。

(14)(16)《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下）第268页，第406页，第10页，第40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页。

(17)(25)庄田：《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第9页。

(23)《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

(26)徐向前：《琼崖纵队史·序》，1986年。

(27)《新海南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9)(30)(31)《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97页，第7页，第118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34)《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时间新探

王兴国

目前,学术界大部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他在1920年夏天已经基本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说法,认为这个转变完成的时间,是1920年冬天,或1921年春天。我历来肯定毛泽东自己的说法。现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些新认识写下,与学术界共商。

读三本书与世界观转变的关系

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时,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之后,“到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有人考证,发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便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世界观转变)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有人相信他的前提,即确实是读了三本书之后才有世界观的转变,而不相信他的结论,即既然当时三本书还未出版,也就不可能读到,因此他不可能有1920年夏天的世界观转变。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张“冬天说”者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时这三本书还没有出齐。如果要等这三本书出齐,至少要到1921年春末夏初,毛泽东才能全部得到这些书,阅读之后,还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要推迟一年,即1921年夏天。显然这又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不要把读这三本书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这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但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讲过这件事,而且在1941年9月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它:“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与1936年谈话相比,这次谈话就比较客观一些,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一些,它没有和毛泽东自己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挂钩。我所以不主张将毛泽东读三本书与他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三条理由:

其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站在费边主义的立场所写的书,书中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报刊已有水平,相反,却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本上予以否定,如说历史唯物论“常含有一种宿命论在里面”,说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作者还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认为让无产阶级去做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历史上的职务,能够做得好吗?能够有所成就吗?”显然,毛泽东要从这样一本书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由于该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

本系统介绍从圣西门开始至 1913 年以前西欧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书，从而为毛泽东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便多次提到它。

其二，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虽然是在 1920 年 8 月陈望道的译本出版之后，但是他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的时间，则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的时间还早。我这样说的根据，就是 1919 年 7 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表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有相当的了解，是不可能概括得如此准确的。而从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情况来看，是为这种概括提供了一定条件的。远的暂且不说，仅以五四前后为例，如 1919 年 4 月 6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16 号曾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一部分译文，即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起，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止，当时发表的这段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 5 月 5 日至 8 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译文，该文前一部分翻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前言的第一段话和全书结束的一段话，还翻译介绍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一部分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那段著名的话，并详加注释。李达 1919 年 6 月 18 日和 19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短文，文章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并指出，近时很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这也别怪他，我们中国人近今才有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但是头脑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太薄弱。就有晓得的，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有把这张三的帽子硬送给李四戴的怪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 1919 年 7 月 14 日，第 2 号出版于 7 月 21 日，时间都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没有李达所说的“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的混乱。而他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派的办法则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还必须要有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从我们现在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毛泽东用朱熹的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派的主要思想，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比较早的人。陈独秀也曾用这句话，但已是 1919 年 12 月 1 日了，陈在该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奉劝那些“失势的帝王贵族”，把自己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阶级的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即资产阶级，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陈独秀的这段话，表明他是拥护马克思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的。可是为什么毛泽东当时不赞成这个办法呢？就是因为他还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强权，首先是国家的强权。所以尽管他当时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暴力革命思想，而继续赞成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其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他 1892 年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

说》的中译本，恽代英和新青年杂志社大概是为了通俗和当时斗争的需要，将该书第五章的标题改为全书的标题，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由于这个纲领草案公布之前，在恩格斯坚持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的草案（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起草）公布之后，恩格斯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此正式公布后的纲领从总的来说，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纲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提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考茨基是这个纲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所以在纲领通过后于 1892 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纲领的理论部分进行解说。但是考茨基这本书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否定暴力革命。如说社会革命“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和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又说：“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这些都反映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如前所述，考茨基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出版于 1921 年 1 月，公认的是在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之后，加之该书有如上所述的严重缺陷，所以，它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影响。但是考茨基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本书也同样证明，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通俗化的解释。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着重论证了经济发展本身像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一样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该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对当时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透澈的分析，第二，它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也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产业工人与乞丐、奴仆不同，他们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给他们“教了协力的道理”。第三，该书驳斥了社会上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诸如共妻、消灭家庭、消灭个人财产、消灭个人自由，等等。总之，这本书虽然不论就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还是其内容来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却有效地帮助毛泽东将当时已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化，引导他初步了解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形势，学会了如何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些初步方法，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之后，“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真正有可能直接影响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只有《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读到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但他读了 1919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 2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文，则是完全可能的。据黎锦熙回忆，他在北京看到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是 1920 年 1 月 4 日。此《共产党宣言》可能即《国民》杂志上发表的该书第一章⁽¹¹⁾。应该指出，毛泽东这时读《共产党宣言》与他在五四运动时接触《晨报》及《新青年》杂志上有关《宣言》的摘译或介绍文字时的环境和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主要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文字上的

鼓吹，而第二次到北京是为了进行驱张运动。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同武装到牙齿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还有一个驱张之后湖南如何建设的问题。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只好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方法。这时他的思想状况，如他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中所说：“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如果将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持明确肯定态度相比，这一说法则表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动摇了。这也是 1920 年 3 月 12 日他寄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¹²⁾产生的思想背景。在“商榷”中，他不仅承认“省长”、“县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认“军队”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这些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绝对不承认”的“法定之权力”的范畴。无政府主义是十分推崇托尔斯泰抗赋税、抗兵役的，毛泽东等人既然承认军队、警察的存在，就势必承认兵役。商榷还明确规定了“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可见，“商榷”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从反对强权，否定国家到赞成强权、肯定国家的重大转折。

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影响

1920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后来他在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¹³⁾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不可能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但是《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及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及 6 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是完全可能的。据有人考证，《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虽然印的出版时间是 1919 年 5 月，但实际出版时间却是在当年 9 月份⁽¹⁴⁾，已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李大钊的这篇长达 2 万多字的论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最早著作。李大钊指出：马克思“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¹⁵⁾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除了多引《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译文外，引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与前述河上肇论文的引述基本上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还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学说如此强调，显然影响了毛泽东，所以他后来专门读了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

当 1920 年 5 月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并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仅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肯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在此后半年的文章中反复告诫工人，要起而争自己的统治权。1920 年 1 月 2 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

会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所谓要求“管理权”，即“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5月1日，在《我的意见》一文中，他又说：“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¹⁶⁾毛泽东说，在陈独秀和他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亦曾向他谈自己的信仰。陈独秀这些谈话的内容现在虽无处可考，但其中心内容大概是不会离开他当时在报刊上反复宣传的由工人自己掌握政权这个主题的。还必须注意，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当时从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较好文章。尽管此文发表在他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但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谈话时肯定已经形成，甚至他们还可能互相讨论过。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恰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观点的不对，他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把这个时期视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所以陈独秀对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才能够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世界观转变中，起了良好的酵母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我认为，尽管毛泽东讲的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出版，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回忆。我认为，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世界观转变的，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是如何摆脱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强权的思想束缚，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和往下的分析，我们看到，到了1920年夏天他的确也是解决了。

如何理解“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要结合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和他1920年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分析。必须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根本解决”口号，实际上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就是认为改造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政治革命入手，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消灭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一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讲得很清楚。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则与此相反，他们除空喊“根本改造”外，是拒绝从事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一切罪恶都归于政府和强权，就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变成了“政治决定一切”、“强权决定一切”。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否定了“强权”，推倒了政府，就实现了根本解决。除此之外，他们否认其他任何具体政治运动，例如民国初年的反袁斗争。当时新民学会及社会上的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搞驱张和湖南自治是违背了“根本解决”的原则，就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立论的。毛泽东虽然也赞成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从事任何具体的政治斗争（即所谓“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同，他是主张利用

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这一点，可能与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主张多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定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毛泽东投入驱张运动的实际斗争之后，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无用。《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表明，他已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这就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逐步奠定了基础。而到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便明确地表述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观。他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说：“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¹⁷⁾毛泽东这里说的“彻底的总革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尽管他当时认为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还行不通，但是关键在于他已经表示“赞成”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这种“根本解决”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自己说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应该承认，这的确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其一，它说明毛泽东不仅抛弃了五四时期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转而承认了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所谓“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就是由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解决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洗刷上中阶级”。其二，它表明毛泽东已开始抛弃他一贯主张的“温和的”的“呼声革命”主张，而承认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实行暴力革命。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通过武装起义的手段，没有工农红军，是不可能“扫荡反革命党”的。其三，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斯姆）”。如果说，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仍在说他对种种主义“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的话，那么在这里他既然肯定俄式革命，当然也就肯定了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其四，它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所谓列宁“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五，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劳农大众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必须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掌握政权。所谓“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就是说只有动员大多数民众，革命才能成功，而所谓“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就是要将贵族、资本家的政权推翻，建立人民主权。而这种人民主权思想在湖南自治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这时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已有相当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虽然认为像俄国式的“彻底的总革命”还不能立即实行，但他却和他的战友们在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发起并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虽然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但其企图刺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以为中国革命之借鉴的目的却是显然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彭璜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五天，即8月27日起在湖南《大公

报》上连载发表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说得十分清楚：“俄人历来宽洪大度，虚心聆教，几百年前，法兰西有种什么启蒙哲学，德意志有种什么罗曼哲学，先后输入俄国，俄人总是欢迎接待，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值得注意的是，彭璜在分析有人同情俄国革命的目的，而不赞成其手段，即“多数专制”、“劳农专制”的指出：“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¹⁸⁾彭璜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从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到组织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两人均是志同道合、协力进行的。彭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有几天，毛泽东便发表了前述论俄国革命经验的那篇文章。当时两人完全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彭璜的这篇文章也是毛泽东当时已赞成十月革命经验，特别是劳农专政的强有力的旁证。因此，我认为就毛泽东和彭璜来说，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他们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说，他在1920年夏天，还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他对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历来主张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所谓“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就说明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根据他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分析，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够统一，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湖南自治运动。过去，有的论者在否定毛泽东自己回忆世界观转变时间是1920年夏天时，除了前述以毛泽东讲的读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还没有出版作论据外，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湖南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了回答这种责难，我想作以下两点说明：

1. 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夏天世界观已经转变时，是注意到了湖南自治运动是“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问题的。他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¹⁹⁾这正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一转变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是如此，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

2.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被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掌握之后，他们在实践中立即遇到了一个革命的战略问题：既然共产主义者是主张“根本解决”的，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那么如何对待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逐步有了明确认识，并被概括为“两步走”的战略。但在五四运动至建党之前，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们虽然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且不得不回答它。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

决之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²⁰⁾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则讲得更明确：“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²¹⁾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五四前后都积极鼓吹联邦制或地方自治，目的也是企图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列宁说：“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²²⁾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当然还没有这么高的理论自觉，但他希望通过建立湖南共和国以为“根本解决”创造必要条件的思想则确实是存在的。1920年11月，他在《新民学会通信集》的按语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²³⁾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之前，即注意在实践中对“根本解决”与当前现实斗争关系的探讨，所以在党成立后不久召开的“二大”上，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从而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湖南自治运动的消极方面，同时，要充分认识其在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二，毛泽东这样讲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当时还没有去从事直接的工人运动。他说，直到“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²⁴⁾也就是说，这时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运动。这里讲的“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不是讲组织工人运动，这是中共一大以后的事，而是指建团、建党工作，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毛泽东搞湖南自治运动是脱离了当时革命中心——建团、建党工作的说法，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的高潮，是1920年9月至10月初，他发表的有关自治运动的论文也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时，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小组于1920年

8月才建立。“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²⁵⁾最早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待其成立也已经是1920年10月了。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1920年11月，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说明他对革命的中心工作是跟得很紧的。何况他在自治运动期间还先后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毛泽东关于他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叙述是实事求是的，是不应该怀疑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王兴国、李吉：《从湖南自治运动看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求

索》1981年第2期。

(13)(19)(2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第132—133页，第130页，第131页。

黄国秋：《关于毛泽东首次读 共产党宣言 等三本书的时间》，《求索》1982年第3期。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10月版，第173页、第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2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9页，第12页。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页，第175页。参见恽代英译《阶级斗争》，第79页，第170页。

考茨基：《阶级斗争》，广州平民书社1926年印刷，第154、155页。

(11)杨德勇的《毛泽东初读 共产党宣言 的版本和时间》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证。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3期。(12)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472页。

(14)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15)《新青年》第6卷第5号。

(16)《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7)(2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7—508页，第571页。(18)《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358、359页。

(20)《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22)《列宁选集》第3卷，第231页。

(25)《李达自传》，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历程

张伟良 李继准 丁建同 李雪松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青年毛泽东生气勃勃地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阶段。本文试图循着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勾勒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诞辰一百周年。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从目前我们所查阅到的资料看，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

当时毛泽东刚刚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省会长沙读书。这时的长沙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宣传反清救国和鼓吹革命的刊物喷沫鸣溅。

这时已具有了维新意识，并且明确树立起救国救民思想的毛泽东很快就投入到辛亥革命这一洪流中。

武昌起义爆发前，毛泽东为革命大潮所鼓舞，为表示对革命的拥戴，他毅然剪去了作为拥护清朝统治标志的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参加了湖南新军，投身民主共和的洪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中，看到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这个时期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成份相当复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上述各种人物介绍社会主义，一般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救治不平的“药方”来介绍。当时流传于中国思想界的：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有卢梭的天赋人权；既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又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既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又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鼓吹“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更能迎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在部分人中颇为流行。他们把社会主义宣传为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的“药方”，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自由”，产品“各取所需”

最初毛泽东曾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产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探索愿望。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

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与士兵和同学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探知详情。但是，从他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热情。以至20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根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也是从读经书开始的。但他却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毛泽东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并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特别是当他看到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主张“中体西学”的《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思想升华到当时他所能升华到的高度，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远大志向树立了，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呢？这正是毛泽东所要寻找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可是，地处蔽塞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当时对孙中山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根本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在变法维新早已失败，康、梁也早已远适异国，并成为这个革命的反对派的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成为第一个闯入青年毛泽东心灵的政治意识。他一度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热烈崇拜者。不过康、梁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前进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过的桥梁。随着对孙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这种改良主义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认识也十分肤浅和片面。但是，江亢虎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所宣传的那种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从蔽塞山冲出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农家子弟。这第一道“社会主义”

的曙光，不仅使毛泽东知道西方还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产生了强烈探索的愿望，从而推动他进一步去探索社会主义。

二

青年毛泽东自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便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看作社会新的前途来认识。

但是，五四运动前，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的只是极少数人，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国外发行，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泽东这样热情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易看到。他们“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那时几乎不可能在不接触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基本原理的情况下，自发地失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所探索和追求的只能是当时不可逾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毛泽东也不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已经变为一种愈来愈反动的东西，但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它仍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种先导。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实验了。这我们从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16 日记的一段日记，以及对毛泽东和同学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的性质进行全面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性的东西。张昆弟在 1917 年 9 月 16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所谓世界主义，毛泽东解释：“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原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可见，毛泽东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目标已经定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他不是通过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和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于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共同发起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团体“新民学会”。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的目的。这样，消除社会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一师毕业之后不久，毛泽东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学会会员，“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¹¹⁾。后来，由于被邀请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长沙”，毛泽东本人也要去北京从事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这种实验便搁浅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

1918 年 8 月，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

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蔡元培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的思想，极力想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毛泽东针对当时情况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¹²⁾一方面，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¹³⁾；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也产生了兴趣。他不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还常常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¹⁴⁾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次北京之行，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他思想上又一次燃起社会主义理想的火花。他曾富于激情地描述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¹⁵⁾特别是俄国政体改变之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声，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¹⁶⁾显然，毛泽东这时是被世界革命潮流“软化”了。他从这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类解放的前途世界主义既社会主义。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烈方法；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他所钟情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他在谈到民众联合时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¹⁷⁾青年毛泽东不仅赞同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他还直接表明自己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不采取“激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¹⁸⁾

由于受进化论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不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还曾

一度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设想了一个“新社会生活”方案，准备将搁浅多时的岳麓山计划重新实验。克鲁泡特金曾起草过一个题为《我们是否应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未来的公正社会必须建立在四个方面平等的基础之上，即：经济上的平等，最关键的问题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上的平等，必须确认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从事体力的手工劳动；教育上的平等，彻底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使教育和生产直接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成为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等人和普通人的工具；政治上的平等，政府成员和政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了一个“阶级”，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只要有这种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政府存在便没有真正平等可言。因此，必须承认消灭当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必要性，并且给予所有的生产者公社和劳动组合无条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以及在自由契约基础上自发地结成联盟的可能性。⁽¹⁹⁾毛泽东在他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所设想的“新社会生活”，其基本精神和言论与上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颇为一致，正是一个财产公有、劳动平等、教育与生产直接结合、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毛泽东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生活以生产工作、实际工作、农村工作为大端。“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²⁰⁾

这是一个设计得十分周密的方案。笔者不惮其烦地引证这个方案的内容，是因为这个似乎过于琐碎的计划，正是他思想倾向的反映。然而，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它愈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²¹⁾

毛泽东所以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个人认识局限所至。当时渴望“互助的新村生活”、企望适宜于群的共同生活，正是“五四”前后广大进步青年的普遍心态，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汹涌而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家庭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是他接触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太少的缘故。任何一个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者，都不可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必须通过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启蒙，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才能自觉地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尚未翻译过来。外语水平不高的毛泽东要想直接阅读马列著作原本，尚有很大困难。大量文献表明，他第一次到北京

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这个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那上面虽看不出他读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痕迹，但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和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²²⁾

此时，他的思想基本倾向，如上所述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这我们从这一时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学生之工作》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但其认识是不清晰的。然而，这些成了他日后迅速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条件。

毛泽东失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以后的事。

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北京，这时各种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形成，为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

从查阅毛泽东在北京这段活动的文献资料看，他除了以主要的精力从事驱张运动和主办《平民通讯社》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刊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中译本片断。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²³⁾

毛泽东在他回忆中十分肯定地提到，他第二次来北京期间，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并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说这三本书毛泽东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会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他读了这几本书。但是他在回忆的时间上有误。因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社会主义史》译本1921年1月出版，他在北京期间，即使是到上海之后，都不可看到这三本书。他读到这三本书的时间应当是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看到这三本书，但是其中的一些片断，毛泽东是可能看到的。因为在毛泽东来京前夕，《晨报副刊》曾于1919年5月5日转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另外，北京《国民》杂志也于1919年11月发行的第二卷第一号上，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名《马克思和昂格斯》。

由于客观条件所制，今天我们已无从详细考察清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究竟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第二次北京之行，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促使他失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接着的上海之行，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和影响下，使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深。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²⁴⁾

考察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期间的活动看，他这时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已经相当深刻了。然而，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言论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续采取研究和比较的态度。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²⁵⁾同时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想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这个大学里，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结合起来，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实行共产的生活⁽²⁶⁾。甚至他到上海时，看到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却仍打算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他在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²⁷⁾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已经相当深刻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深深迷恋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其社会历史观上的失误。如前所述，毛泽东无论是寻找解决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还是其所设计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指导思想都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应当指出，毛泽东的进化论并不反对质变，相反，他是主张社会的“根本改造”的。他把“劳动”看成是进化的要素，无疑是承认人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是，他认为通过“人人读书”、“人人做工”，就可以达到改良人心风俗而实现“新社会”的目的，则显然还没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为要实现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改造，就要发展个人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就有了健全的社会。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革命，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显然毛泽东这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理，因而在看到各地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他还只把这种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和道德力”修养不够⁽²⁸⁾，而没有醒悟到其历史观上的失误。这样，自然不会很快放弃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失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他获得了某种理论便总是勇于拿去实践。只要是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或错误的东西，他便勇于否定。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一面着手创办与建党建团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一面又以主要精力来发动和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企图通过请愿、制宪和选举的方法，对封建军阀掌握的地方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继而达到“改

造整个中国的目标”。这就进一步表明他当时在革命方法问题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明确的解决，还不能对中国的国情作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找到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直至“自治运动”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才从革命道路上提出问题，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与采取“俄国式的革命”的方法联系起来。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湖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²⁹⁾。他所说的“另辟道路”，就是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他指出：“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下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³⁰⁾他还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中悟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³¹⁾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³²⁾

从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实验失败的教训后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已经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标志，就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坚决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不流血的“呼声革命”和抛弃无政府主义。

纵观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不难看出，其实他有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或相似的经历。他的每个重要思想发展过程都是随着社会的大变动而发展的，而且每一个发展过程都经历了艰辛的求索，才终于找到了救治中国的“对症药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且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并形成了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历经艰难困苦找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发展，决不可动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¹³⁾⁽¹⁴⁾⁽²²⁾⁽²³⁾⁽²⁴⁾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第117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32页，第131页，第132—133页。

参见《“七大”工作方针》。

《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

⁽³⁰⁾⁽³¹⁾⁽³²⁾《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9—120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第409页。

(11)(15)(16)(17)(18)(20)(25)(26)(27)(28)(2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9页，第364—365页，第292页，第341页，第293页，第449页，第454页，第474页，第475页，第478页，第467页，第54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19)参见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

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点

秦英君

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本文仅就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作一探讨。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

“大本大源”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题，即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说“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青年毛泽东所悉心探讨的“大本大源”类似宋明理学中“理”的概念，理学家的“天理”观，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天道”、“人道”等问题的认识上。

在“天道”问题上，1917年8月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这是一种“心即理”的本体论，基本上与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天理”观是一致的。对于“天道”与“人道”，即天与人的

关系，毛泽东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接受了“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进堂录》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大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其意思就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源的精神之大我，达到“我即宇宙”境界。又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大，斯得天矣”。“天人合一”是“理学”思辩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在理学家二程哲学中，“天理”即指自然的普通法则，又指人类的当然法则，“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讲堂录》是毛泽东修身课的学习记录，虽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传统理学的赞许和认可。

文化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儒家人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方面。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模式，也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中心命题。所谓“内圣”指人内在的修养和操守，即对“天命之性”的体察和省悟；所谓“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从而达到“学问”与“事功”的统一。“五四”前后，毛泽东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认识过程，也是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而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即“学问”与“事功”的结合，便是“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毛泽东认为商朝大臣伊尹是“德功俱全”之人，“可法”；孔子所以被奉为至圣先师，主要是“通达天理”，深得天地之“大本”，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拿破仑仅是“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至力”的人，所以“豪杰也，而非圣贤。”青年毛泽东悉心研究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曾国藩的评价更说明了这一点。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之人，亦为深得“大

本大源”之道。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相反，康有为变法失败，毛泽东归因于他不谙本源之道，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显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判是暂时撇开了他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重在“内圣外王”模式入手，寻找其成败得失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事功难立的结论。

中国儒学传统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人生理想模式，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八目便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学问和事功的极致，如上所述，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的时代，从而使毛泽东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对立，毛泽东开始用新的哲学、伦理学对“内圣外王”的主体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使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内涵与封建伦理道德的主体迥异。

二、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早在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级中学读书时就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又写道：“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噉舌而讥矣”。此文被国文教员批为“切实社会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会文学”。在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民性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如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又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又如，据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日记记载，一次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的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又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

忧国忧民的参与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上述毛泽东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湖湘

志士，如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都是毛泽东所崇拜的人物，他们对国积弱习成的国民性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毛泽东深受感染。如谭嗣同针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患深矣，海军燬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毛泽东称他“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¹¹⁾。又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指出：“今日中国国民实近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尚不自觉可为寒心，奴隶牛马万动力不复，吁其危矣”⁽¹²⁾。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杨昌济曾经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又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和考察德国，是一位学贯古今中西的“海内名儒”，他既是青年毛泽东的尊敬教师，又是毛泽东的岳父，所以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耳濡目染，影响至深。正如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时，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是来自王船山、谭嗣同等，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也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不难看出，从王船山、谭嗣同到杨昌济、毛泽东，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关系，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表现的至为突出。

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同戊戌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他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等众多思想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体现了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随后有“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期间既有以杨度为代表的筹安会，又有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的讨袁派。毛泽东积极站在了讨袁派一边，他和一师学生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时局痛言》，广为散发，积极参加了反袁活动。但是，毛泽东当时对封建军阀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跳出梁启超等讨袁派的窠臼，对梁启超等人日后提出“南北和解”主张亦表赞成，尤其对袁世凯所扶持和依赖的封建军阀还缺乏认识。如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遂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撤消军务院。毛泽东对此颇多赞词，他说：“中央举措，究可佩服”，“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及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¹³⁾。上述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受维新派康梁的影响，对封建军阀还缺乏本质上认识。

1918年4月，毛泽东第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几经酝酿，建立了新民学会，会章规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该会宗旨。会章要求学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十分明显，新民学会的目的是要改造个人和人类，其办法就是首先进行个人良好品行的培养，进而改造整个社会。毛泽东集合同志，砥砺品行，重塑“新民”的思想，同样也是受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影响。早在1902年梁启

超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提出了“新民”说，他在该刊宗旨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新吾民。中原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欠缺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首先以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¹⁴⁾。梁启超将“新民”作为该刊的宗旨，即要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新民”思想启发了一代青年，毛泽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在1910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阅读过《新民丛报》。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¹⁵⁾。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受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仅仅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参与意识，并将改良人心，重塑“新民”付诸于行动，那么五四运动后，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产生转折，由过去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转向陈独秀，开始接受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传统，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化思想战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新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磅礴的气势向封建主义的精神网罗发起了猛烈抨击，“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¹⁶⁾。在此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毛泽东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倍受感染。他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¹⁷⁾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与新文化思潮相呼应。在《湘江评论》的开篇，毛泽东就以饱满的激情欢呼新思潮的到来。他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¹⁸⁾。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八方营救。毛泽东为此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极表同情和仰慕之情，他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两先生得罪了社会。“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¹⁹⁾这时的毛泽东不但接受了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而且也开始运用这个思想武器分析和认识社会，较之“五四”前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认为中国愚昧落后在于民主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他说：“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²⁰⁾。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的封建“道统”，包括他崇拜过的孔子，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人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²¹⁾。

毛泽东运用民主科学这一思想武器，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同时，也对中国戊戌以来的思想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

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接着毛泽东对戊戌以来的思想批判回顾说：从戊戌至今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全力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²²⁾。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思想，才能站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高度，对戊戌以来思想的变化作深刻的反思，认定这些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²³⁾。由此，毛泽东完成了由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到接受陈独秀激进民主思想的转变，此时，对他早年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维新改良思想已黯然失色了。

1920年6月开始的湖南自治运动，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毛泽东五四运动后为谋求中国出路，将他信奉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施的一次尝试。毛泽东将“湘人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作为解决湖南出路的方案，反映了他认识上局限和偏激，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他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信》中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²⁴⁾。在《致李思安信》中又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²⁵⁾。毛泽东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中，决心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此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追求已是呼之欲出，他说：“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²⁶⁾。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张国基信》中，明确指出这个“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完成这个大业，必须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愿大家好的主义”⁽²⁷⁾。1920年12月1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的两封信；1921年1月1日至5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说：“我们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对蔡和森提出的“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上述不难看出，毛泽东早期思想从忧国忧民开始，到对维新派康、梁民主启蒙思想的崇拜，进而接受陈独秀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再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这一思想发展过程，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四、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方向

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方向。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主权囊括以去，5月7日，日本政府又发出咄咄逼人的最

后通牒，限 48 小时作圆满答复。当时袁世凯称帝心切，表示对日方要求基本全部接受，于是全国哗然。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一师学生将一些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资刊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奋笔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字，表出了毛泽东对封建军阀的愤慨。毛泽东积极站在讨袁派一边，1916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诘，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撼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袞袞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奈何皆不足为前者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²⁸⁾。可见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是深恶痛绝的。同时，他针对报端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日本对华政策可趋缓和之说，明确指出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骖驱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济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²⁹⁾。上述文字，虽然毛泽东对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已看到日本的亡我之心，告诫国人“注意东事”，“磨砺以待日本”。

对于帝国主义的警惕还表现在他对沙俄的态度上。袁世凯执政时期，沙俄不断出兵我国西北边疆和黑龙江呼伦贝尔以及新疆阿尔泰地区。1916 年 7 月，沙俄与日本达成“日俄协约”，分掠满蒙权益，对此，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提醒说：“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³⁰⁾。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改过去潜心书本理论的追求，开始把解决中国出路问题寄希望于人民群众。”1919 年 7—8 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先后在《湘江评论》上连载，开篇劈头就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改造的一个根本办法就是用“民众的革命大联合对抗统治者的反动大联合”。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他指出：“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即首先实现农民的联合、工人的联合、学生的联合、妇女的联合、教师的联合、车夫的联合、警察的联合，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毛泽东用“民众的大联合”方法，以对抗“强权者”，实现民族和自身的解放，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政权理论，但是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同时，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主张，“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³¹⁾他还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是俄罗斯打倒贵族、

驱逐富人，劳农两者合立了委办政府；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崭新的劳农政府”。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中国妇女是封建礼教的最大牺牲者，毛泽东对妇女的解放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热情。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³²⁾号召“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建立真正的婚姻制度。尤其是1919年11月，湖南长沙发生赵女士为抗婚而自杀的事件，为此，毛泽东连续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非自杀》、《改革婚制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文，猛烈抨击中国的婚姻制度，明确指出赵女士自杀其根源是中国的“万恶社会”。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的同时，已朦胧地意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已认清中国的危亡，人民的惨痛是由军阀和帝国主义造成的，他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指出：“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八九年来之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造乱者，少数之武人”⁽³³⁾。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者，屐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他号召“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³⁴⁾。

综上所述，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异常追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表现了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同时，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第二，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对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同湖湘志士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人的民主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第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他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表现了毛泽东唯真理是从的精神。第四，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正是他坚持了这一方向，使他较早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注释

(11)(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第87页，第588—590页，第589页，第85页，第85页，第1—2页，第86页，第639页，第639页，第49页，第5页，第364页，第292页，第305—306页，第305页，第368页，第362—364

页，第 363 页，第 584 页，第 557 页，第 554 页，第 560 页，第 51 页，第 51 页，第 51 页，第 341 页，第 375 页，第 486 页，第 504 页。

《谭嗣同全集》，第 60 页。

(12) 《杨昌济文集》，第 364 页。

(14) 《梁启超年谱总编》，第 272 页。

(16)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

